苹果、微软、IBM、迪斯尼等世界500强企业管理层都在学习的超强领袖法则！

心理学称霸世界

PSYCHOLOGY 政治篇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邓丽蓉◎译

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性会被湮没，独立思考能力也将丧失
群体精神将会取代个体精神！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宁
封面设计：八牛 设计 BNEW DESIGN

心理学称霸世界

PSYCHOLOGY 政治篇

《乌合之众》完美升级版！

个体如何被群体淹没的？领袖如何领导群众？

- 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性会被湮没，独立思考能力也将丧失，群体精神将会取代个体精神！

- 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千差万别，诸如思想方法、行为方式，还有利益。群众的性格多如牛毛，诸如群众的无理性、图简单性、易受感染性、轻于信从等。若要贴近群众的观念，需要使用简单的，形象生动的寓意词汇。

- 无论群众的情感实质是什么，他们情感的表现都是强烈的。自尊与谦卑顺从在群众身上表现得同样强烈。在遇到有地位的人的时候，群众的这种性格表现尤为明显。





上架建议：社科经典


ISBN 978-7-5112-5884-7
9 787511 258847 >

定价：29.80元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邓丽蓉◎译

心理学称霸世界

PSYCHOLOGY 政治篇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称霸世界．政治篇 /（法）勒庞著 ; 邓丽蓉译．--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112-5884-7

Ⅰ．①心… Ⅱ．①勒… ②邓… Ⅲ．①心理学 Ⅳ．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3307 号

心理学称霸世界．政治篇

著　　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译者：邓丽蓉

责任编辑：庄　宁　　策　　划：博采雅集

封面设计：八牛设计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22197（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5884-7

定　　价：29.80 元

前　言

古斯塔夫·勒庞与心理学

古斯塔夫·勒庞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之称。他1841年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1931年逝世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

勒庞早期在巴黎学习医学，18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了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1870年起，在巴黎行医。1884年开始研究群众心理学，阐发了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优越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他的研究涉及三个领域：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他最初研究的是为各个人种的身体特征创制测量方法。后来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晚年，勒庞的兴趣转向社会心理学。按照他的意思，一群人如果被认为属于一个种族或亚种，他们一定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思维方法。他确定的标准包括推理能力的水平、注意力和本能需求控制。例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智力特征与拉丁人的智力特征相比后，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各方面都更加优越。

勒庞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著称。他认为，“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都具有民族的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

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智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勒庞认为，人在群集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群集时有一种思想上的互相统一，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这种统一可以表现为不可容忍、不可抵抗的力量或不负责任。群体行为可能是突然的和极端的，智力过程可能是初步的和机械的。这是当时盛行的几种“群体心理”理论之一。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群集时还会产生一处思想的感染，使得偏激者和群众的无意识思想通过一种神秘物作用要理互相渗透。勒庞总结说，当它成为集体时，任何一种虚弱的个人信念都有可能被强化。

在19世纪20年代，勒庞的思想达到了巅峰。他的预知令人震惊，他在作品中预见了20世纪所有的心理学和政治发展。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坚持要会见勒庞，他曾经于1914年认真阅读了勒庞的作品。另一位国家元首亚历山大·德里在1924年写道：“如果你见到勒庞，告诉他智利共和国总统是他的狂热崇拜者。我曾从他的作品中摘录了一些句子。”有两位政治人物，尤其忙于通读勒庞的著作，还将勒庞制定的规则付诸实践，并且极其认真地进行分门别类，这两位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勒庞最狂热的读者是阿道夫·希特勒，他不仅循规蹈矩地跟随勒庞，他著作的《我的奋斗》也完全追随勒庞的推理逻辑。可以说，勒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大师，他把心理学带到了世界的最高端。

本书为勒庞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的思想对分析社会心理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简而言之，这是一部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教育的社会心理学颠覆巨著，也是勒庞一生中最满意的一部作品，解禁后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畅销全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篇 本书的研究宗旨及研究方法

第二篇 政治生活的公理原因

第三篇 民治政府

第四篇　工会派的幻想与无政府主义的发展

第五篇关于殖民政治心理的错误

第六篇 骚乱的发展以及反对社会解体的纷争

第一篇

本书的研究宗旨及研究方法

想做一个政治家，就必须学习政治心理，只可惜，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找到可以一直遵循的方法和规律。所以，现在的政治家也只能随着时代的变动，通过实践来找到一定的方法规律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第一章 政治心理

一

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说只能用心去体会，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很轻易地领会它的意思，但要用语言具体地表达出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以前，科学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大家只要看到事物的表面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但到了科技时代，这种只停留于表面的研究方式就一定不能再保留了，必须要对事物进行深入研究才行。

想要研究国家的变化或人民生活状态及生活水平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以前的历史学家曾经希望通过历史观点来研究这些变化并进行解说，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研究和解说都不尽正确。世间万物，各有特点，民族持续性的发展和变化，就像生物的演变进化一样，其过程都不简单。如果想要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复杂的过程，是不太可行的。

现在科学已经很发达了，但现在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仍然希望能找到一些更好的科学技术来替代现有的某些相对落后的技术，由此可以看出，没有

最完善的科学技术，只有更完善的科学技术。研究社会体制的进步也是同样的道理，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找到它变化的规律，我们手上已掌握的规律其实也就那么几条而已。因此，现代人对社会体制发展的了解，仍然还停留在表面现象。而且，一般的理论家也只会对它的表面规律进行阐述，对于其内在的规律理论家通常都是选择回避的。所以，我们回顾以往就能发现，在那些历史记载中，很少看到有民族活动产生的原因的记载，有的只是历朝历代君王们的政绩和当时所发生的战事罢了。

这么一来，我们就不能再简单地认为社会科学是“概括和解答今天民族生活的发展”这类复杂的问题了，其道理是很明显的。那为什么民族会有兴衰、制度、神鬼、语言、艺术？民族为什么会进步，也会消亡？社会的进步会被那些条件所限制和制约吗？仅仅只有这些条件才会限制和制约社会的进步吗？为什么伊斯兰教的成立只需要那么一点儿时间，而其他的宗教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得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为什么脱离了政权的控制之后伊斯兰教依然能够独立存在，但道教、佛教一直和政权有所关联反而慢慢地衰败了呢？对于这些问题，虽然现在有很多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但我认为没有一个是全面的。

二

古人都以为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上天早就安排好了的，凭着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老天爷的。不过今天的人类已经得到了解放，无神论帮助人类甩开了神明思想的包袱，使人类开始相信自身的力量，开始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自然。尽管自然的力量我们仍无法抗衡，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但只要能有这个认识，能开始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获得

短暂的胜利，就已经是一种不小的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了。

当然，人类要达到完全战胜自然的程度是不太可能的，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只能遵循自然规律然后合理地利用。所以，人类生存在这个社会中，就应该学会自我克制，学会遵守自然规律及公共规则。而如何制定出能使社会和自然更和谐的公共规则，就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立法。何为立法，说白了就是制定出一套方法，用来管理国民。但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在过去，解决这些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现在难道就会容易解决一些吗？其实也不容易。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改革，虽然推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所带来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需求，经常会让一些领导者感到措手不及，也就相应地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并且，那些社会科学的规则都还不明确，这样就导致我们的研究人员在开展工作时更加困难。虽然社会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可一旦领导者决策失误，做出错误的执政方针，就会给子孙后代戴上沉重的枷锁。我认为与其坐等那些立法规则的产生，还不如根据目前的境况和形势，倾尽平生所学，努力将这些问题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讲解。

立法，实行才是最重要的一点。但实行的时间、实行的方法及实行的程度都是首要解决的问题，解答好这些问题，就可以全面了解我们的施政方法了。

三

我们在对历史所提到的那些政治错误进行解读时，往往会以心理上的错误为借口来为这些错误开脱。不管是研究还是学习都有其应遵循的规则，我们不能违背这些规则，也不能超越这些规则，在治理人民时也同样有一定的规则。只不过，制定这种规则就要困难得多了，主要是我们的前辈实在无法

提供什么帮助，对于这种类型的规则几乎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更别说分析和详细的解释了。

而且，以前也没有什么描写政治心理的作品，倒是见过一本著作，出自一个佛罗伦萨人之手，这还是400年前的作品了。佛罗伦萨有一座非常著名的教堂——圣塔克诺司教堂，很多名人的墓碑都立在里面，像伽利略、勒当特、米开朗琪罗等。在墓碑上，有用金字篆刻的他们的生平事迹。其中有一个叫马基雅维利的墓碑，上面的碑文非常简单，只留有他的名字“马基雅维利”和年号1527，还有一句非常简单的墓志铭——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多余。这就是一位曾经主攻政治心理研究的人，他写过一本名为《君主论》的书。1502年，佛罗伦萨建立独裁统治制度的时候，他正身处这个时代，他认为在平民政府和扰乱时代之后必定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他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非常清楚明确的，当时，意大利的各共和国效法罗马希腊共和国曾经的体制也是一个诱因。从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重实际的人，他只做到了简单便捷，却没有考虑到整体的优良性。如果我们要以现在的观点理念来评判他的著作，是不可行的。正如我们用现在的观点理念去分析那时候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圣巴铁勒米的屠杀不合适一样，我们用现在的观点理念去评判那个阶段的政治同样是不恰当的。

马基雅维利在书中所提到的用来管理人民的规则，根本就不适用于400年后的社会，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制定一个可以取代它的新法规。

想做一个政治家，就必须学习政治心理，只可惜，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找到可以一直遵循的方法和规律。所以，现在的政治家也只能随着时代的变动，通过实践来找到一定的方法规律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只不过，这一类的指南常常会导致重大错误的产生。比如拿破仑把对付法国人的那一套拿来对付俄罗斯人和西班牙人，结果遭到重挫，一败涂地。他的后代，拿破仑三世又因为轻易地相信别人的错误言论，在经历了与克里

米亚、墨西哥、意大利之战后，因决策失误而使法国受到外敌入侵，损失惨重。

由此可见，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必须先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者。如果不是因为俾斯麦对于个人和民族心理非常了解，只凭着日耳曼军队的力量，我看德国的统一也不一定会成功。

四

政治心理由个人心理、人民心理、民族心理等各种心理相结合而构成。在我国，很多教育工作者都觉得心理学没什么作用，没有必要学，所以学校的课程一般都不会有它的存在；甚至很多政治专业的人都对它很陌生，就算是那些所谓的政治学博士也不知道政治的真正基础是心理学，真是可笑至极。

很多平庸的政治家喜欢把过去那种极为陈旧老土的方法拿来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一旦出现新的问题，就不知所措了。因此，如果总是把政党的意愿作为行动标准，就总会出现漏洞百出、无法收拾的局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近年来所犯的错误：

首先，教会和国家的分离。一个国家的君主如果有自己信奉的宗教，可是却不敢让教会独立，这样的政治心理就是错误的，同时也很危险。德国的教育原则是“促使科学带动工业、经济进步”，我们国家则完全不一样，同化统治地域，这就是政治心理最根本的错误，不仅没有帮助反而还会使统治地域变得更加落后衰退。还有，以往都是把不安分的人民和安分的人民分类，各自单独编制成军队，但现在却把他们都混在一起，这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心理。一有人员罢工，政府就立即妥协，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心理。还有一些所谓的人道法律，也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心理。通过颁布法令使社会改变，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民族摆脱过去，这都是错误的政

治心理。

我们必须了解，可以决定民族行动的力量不会那么简单，一定是很复杂的。自然资源、经济、历史、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力量，全部都会起到作用。我们思想的方向应该考虑所有这些力量，把它们结合起来。尽管这所有的力量看起来杂乱，但一定可以找到共同点，进行整合，转变成政治心理力量。这也是我们在整合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

五

各民族在进行重大交涉时，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得用到武力才能解决。说白了，使用武力就是力量的较量而已，力量弱小的往往会被力量强大的压倒，普奥、英德、日俄之间都是如此。当然，如果并没有很深的矛盾的话，最好是可以避免战争，和平解决，好好地运用政治心理来取得胜利。虽然为了解决这些民族间的问题，有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必须得采用强制手段，像拿破仑、俾斯麦这样的，不过这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这种局面，各民族友好团结、结为盟友，如果有哪位领导者还想一意孤行，那么摩洛哥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像现在这种力量差距明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起着非常重要和巨大作用的就是政治心理了。

现在这个年代的外交活动与早期的外交活动有所不同，一旦政治上发生某些事情，就会通过电话、报纸、网络等媒介迅速地传播，人民就能很快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于外交官是不利的，若他们想拖延一下时间，不想这么快就把事情公布于众，就有点儿困难了。当然，也不是完全没好处，近些年就有一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的重大事件。比如，俄罗斯击沉了英国的渔船，德法两国就卡萨布兰卡事件进行的交涉，与俄奥两国相关的塞尔维亚

事件等。如果 1870 年的时候，我国不是因为有一个庸俗恶劣的外交官，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那场战事了。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也能通过政治心理来解决。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对于群众的诉求，我们是应该妥协还是抵制。目前的这些政治家，他们要不就是一味地抵制，要不就是一味地妥协，从来没见过有人可以将抵制和妥协结合起来使用。其实，我们在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可以进行抵制，而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是可以妥协的，要学会转变思路，不要一根筋到底。只要我们采用合理的方法，就可以很快地把问题解决；一旦方法使用失误，就很可能会酿成大错。比如，1788 年，法国发生财政和农业恐慌的时候，如果那些贵族们采纳纳税平等的建议，就不会激化阶级之间的矛盾，那么那场革命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六

我已经从事了十几年的物理学研究了，主要是针对物质的进化方面，我发现再没有任何事情会比研究这个所花费的精力更多了。所以，我们不仅要谨慎认真地反复进行思考，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过去所研究出来的学问拿来进行权衡。我以前很少读那些研究政治心理的专著，但现在我想把我原来进行物理学研究所遵守的原则运用到政治心理的研究中来。我找到我的朋友黎波教授，希望他能给予一定的帮助，比如提供一些近代的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书籍。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朋友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过这一类的书籍。这让我想起了 15 年前我在研究群众心理时，也是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一样。虽然没有人写这类书，但这并不代表着也没有人论述、讨论过政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有很多与政治相关的作品和观点。只不过，他们的

这些作品也只是理想主义，空谈的居多，不太符合实际，所以要想找到一些可供参考的书，实在是太难了。

没有人专门写这样的书籍，学校也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看不起这门学问。现在我写这些内容，就是想要向大家证明这个学问是多么重要，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个人心理、群众心理、民众心理以及历史教训，组合在一起建构成政治心理学，当人们了解了这些内容，那么对于政治心理学这门学问也就会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政治，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民众以后的行为要以政治需要为基准。无论这种需要是不是合理，都要把这种需要放在第一位。虽说这并不太合理，但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习惯问题和对宗教的信仰，而且，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不会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进行反驳的。只有那些对实际情况不了解的理论主义者，只知道用纯理念来谈治国，并且总想着改变人们精神状态的人，才会对这种需要进行反驳。虽然，国民的精神气质可以通过智慧来改变，但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很少看到有什么事物是在瞬息间就发生了改变的。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过，现在这个时代对于政治心理还不是很敏感。我现在就是要明确它的规则，并逐条地进行推理论述。我并不是为了证明它的价值才研究这个，我只不过是想让大家看到不懂得政治心理的规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便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了。

我在前文还提到了各种规则，但这本书的范围有限，无法收纳和包容所有内容，也无法一一进行阐述和研究，如感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的，可以去翻阅一些以前的书籍。

我只在这本书里通过政治心理学的规则来解释和说明近代发生的一些时事，时间仓促，我有很多观点都无法展开进行详细的解说，比如研究民族历

史中政治心理学对信仰构造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研究政治心理学在战争中有什么因果关系等。要想进行一个详细而全面的解说，一定需要很多参考资料。

如果想做深入的研究，可以看看下面这些书籍：

《民族进化之心理规则》《社会主义之心理》《教育心理》《群众心理》《东方古文化》《东方文化》《意见及信仰》《法国革命及革命心理》《印度文化》《真理之生活》。

七

这本书有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了怂恿的要素，为大家具体地解说了重复的优点。正因为重复具有其优点，所以我也一直在重复我的观点。也许正是如此，很多同类型的书籍当中所提出的观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令我觉得遗憾的是，我无法将重复的重要性完全讲明白。拿破仑常说：“重复是语法中的主要的修辞手法。”而我对它的理解是“重复是确定自己言论的主要要素”。

重复言论、反复强调，是使各大政治家对他们的权力充满信心，用得得心应手的一个方法。德国的皇帝正是用了这种方法，才能够说服自己的人民牺牲掉自己的某些利益而去制造舰队。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说：“根本的真理，常会让人感到重复的麻烦，即使这样，还是应该再次反复强调和申明这个真理。”从这里可以看出，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和言论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那些所有人都已经滚瓜烂熟的真理，我们也可以反复地进行宣传，不必避讳。而对于那些还不为人知的真理，就更加需要反复宣传了，关于这一点，已经经过我的反复实验认证了。以前那些传道士，就总是使用这种方法，借此来改变我们的观点和信仰。

我们口头说相信和将要确认的事情用白纸黑字表现出来是不同的。虽然

要证明我们所研究的学问用理论的推敲和研究十分有用，但这并不是使大家信服的重要元素。人们之所以愿意听从我们，服从我们的思想，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是百分之百正确，只不过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不断重复的方法，让那些人在耳濡目染的作用下愿意服从我们。

第二章 经济需要和政治理论

一

叙述一件事情，人们所在乎的还是它的真实性，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夸大描述。如果我们用凭空想象出的事物去打比方，那是很难让人留下印象并被感染的。因此，我们要想感动别人，就应该拿出实际的东西，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并且被感染。就好像跟当过兵的人谈部队，跟做过海员的人谈大海一样，容易产生共鸣。如果我们用现实的某些事物与其过去进行比较，也可以让人印象深刻并被感染。

曾经，我坐汽车经过比利时的于伊桥时，大雾笼罩，在桥上根本就无法开动汽车，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桥上等着。下车以后，我们发现，当阳光穿透云雾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左边耸立着巨大的城堡和巍峨的大教堂；右边是斑驳的墙壁、冒着浓烟的烟囱，那里是一个大工厂，不到一会儿，也许是到了工厂下班的时间，一群满头大汗满手老茧的工人蜂拥而出。看着这桥的两岸，分明是看到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文明。左边，代表着历史，虽然历史已成过去，但仍然可以指导着我们；右边，代表着现在，现在这个文化可以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无法预知的世界。

历史的更迭，是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的。以前还可能因为一种共同的信仰而互相平衡一下，但现在，连这个唯一能够平衡社会的感情基础也不存在了，甚至让贫富两端变得相互仇视、无法调解。现在的企业家，也不再保有过去社会的某种传统，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信仰，总是板着一副面孔，给人一种压抑并带有攻击性的感觉。而且，现在那些制定法规的人，任何事情都听从他们的言论，就像奴才和主人一样，若长此以往，说不定以后会形成一种空前的某个特定群体专制的情况。

二

什么是政治生活？通俗来讲就是要使人类的感情去适应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要改变环境，在科学和工业的快速发展下是非常迅速的，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让人们去适应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十分压抑和郁闷。由此可见，要想使人类和他所处社会的经济环境相协调，非常艰难。

从思想上去研究新旧社会和从生活方面去研究新旧社会，所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现在我们用来作为行动指导的新思路，并不是来自我们的期望和理性指导，而是根据人类的根本需要产生。所以，如果只看新旧社会的竞争力和相互敌对面的话，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只是，如果看谁能够推动民族更快地进步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了。下面，我们就要从这个方面去进行研究。

现在这个时代有两个比较大的特点：首先，过去的帝王和他的法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因素。其次，现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其利益网交错纵横，相互交织在一起，与以往各民族之间各自为营、互不干

涉的情况明显不同。

从表现形式上看，这两个特点非常接近，也很重要。各民族间从前根本就不存在着贸易来往，但现在，各民族间的贸易通路是很兴旺的，彼此之间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政，独立存在了。比如，假如英国从今天开始停止对外贸易，不允许其他民族商品的输入，国内就一定会出现该商品严重匮乏的局面。

每一个人的生活条件都存在着差异，并且经济的变动对国民生活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导致人民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前，政府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但现在，也不得不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变而转变。因此，现在这个社会，有了经济实力，才能抓住真正的权力，才能控制人民的意志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60年以前，一个国家的君主还有可能有权决定国内的自由贸易，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轻易做出这样的决定了。政策依赖于经济贸易，已经得到过很多经济学家的验证了，只有这样才符合现在的国情和民情，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

1910年3月11日，英国在上议院召开会议，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梅林提出，英国的经济已经被自由贸易的政策毁掉了，不到50年，小麦的产量就不到以往的1/2了。法国也没有幸免，1893年之前，他们的食品和物资严重匮乏，居然达到了695兆法郎之多。所幸的是，他们及时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施政不久就把亏空全部填满，并且还有5兆法郎的结余。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英国的小麦基本上都是从外国进口，但今天，他们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出口到国外。这一切应该归功于梅林，全靠他提出了贸易保护政策。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从有国家开始，就没出现过制定法律保护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农业产值之所以会有所提高，是因为农业发展在遇到困境的时候通过先进的科技成果而摆脱了困境，从此发展迅速。

所以，英国的农业无法取得相同的进步，并不是因为受到自由贸易政策的阻挡，而是因为工业革命的诞生。英国在制造业上得到了足够的利润，完全有能力购买外国的小麦，所以也就用不着费尽心思发展本国的农业了。

我的研究与贸易保护政策的好与坏没多大关系，看看现在的政治形势，也没什么必要对制度的优良过于苛刻，只要能够采纳一些合适的、与本国形势接近的制度就行了。我在前面就已经讲过，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管什么样的统治者，都不能给人民施加压力，不能让他们接受他们不愿意服从的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政策。如果放任自流，让人民自由贸易，那必然会自食苦果，压根儿就挽救不了国民经济。就算是一个非常有胆识、有智慧的人才，在强有力的背景支持下，也只能说他有可能改变局面，但那毕竟是极少数。

根据前文，可以了解到今天使国民不断进步的重要因素完全不同于以往。但有一点可以预测，政治学说对于民族进步而言，影响力非常微弱。能够推动民族进步的强有力的因素，应该是科技工业的发展和国际交涉的变化，这也是人民和国家领导都应该顺从、适应的。

三

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自然的因素，即与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因素，人民无法逃避，只能顺应它、接受它；另一个是主观因素，这也是政治理论家大力推崇的，也是我要研究的因素。

生物的本质无法改变，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改变它们的外在形态，但始终是无法改变它们的本质的，所以那改变的外在形态也不可能维持长久。虽然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摆在博物学家实验室里的实验设备，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博物学家可以改变某一种生物。

既然无法通过人力去改变生物，那我们有可能改变社会体制吗？放眼观察这近百年来的政治学说，包括那些革命家，都主张社会会因为制度的变化而改变。法国大革命时，提出了非常敏锐、深刻的主张，现在的社会党仍然坚持这样的主张。他们都觉得，用纯粹的理论和计划也能构建好社会。

这种观点，如果用生物学、心理学、历史等各学科进行论证的话，根本就无法证明。如果用社会科学对它进行阐述，因为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而且社会的深远改造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是验证不了它的成功的。精神可能通过制度来体现，这种体现形式只能根据实际存在的内容进行合理的设置，它无法凭空捏造出来。因此，即使某国具有十分先进的制度，但用在其他国家也许起不到一点儿作用，落后依然落后。因为制度是因社会进步而产生，并且因为政治进步才出现。

当然，那些制度对人们的生活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在以往的历史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不过其影响并没有像人们所传说的那么深刻长远。要明白，制度的影响必须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会有效果。如果我们所采用的制度并不适合当时的国情，那么它就像侵略军队的破坏力一样有那么大的不良影响。现在已经被认可的是，民族的精神论调可以因国家制度、法律及信仰而改变，不管我们如何反驳，都没有任何效果。

西方国家对此言论的弊端还无法了解，当然，因为这个他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因为他们存在着这种幻想，所以他们经历了历史长河中前所未见的流血最多的革命、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暴动、殖民地的衰落及阻止他们前进的社会政党。

在治理殖民地时，无论如何都不可使用这种论调，在治理普通民众的过程中用一下倒也无妨。不然，肯定会激化殖民地居民的怨恨从而引发叛乱。今天各大媒体都在大肆报道，在科特迪瓦殖民地，就因为宣布了一个由总督执行行政官的通告，结果导致地方发生暴动，军官被迫害，殖民国派遣了不

少的官兵也消耗了大量的经费。这个例子很明显，如果英国和荷兰也采用这种统治方式，那么他们的殖民地早就沦陷了，也熬不到今天。下面引用了一段通告的内容，借此来说明我们的民族精神不可能随着法令的更改而变化。

通告大致是这样讲的："应该强迫使我们的臣民接受进步的同化……如果不能听从劝告，政府会采取强制手段……应该让黑人的心理状态得到改变，让他们能够领会和理解我们的意图……不必考虑土著人的需求，应该强制达到目的……不必顾忌将来的利弊，势在必行……"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专制统治，那么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去改变黑人的心态，而是行政官员的心态。可惜，法国一直到现在都坚持"制度可以改变人民的心理"这种观点，而且每一个正常人都这么认为，就连最顽固不化的保守党也是这样的想法。

四

心理学是很厉害的，它的知识和理性在任何领域都适用，所以政府也就非常依赖于它。不过，在社会团体中，它的影响力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我以前写过一本书，里面就呈现了各种不一样的理论。和旧的哲学课有所不同，旧的哲学课只有一种理论就是理性理论。除此之外，应该是还有很多种理论的，最重要的就是情感理论和神秘理论。这三种理论，各有其特点，不可把它们混在一起。

据观察所知，情感理论和神秘理论多多少少会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理性理论却有可能影响不到。社会不受理性理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某些思想简单的改革家，还妄图以理性理论为基础建立制度，这种做法非常愚蠢。现阶段很多英国政治家都很清楚这些道理，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总有一些内阁成员在议会上强调英国的宪法很出色，因为它有很多地方都不是为了迎

合世俗伦理而存在。确实，英国宪法是有它的优势的。而法国宪法从修改至今也有百年的历史了，最近一次修改是法国革命时期，尽管数目种类众多，但却没有什么效果，这不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追求理性化吗？你说呢？

很多道理西方人都无法理解和领会，反而我们能够弄清楚所有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

如果宗教、政府包括政治行为，都不把理性作为根本，那么只有那些懂得通过煽情来打动群众的人，才有可能把政治家这个职业做好。也许他们的言论听上去是符合世俗伦理的，但实际上他们正在通过那一套说辞收买人心，这也是一种引导。当然，群众之所以能够被打动，是因为那些带有感情的字句和言论使其产生共鸣。通过情感来打动对方，用在那些比较理性的人身上，就起不了什么很大的作用了。

五

有的人提出理性的理论无法对人类进行指导，想要启发他们有所信仰也不可能，这是不符合大革命的事实的。1798 年的那场大革命，就是因为理性的理念指导了人类，所以才会发生，提倡这个观点的人以卢梭的影响力最大。卢梭觉得：人类只有在自然状态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快乐，而让人类觉得苦恼和烦闷的，是那些不好的社会制度；当务之急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全体人民都应该拥有自主的权利；唯有建设新的制度才能改变现在的社会方式。卢梭所提到的这些，他的弟子们也一直都在努力实行着。像那些国王、贵族、教育者等不赞同的人，就算希望通过强硬的手腕来解决也不希望导致流血事件，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及激进党人在执政时也是这种考虑。但根据革命的状况，又不太符合理性不能影响社会这个说法，这一点让我发现我的言论

变得十分矛盾了。

我常说，不管哪个时代的人都认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总是被这种少数观念所牵引。一个真理被认可，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它转变成一种情绪，才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个说法让我的言论变得非常矛盾，我自己把自己的言论推翻了，真的很荒谬。这种证明相反观点的学说，看上去像是又不是，所以就只有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其实质却又不矛盾。如果依据 1789 年的请愿书去考察人民的要求，在那个革命的时代，人民的原意是取消封建统治者的特权，提倡制定平等、公平的法律制度，而不是要完全推翻封建王朝。这明显可以证明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卢梭的主张，他的主张被大肆宣扬的时候，距离革命的产生已经三年之久了。不过我们应该明白，卢梭提出的看上去是新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旧的思想。为什么旧的思想被他提出来就能够影响人们的心理呢？肯定是有缘由的。以前，人们愿意臣服于王权，臣服于这个拥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人，也是大势所趋，因为我们不能破坏国家的稳定，就算有人鼓动大家，宣扬人民应该自己当家做主，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不需要畏惧君主的权势，应该推翻君主专制，用人民专制来替代。现在的贫富差距与公平是相悖的，应该把所有的财产整合到一起然后再平均地分配给人民。人性都是贪婪、有欲望的，很容易被这种不良的理论所煽动，当然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如果政府今天利用著名的哲学家的名誉，制定出可以杀人、劫财、作恶的法令，相信那些人也会以一种开心的、崇敬的态度去服从，只不过还不到时候而已。但是，这样的理论一定不可能长久地存在，因为它只具有破坏性，对于社会建设没有一点儿帮助。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民肯定会认清事实，醒悟过来，然后推举一个有才华、有气魄的人来除去祸患，然后推举他为领导人。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可以看出，理性可以改造社会这一观点，只会被那些小人利用来扰乱社会，在建设社会方面简直一无是处。所以革命这件事，也不会破坏到我的理论。

六

今天，人民对于政府仍然还抱有某些幻想，认为政府还是有能力的。其实，政府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还不足以做出一件令人满意的事情，但做坏事反而绰绰有余了。因为毁坏一样东西很容易，而要重新建设好一样东西就很难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仅仅只对经济因素的残酷做好防备，还要积极做好准备应付那些盲目立法的人的害人思想。

关于这个内容，我还会在后面进行详细的讲解。现在我们先简单地阐述一下近年来那些不好的制度，做个大致的了解。那些被称之为社会制度的制度，其实对人民没有一点儿好处，反而总是阻碍工业的发展。比如学艺的制度，往往把那些一心想学门好手艺的学徒们拒之门外，导致很多这样的人变成了杀人的罪犯。看着现在社会越来越多的少年犯，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没错。再比如关于宗教的制度，一味地抑制人民对宗教的信仰，导致法国被分割成了两个相互敌对的民族。又比如关税的制度，它的煽动性导致了很多外国国家对它的报复。像这一类的制度，都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与自然灾害比起来，对我们所造成的负担，也是很沉重的。

我们的本意并不是要反对理性，只是为了说明既然说了那些现象无法用理性去改变，那么就真的无法用理性去改变。总而言之，理性理论在科学研究和知识运用方面是合适的，而统治人民和创造历史就必须要用到感性理论和宗教信仰了。

第三章 政治心理的研究方法

一

要对政治心理进行研究，我们第一步就应该要观察事实，然后用事实说话，以事实为依据来进行解释，最后就是从中找到它的规律，研究其他的科学也要采用这样的程序。

在政治中把一件事情观察清楚是很简单的，但要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就有难度了。什么是解释，就是除了要找出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还要对这个事件的结果进行预测。1870 年的那场革命，法国军队战败，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会失败呢？如果想在下一次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改革方式呢？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遇到困难了。暂且先借鉴一下近 20 年来的军事章程和著作来考核一下，结果发现，因为规则更换太过频繁，前后说法不一致。要想解释清楚，就不太容易了。

政治事件一直不断地发生，也为我们增加了一点儿难度，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事件的一小部分，不够全面。如果看走了眼，就会与事实不符，解说一件有失偏颇的事实不是很可笑、认识也不清晰吗？

如果只凭直觉做事是不足以称其为研究的，做研究，既要有严谨的态

度，也要有严谨的工作方法。像研究生物学一样所用到的方法，才可以称之为研究。

要对一件事物的表象进行研究，政治心理学者也要像博物学家一样，先收集资料，把各种不同的事物表象整理到一起，然后再进行分析整理，找到那些被表象所掩盖住的内在规律。比如博物学家认为鲸是哺乳动物，如果只看外表，鲸和鲨鱼长得是很像的，但和松鼠相比就差得太多了。但是，博物学家看到的现象和我们截然不同。只可惜，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往往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就不再深入研究，妄下结论。

从这一点来看，研究政治心理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如何发现一件事情的近因和远因，而它的原因也许不止一种，我们不能有这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就只有一种原因。先列举一些例子来看一下，究竟做研究有多复杂、多艰难。

二

改变现在的命运，创造幸福的未来，是社会发展最希望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这一个要素，就代表着很强大的力量了。

以前的人民也希望可以改变社会，但那时候他们的决心不像现在的人民这么强烈，这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总是喜欢自己安慰自己，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但今天的人民，已经没有那么虔诚的宗教信仰了，他们更现实，希望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但人们从这个希望中可以获得什么乐趣呢？近代心理学者曾做过考察，他们的研究指出，人们对宗教那份信仰的感情是很难磨灭的，他们经常会觉得自己必须要信仰某个宗教。

前面所说的政治心理的因素这个特征，其实是任何民族都拥有的。就算

是这样，意识形态因各地域的不同，也还有不同的说法。每个国家的种族差异导致政治主张也就有差别。就好像拉丁人和美国人，拉丁人有比较强的服从意识，有一种时刻想被他人保护的期许；而美国人认为自己能力很强，喜欢个人英雄主义。

当然，除了各种族的秉性不同以外，他们还有不同的历史。那些把中央集权推崇了数百年的民族，他们的社会、商业以及宗教等都把受国家的干涉变成了一种习惯；与那些建立时间很短的，又没有什么历史、政治，也没有什么过去的负担的国家，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现在的国家，就像一个保护伞，每一个政党，每一个阶级都会要求国家去干涉去保护。

如果这个国家的开创者和宣扬者是工业家，那么他们会希望国家为他们启用关税、补助等让他变得富裕起来。但是这样一来，良性的竞争就被完全破坏了，那些自主和创新也就因此而变得颓废、萎靡不振。总之，他们就是这样把进步阻止了。

当劳动者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强的时候，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去要求国家，去反对那些资本家。为了满足劳动者的这些要求，国家就把那些专制权力、掠夺手段运用起来。例如制定养老金的一些规定，收回了铁道，征收重税，扩充专利。虽然这样工业没有被破坏掉，可是人民的贫富差距还是存在。

上面讲的只是一些方面，这种学说在群众中的传播还需要继续去研究。为什么那些空泛的论调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广大群众在内心深处有着对它的需求。

三

造成某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就像前文中提到的。而且力量有强有弱，不会全都一样。可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评判呢？其实有两种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非常简单，是一般人民平常用习惯了的。

有些人对事物的表象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以为造成这种表象的因素就只有一种，既然如此简单，那么治理起来自然也就不难了。如果某个地方的工人对自己的现有生活状态有所不满，那就可以通过强制富人交纳所得税的法律来帮助穷人；如果某个国家人口增长率为零，那么就加重孩子生得少的人民的税负。这样的政治家看问题都比较简单，所以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大都类似于这样。

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是被观察者喜欢使用的，同时，这也是吸取了很多政治心理的经验教训所总结的方法。前文中说过，导致一个社会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有近因也有远因，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认清它的类别，然后再判断它的重要性。物理学者在研究某种现象时通常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因此，让物理学者去使用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得心应手，但要政治学家采用就没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物理学家可以遵循以往的经验，但政治学家却不行，他们只能一边观察一边尝试着应用。在社会实践中，也不是没有经验可借鉴，只是我们手中握有的这些经验，无法让我们这些人的意志重新启动，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再运用自如地让它重新启动了。

要评判某种因素是不是重要，偶尔也会很简单。比如，不管什么时候，哪个民族，都一样会产生那些因素，同时其他固定不变的因素依然固定不变。这种评判方法，只有那些平凡简单的事物比较适合，由它所造成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好与坏。比如说，在战乱之后，一定会出现军阀专制的局面；强大

的国家必然会将弱小的国家收入囊中。至于用什么方法去辨别因素的种类，应该对一种社会现象的两种必要因素一清二楚：一种是长期的，一种是短暂的。长期的因素与各种现象会一直都有关系，比如家族的遗传性、历史上宗教的政治地位、社会情感等。短暂的因素变化较少，但不可能取代长期的因素。在过去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民族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审美观，但过不了多长时间遗传性又会再次出现，重新回到激进革命以前所使用的方式。

在过去，种族的力量被掩盖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不见，所以它总是被人们忽略掉。其实，对促进民族的进步它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比如，法国总是发生政治变动，但都离不开两个原则：一是相信国家具有潜力也有能力进行改造，二是对法律的威望绝对地相信并服从。所以，国家的强大、社会主义的扩张就是由于这两个因素，它们是根本。对于这一点，我在下文中还会另外详细地阐述。

由此可见，要想对一个民族的事情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对这个种族的特点和它的历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研究种族所特有的性质并不困难，因为它只具有很少的重要特征。比如，美国人的民族特性，是刚直、自信、开朗、要求公平、崇尚自由、不喜欢国家干涉个人自由等。要对其他的种族有所了解，就必须对他的政府先做了解，但对美国不能这样，要了解美国人无须从他的政府下手，恰恰相反，要完全脱离于政府之外。一个国家具有如此个性的人民，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前途。至于那个成天都在发生动乱，位处美洲的可怜的拉丁共和国，也是可以看到的那极少数的个性的。

既然我们可以寻找到重要的因素去研究社会现象，自然就更容易解决政治心理的问题了。只是，会遇到很多突发的因素，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困难，就算有难度，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仍有踪迹可寻。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除了长期因素，当时的思想行为还包括一种少数的原则范围。比如第二帝国的政策，它的指南是国民主义；现在的社会主义，已经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

监督，其主要的观点仍然是提倡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学会变通，就显得呆板了。

四

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因素，有的比较重要，有的则次要一些。因此，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评判就是政治心理应该做的一件事，把导致事情发生的主要因素找出来，然后把那些次要的因素剔除。政治心理和进行科学研究一样，要把次要的因素剔除掉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科学进步较快，出现某种现象也不可能只出于一种原因，只不过因为观察得不彻底，所以大都解释得比较肤浅。就像我们在天平上放一个重物，是什么力量吸引这些质量呢？除了地球，还有不计其数的吸引力。可这些力量对我们地球来说微不足道，所以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博物学家会忽略其他的因素，只关注这个因素。正是因为忽略了行星在运行过程中所附带的其他力量，所以才得出了开普勒定律。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就应该做到这样。但要明白，这个因素在这种时候并没有特别重要，也许在其他某些时候才会发挥出其特有的力量。物理学家对波义耳定律都比较认可，觉得它比较真实，其实它之所以真实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的附带因素都忽略了。如果应该忽视的因素，被当成重要的因素看待，那么波义耳定律的规则就会变得有误了。

以前的学者对规则的理解比较绝对化，不过发展到现在，这种观念也逐渐地淡化了。我们不敢说政治心理的原则是比较固化的物理规则，因为经常有一些预计不到的因素来进行干扰。偶尔，想试着运用一下规则，就湮灭于匆匆而来的舆论潮流中。假设政治家能及时发现这其中的奥妙，就可以对这

种潮流的发生进行正面的引导，退一步说可以对这种潮流进行指导。所以，1870 年俾斯麦才可以取得成功。

这种突如其来的舆论，隐含着一股非常大的力量，甚至让人无法抵挡。因此，拿破仑说："讲述的是事实，进行诱导的是公共精神。我不想自作主张，因为我经常被时事所控制。"

根据过往历史的例子不难看出，那些民众运动是容易发生变化的。数百年来，比如帝国英雄的伟大成绩、君主的复位、浪漫主义的广泛传播、建立第二帝国及博兰格尔事件，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马基雅维利的君王，现在我们可以称其为群众，他们的力量是十分卓越的。所有的意志都朝向同一个方向，只不过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不长，每一个政治家都应该清楚这一点。

一个时代的民众潮流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所欣赏。刚开始革命时，没有人能想得到它会如此可怕。有这么一句谚语，说"舟之将沉，舟客互贺"，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让里斯夫人、奥尔良亲王的女使目睹了巴士底狱的灭亡。当时，那些贵族还对所发生的运动表示同情。就像现在第一次出现邮政员工的罢工时，那些盲目的中产阶级也深表了同情。没有人能搞得明白那些千丝万缕、互相联系的政治心理现象，堆积得越多，发展就会越快，古往今来都是一样。

如今这个时代，很明显，领导者想要慎重治理不容易。更主要的是，群众和领导者的思想不一致，双方之间的意见和隔阂无法得到很好的领会和缓解。

我们说，要与意见一致、志趣相同的人一起相处，要知道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领导方针。人民只会服从于劳动联合会的领导，至于什么大方针、原则，动人的人道主义学说，反正也知道那些人都不在乎这些，所以一般也不在考虑之列。群众只会听从比较简单的言论，特别信服，而那些名声较大的人的言论，或者政府委员的论调，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种用来诱导群众的政治心理虽然很简单，但也正是因为简单，才会符合人民群众的心理，才会让人民群众愿意听从指令。不要看群众的思想简单，一旦政客们出现了什么纰漏，很容易被他们洞悉，所以群众的意见，对管理者而言是非常有益的。有时候想起那场邮政员工的运动，政府在表示退让时，劳动团有领导说："邮递员会因此而看到他们所没有意识到力量，这是在铸成不可饶恕的大错。"

五

我们把远期的因素、近期的因素、长期的因素、短期的因素等各种因素都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社会公式。不知道这个公式能不能解决精神问题？只要管理人员不放肆去扰乱，那么自然规则是可以解决这个公式的。

前文就已经讲过，导致一种社会现象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但因为活动本身，所以总是隐藏得很深，让人不能轻易发觉。把各种因素结合起来组成指挥人民命运的力量，通常人民都会很愿意顺从这种指挥的。就好像提线木偶一样，只能随着提线而移动，完全没有自由。

某些时刻，就算这种力量无比强大，人民也不会乖乖地接受。以前的人如果完全受这种力量的驱使，那就不可能脱离这种野蛮的习性而发展成文明社会。因此，人们自然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去抵抗自然的力量，这种方法，在本文的后面会有详细介绍。

简单来说，就是预测和预防而已。预测有很大的好处，预防则更不用说了。我们怎么做才能够预防呢？下文自会介绍，脱离不了沙丘死亡定律。

第二篇

政治生活的公理原因

我们的历史中时常可见法律万能这种学说的权势。生长在战乱时期的人，坚信制度能够重塑社会，极度信仰理性的力量，因此法令多借理性之名义颁布。

第一章 法律来源及立法幻想

一

政治事件的产生，往往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对群众来说并不陌生。其中，法律至高无上这一原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

时至今日，很多法国人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束缚。他们拒斥神意，嘲笑迷信，怀疑托梦和这个富含诡秘色彩的数字 13……但是却很难找到怀疑宪法条例和法律权力的人。人们坚信法律条文拥有改变普通群众以及国家社会状况的能力。所有的改革貌似都可以运用法律的力量来进行，包括抑强扶弱、劫富济贫、打破社会樊篱和实现全民小康等。

此种法律万能的学说，是唯一被现在的理论家奉为圭臬的学说。假如我们可以掌控政党的意向，那么法国仅存在一个政党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无论是哪个政党，都试图使用法律改造社会，让国家来控制人民的社会生活。如果遇见一个法国人，我们不需要去猜测他是否为教会党派，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定属于国家党。

我们的历史中时常可见法律万能这种学说的权势。生长在战乱时期的人，坚信制度能够重塑社会，极度信仰理性的力量，因此法令多借理性之名义颁布。

信奉宗教的民族，迫切希望以法律的力量来解救痛苦的心理。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神迹可以显现，就只好乞灵于法律的力量。在人民的迫切要求下孕育而生的法令，都会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典中的命令和规定中轻易地看出来。这种法令的真正效力，不在于领导者的势力，而在于被领导者的服从。

此种看法是历史所造成的最可悲的错误，而它在拉丁民族中却极为普遍。他们甚至会为了捍卫这种观念而慷慨赴死，使繁荣的城市变成废墟，使强大的帝国开始衰落。

幸运的是，一部分哲学家，包括我在内，指出了这种观念的错误，我在《民族进化心理规则》这本书中有详细阐释。但是由于群众倾向于改变感官，十分容易受到激进党派的言论的影响，因此我的著作的作用并不明显。

诚然，“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虽然不会惧怕反复申说的言论，可是它停滞在萌芽时期的危险却一直存在。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

二

制定法律者坚信法律万能。他们不思考社会存在苦难的真正原因，试图以法律来改造社会。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法律经过无数次的表决之后被颁布，其效果让人大失所望。于是，他们或者再次开始新的立法，或者是通过不断督促内阁成员、任命委员监督执行等办法不断地干涉行政厅，试图使法律发挥作用。现在的议会制度与过去的国约议会区别并不明显，以拉丁民族为例，拉丁民族看似刚刚摆脱了专制，其实是重新恢复了它，唯一不同的是以多数人的专制取代了个人的专制。

我们的历史中有很多人遭受了法律的迫害。1848 年我国颁布了多项工作

法律条文，开办国民工厂。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最完善的法令。出乎意料的是，由于经济因素凌驾于立法者的意志之上，所以工厂被迫关闭。而工厂的关闭，带来了暴力革命和恐怖的杀戮。再加上色当战役的失利，造成了外国势力的侵入。于是，最终的后果就是帝国的崩溃与重建。

许多法令制定的初衷都与结果大相径庭。比如本意是为了激励航海者航业，但是这项法令却造成了商航的衰落。再比如本意是为了发展殖民地文明而制定的法令，结果却造成了殖民地的衰败。立法者根本不能理解所谓的平等道德，为了镇压群众，而制定出极为残暴的法令。比如教会分离法的制定，导致了教会数以千计的产业的损失。

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还能够勉强维持，是由于遵守了固定的法令。新法令的制定会带来官员数量的增加。而官员数量若过于庞大，就会变为法令实施的障碍。以劳动法为例，劳动法中增加的 50 万名观察员，导致了法令的无法施行，工厂由此才得以保全。如果这个法令得以施行的话，则能够预见在官员干涉下的工业开始衰败的前景。

触犯国家法律的人数如果过多，也会导致法令的无法施行。因为法律只能够给小部分犯法者定罪，如果每个人都犯法，则以往的犯罪就变为现在的权力了。这种类型的法令存在众多，比如反对投机事业、约束无限公司以及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契约法令等。我们如果探究法律产生的真正原因，就会很容易理解这类法律为什么会失效。

这样来说，我更倾向于废除这种类型的法律。不过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认定所有的法律都是恶法，我们也有很多良法。但是对我们有利的法律靠的是一定的力量的影响，它与立法者的意志无关。我们如果想知道什么情况下该立法，什么情况下不该立法，就需要从法律的根本上来寻找答案。

我们深思熟虑之后需要知道，一个民族只能采用与这个民族心理相符合的法令。德国看似照搬了罗马的法律，可是采用之后，就变成了德国的法令了。

采用英国宪法的国家为数不少，但是真正能施行的就仅仅是英国一国而已。

三

追本溯源，我们可以把法令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起初是习惯，然后是惯例，最后在立法者的推广之下深入人心，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真正的法律就是利用人们业已形成的习惯来制定条文。我们的人民法典，多被人们以为制定于拿破仑所领导的法制会，但是他的制定只是综合了各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完成了法令的统一，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所以此时的法典，只能称为旧法典，而不能称为新法典。

习惯形成于每天存在的社会工业和经济生活之中，然后人们约定俗成地把它固定下来，成为法令，以对人民进行约束惩治。因此，法令制裁的，仅仅是暂时的社会状况。因为现在文明发展的速度往往超过法律，所以不能依靠一时的惯例，而是需要时常更新那些已经过时的法令。在法官没有自主权的国家，要加快法令更新的速度。而在法官拥有自主权的国家，例如英国，就无须更改法令，因为英国的法官有权力依据现实对法令进行修改。

由于社会进步的速度往往超过法律的更新速度，所以惯例的作用就显得意义重大。惯例从古至今，在所有国家中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古时的罗马人非常遵纪守法，但是从艾克吕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法庭经常存在审判与法律条文相悖的案例。既然如此，现代的人们却依然把罗马的法律奉为圭臬，这是十分可笑的。

实际上，法律需要进步，但是历史中却并没有法令规定这一点。伊斯兰教的法令历来都为《可兰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

已经难以按照它的法令执行下去了。因此，现在的伊斯兰教信徒虽然仍旧信奉《可兰经》，但是已经有了新的解释作为执行的法令。这和罗马人信奉12章法却并不施行，是十分相似的。

由上可知，法令以外的进步表现为惯例和审判。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时候这些惯例还会与法律相悖。法令一向不能与惯例相抗衡。涂尔干教授说："假如家庭婚姻生活趋向乱伦，用法律去禁止是无效的。"这虽然只是假设，但是结论却是正确的。请问现在的哪个法庭，可以以"杀人"之名来审判绝育之人呢？法令难道不禁止堕胎吗？但是，由于陪审团通常会释放那些触犯法律的人，所以法官最后也不愿意去追究。

没有惯例来纠偏的法律，几乎可以说是不公平的规定。法律曾经规定水手的妻子只有在持有水手的死亡证书时，才可以改嫁。假如没有惯例的存在，那么水手的妻子就只能终生守寡。法律曾经禁止追究私生子的父亲，但是惯例却认为诱奸之人要用给予抚养费的方式，承担其抚养子女的义务。这样来说，惯例的存在是有益处的。

如前所述，法令的根本任务是运用成文的习惯来管理人民。也就是说，法令就是把习惯变为惯例，然后以成文的方式固定下来。法令的形成必须经过这两个阶段，如若不然，那么它的公布之日，便是它的终结之时。

由习惯形成惯例，进而产生新的权利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以前我国的平政院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行政机关，但是现在它的权力增加了不少，使得以前管理别人的人，现在却被别人所管理。原因无他，是由于惯例的业已形成。至于这种惯例形成的原因，则是由于人民试图约束总长官或者是政府的权力，于是就把撤销总长府知事和任命官员等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机关。法令也对民主国家必须设立这种独立的机构有所规定，美国下议院便是因此而设立。

我再举一个英国的例子，说明法令权力的产生不全来自成文的法令。英

国政府统治的基本原则，并不依据成文的法令。比如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两院的划分、议员的责任等，然而英国的法律机构却是世界的典范。现在的英国人都可以称作公民，尤其是他们的统治者由君主变为首相，使人民拥有了最大的自由。现在的国家，只有美国可以与之比肩。人们可以随心选择是否去教堂，而不用担心或显或隐的威胁；人民可以保持私有财产，不用担心被国家没收征用。英国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我国以前来自君王、今天来自预审官的秘密逮捕令。而且英国在秩序、理性、统一等观念上与我国相反。正如张伯伦所说，英国宪法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与世俗伦理并不相符。换而言之，他认为应该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来制定法律。

可惜的是，法国人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对于法律本身的误解引发了数次革命，大部分是破坏和杀戮，这种情况以后也会不断发生。总而言之，法律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法律并非是向壁虚构的。

第二章　法律祸

一

为了证实上述论断，我在此举出一些想法奇特的立法者制定法令的例子，并且将对他们加以评价。

根据故事，古代波斯著名的国王薛西斯对于大海吞没船只的事件极为恼怒，因此用鞭子来鞭打大海。他好像认为只要对大海进行惩罚，它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而此种显而易见的心理，与现在的立法者试图改造社会的想法并无二致。

与物理规则相似，现存社会的各种因素，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对它们的忽视实际上是变相的接受。用法令去抗拒它，结果会如何呢？那么现在的立法者与革命者尝试用法令改造这个社会结果又会如何呢？那就唯有等待历史来见证了。

只有结果出现的时候，这些幻想才会破灭。雪丹战争已经充分展现了专制独裁主义的危害，社会党的专制独裁主义迟早也会受到这种教训。

二

我们在前面一章共同研究了空想立法，已经大概地阐述了生活中的法令与立法的根本。法律是基于习惯而产生，作为惯例被固定下来，为持续的进步而制定规则的法令条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性质的改变，这些条文也随之更新，并不像共产主义的理想家所认为的那么简单。

我认为社会党之所以存在空想立法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大都认为梭伦创立了拿破仑法典，就如同这法典只出自一人之手。殊不知这种法典的产生并不是创造，而是各个地区旧有习惯的综合整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拿破仑法典源于古代，而瑞士和德国的法典却成于近代。

自从革命主义广泛传播之后，一些理论家就认为法令可以改变社会，而且妄图将以前的天赋人权之说附于法令。然而这种信仰只能影响神明干涉人事、帝王为神明的代言人的时代。以前的理论家并不明白根深蒂固的天然法则不可改变，因此，如今的社会党人也完全不了解这些道理。但是他们宣扬他们的理论，比以前的牧师们更为卖力。

我们的想法异于这种幻想理论。我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形成于种种远因与近因的相互关联之中。无数的隐匿的微小的因素累积成为大的结果，这过程如同行星的发展轨迹，也类似于果实由种子长成大树。在这些小的因素累积的最初阶段，它们的力量十分有限，能够掌控和限制，但是当积蓄的力量逐渐增强以至于形成一种潮流之时，社会的阻挡就无济于事，而革命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民族进步的形式。

由于理性的力量过于单薄，因此古时宗教帝国的缔造者早已抛弃理性，而转用感性。但是这种个人英雄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现在我们处于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时代，经济需求的法典取代了宗教法典的位置，用神明来统治社会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如果用法令来改造社会，就如同用演讲来阻止轰鸣

而来的火车，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借过去时代的经验可以评价现在的社会状况。法令随着社会漏洞增多而增加，而法令越多对社会的危害也越大，因为它强行遏制了事物的自然发展。

三

仅靠一本著作，是无法完全呈现出这种不利的法令和它们的反作用的，以下例子仅仅是管中窥豹。我无意于指责那些不含恶意的立法者，而只是想说明他们立法的结果。

商船奖金法颁布之后，每年需要花费 41 万法郎。它带来的结果便是我国商船事业的衰败和德国航空公司的发展。俞耐和北德意志的劳埃德公司的总理普莱特的谈话证明了我的看法。

俞耐向见证了德国海港的繁荣发达的普莱特发问，何以德国的航业公司可以进步，而法国的航业公司却走向衰落。普莱特回答道:“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我们采用商船奖励法，来加速它们的消亡。我们奖励无所作为的商船，它们如何振兴起来呢？这种办法，非常适合那些觊觎我们奖金的人。我们的奖金，足够让英国人为德国人做事。由于我们国家的人民得到了利益，因此我不该把这种办法透露于你。但是，你既然询问我了，我也只好据实以告了。”普莱特接着说:“由于法国政府给予奖金，所以外国人集中资金在法国设立公司。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奖金给予的标准是按照里程计算，就像这些航行公司在利用法国的奖金来周游世界。有些船主对我说，空船航行八年就可以收回船只的成本。因此，这些商船为了船只的轻便，提高航行速度，拒绝载货。”俞耐说：“如今法令已经修改了，只有载货的商船才可以拿到奖金。你的说法并不符实。”普莱特答：“虽然法令已经修改，但是规定载货四分之一就

可以得到奖金，与没有修改的法令相差并不大。很多德国人也希望像法国那样，要求给予奖金，但都被各大公司的总理否定了。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不能像法国的商航那样衰败下去。我们人民的自主自由的活动一旦被限制，会加速商行的毁灭。”

我们再来看一个 1900 年限制工厂使用童工的法令。这个法令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废除学徒工修炼行业，而这必然会引起未来工业的恐慌；其二，犯罪儿童的数量增加。上议院议员图龙在报告中说：“自从法令施行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家不能再雇用童工。这些儿童无事可做，因此就无可避免地堕落成了游民强盗。仅以巴黎这个城市为例，青少年犯罪的人数，已经由 1474 人，增加到了 2273 人。”

酿酒特权法。这个法令准许拥有酿酒原料的人自己酿酒，不需要纳税。因此，酿酒者每酿一百公升的酒就可以得到 240 法郎的利润。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国家每年损失 100 亿法郎的收入；二是加大了酒精的危害程度，很多由于酒价过高而无力饮酒的家庭，饱尝了酒业的苦果。

教会集会产业收入法。我们暂时看不到这个法令的最后结果。但是以现在的理论来看，教会的预算产业收入为 1000 亿法郎，目前收入则不超过 10 亿法郎。不仅如此，支出的金额在持续增长，比如为了代替以前教会集会名下的学校医院，新成立了许多学校医院。由此可见，预期的收入没有得到，数百亿法郎的支出已经产生。这还仅以利润为例，如果以社会结果为例，那么它则使无数公民牢骚满腹。发展社会党虽然了解公民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却仍然制定这条法令，即便是外国人也觉得这不公平。我们的损失，与之前屡次战败之后的损失相比更为巨大，这件事情应该专门研究。

制糖奖金法。这个法令造成了制糖业的过度出口。如此一来，本国人民购糖的价格，较之于英国，高出 3 ～ 4 倍，导致我们国家无形中损失了数百亿法郎。目前，虽然这个法令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制糖者对于本国人民的掠

夺已经无法挽回了。

咖啡酒店饮料行业营业自由法。这个法令看似没有损失国家一分一毫，但是国民的消费却增加不少。这也增加了酒精的危害，医院里面都是病人，我国的国力也因此不振。若以造成的损失而论，怎有胜于这个法令的？

西部铁路收回法。由于这个法令颁布的时间甚短，因此要过些时日才可完全看出其结果。现在看来，自从公布这个法令之后，铁路工作人员便要求加薪。如果依据杜麦的报告，1910 年间，我们国家的损失已经达到了 50 亿法郎。社会党不清楚的是，许多收归国有的企业，都遭到了亏损。

救济南部葡萄荒法令。这种法令的数量不少，但是，自然的需求是无法用法令来满足的。在南方种植过量的葡萄之时，葡萄酒的产量也随之增加，再加上酿酒的原料很充足，因此葡萄酒的产量极为丰富。如果试图补救，那么就应该按照往常种植茜草的经验来做，放弃种植茜草，改种其他植物。但是目前国家的救助办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投入大量资金来收购或者对其进行补助。这种现象在英、美等国家并不存在，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富于创造力，不同于我们的国家，由于人民过分相信国家的能力而时常需要国家的帮助。

工人养老法。虽然这个法令还没有颁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未来。大多数工人一定反对这个法令，而它也将成为扰乱国家社会的罪魁祸首。目前我们处于私人发展的公共事业发达的时期，不可以运用国家的强迫手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强制的法令，不但会造成大部分人的贿赂行为，导致小部分人谋得利润，而且会使工厂主的负担加重，怎么能够撒手不管呢？因此，共计赎金可以返还，而养老金则不能发放。《时间时报》的评论说道："既要避免工厂的损失，又要达到养老的目的，身为劳动者就需要符合多项条件。其中的一项年满 65 岁的条件，则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满足的。如果不满 65 岁就去世的话，其生前所缴纳的保险金就为别人所拥有了。很多人缴纳保

险金，是为了养老。因为害怕存储的工人不会缴纳保险金，法令就规定工厂主从薪金中直接扣除。如果每次发工资的时候，因为此事造成纠纷，就是在引发阶级矛盾。”

四

如前所述的那些法律造成的损失，存在的仍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制定法律的危害如此严重，导致人们无法满足愿望之处也日渐增多。它造成人们的不满之处，将在后文展现。患者在医生所开的药方见效甚微的情况下，通常会怪罪医生，就像我们的人民对于法令一样。

总而言之，这些所谓的人道法令，都具有其危害之处，危害积累日久，就容易产生大的祸害，我们目前已经能够察觉到它的效应了。

这些法令造成了工业的停滞不前，劳动者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失业是其常见形态。国外的竞争十分激烈，这些劳动者如何立身呢？还有很多人也认为这些法令有百害而无一利。

保罗·德隆布尔曾说：“现在的所谓的社会政策增加了很多的社会负担，如果它有缓和与安慰的作用，那我无话可说。只怕它在平息社会众怒的初始时期，就已经使我们民众陷入了破产的环境。”

朱雷·勒内说：“我们这些政府官员，在国内提倡一种神秘心理。就是为了让人民大众相信，我们有变水为酒、点铜成金、变面为饼、转贫成富的能力，就算是普通的实验者，相信国家政治与社会的能力，更胜过相信皮连山圣女的神奇。至于何以效果显现得如此之慢，他会认为是议员的法令仍然不够强大。”两院的议员大都随性而为，而这就是改革法国现状的途径。

这类劝诫虽然不至于不正确，但是也没有可取之处。远古神灵灭亡人类

之前，首先要使她的眼睛失明，现在也是如此。这种无意间制定法律的后果，在立法者身上逐步地显现出来，历史中也不乏这类结果。波舒哀同样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人类的思想总是被欲望所利用，因此，欲望常常超过思想，而且有的时候会否定他的思想。”

第三章　可怕的政治势力

一

尽管人们尝试把神秘之说看作一种潜藏的力量，而且探究它的构成与原则，但人们还是不了解它。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历史中形成的大事件，都是由这种潜藏的力量所造成的。历史中各个民族的兴衰变化，都由潜藏的力量汇合而成，这也解释了从古至今的政治家为何要夺取潜藏之力。

种种潜藏之力并不相等，有大有小。最大的力量来自最上层的潜藏之力，它的势力非常可怕。制服这种力量别无他法，只能寄希望于足够的时间，这也是创造伟大信仰者的潜力。这些人即便身已腐朽，也可令无数信徒折腰臣服。人民为了尊奉这些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也曾经深受战争的摧毁。近些年来，3 万美国人也是因为这些而遭到了杀戮。

英雄的潜力是较之于上述人稍弱的一种力量。他们的力量，仅仅留存在民众的意志之中，传说和古语中都可见到他们的影子，这些力量足以影响后世。例如拿破仑的潜力，就能够辅助他的侄子取得政权，却让我们遭受雪丹战役的耻辱。

力量最小的是那些骚动不安的微小的潜在之力。这些人并不拥有实际的

能力，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就像肥皂泡一样，轻轻一碰就消亡了。但是它也能够管制人，这是由于其后有大的潜在之力存在。这些大的潜在之力，无法动摇，无法破坏。世界出现之后，权势的力量并无消减，它们的影响十分深远，正是它们，产生了无数的微小力量。

古罗马诗人鲁克里斯认为，神明造成了这种可怕的潜在之力。我无法判断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如果这种恐怖的力量，无法控制人民和它的领导者，那么历史的进步，一定有异于我们的认识。我们还能够肯定，那些产生于这个可怕的潜在之力的无数微小力量，不会影响议会。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骚动，有朝一日终会成为改革社会不可或缺的法律秩序。

二

只有极少数杰出的政治家知道，这种源自强大力量的潜在之力要怎样运用，普通政客只能随波逐流。

邮政职员的罢工就可以将历史改变，这一方面彰显了统治阶层的无能，面对潜在力量只会一味地害怕退却；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潜在的力量虽然能在不知如何运用手段的条件下有所扩大，但是在一定手段下，像肥皂泡一样无形中毁灭也是必然的。邮政职员所创造的潜在力量很弱小，也很容易被毁灭掉。我在这方面的预见性文章刊在《观点报》中。但是政府因为害怕，立马就对他们妥协了，邮政职员所说的“几乎是跪着恳求我们回去工作”，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怯懦。

但是这次妥协也带来了一定的益处。一国之中，如果一个阶层、一个联盟、一个政党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会以主人的姿态出现。这个邮政职员联盟，自认为他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可以镇压议会官厅和军队，在这个潜在之

力还未扩大之时，就利用它，以某件事为借口宣称罢工。除非我们承认法国的统治者为邮政员代表，否则，我们就必须自我防范。当局如果在第一时间就进行镇压，这个肥皂泡就会破灭，同时这个潜在之力也将会消亡。其他的潜在之力，例如政府最为畏惧的总罢工等，也会随之风流云散。最可笑的是，这个总罢工的领导者，却即将进入议会成为其中的成员。只是在总罢工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议员。

综上所述，政府与邮政员联盟都没有利用潜在之力，从而造成了很多的无法宽恕的心理失误。政府的政治心理失误在于第一次没有抵抗。邮政员的政治心理失误则是妄图征服国家。这种举动，可一不可二，假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一旦失败就无法挽回。等到再次用罢工相威胁之时，就接近愚昧昏聩了。劳动联合总会的成员最严重的失误便在于他们的无能。虽然这些人拥有总罢工的机动领导权，却无所作为。遗憾的是，所有谈论这些潜在之力的人，都没有指出这种力量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身处幽暗，不为人知，而毁灭却是人所共见的。这个真相是无法被遮蔽的。

公安委员会亲自向劳动联合会宣告了总罢工和邮政员罢工的失败结果。直至此时，抵制镇压的益处才显现出来。由此次罢工的演变可知，微弱的潜在之力不足为惧。一旦他们明白我们的畏惧，他们的势力扩大得就十分容易，这种变化无法用语言说明。

我国的政治家从邮政员前后语气的变化中受教良多。起初，邮政员的语气十分礼貌恭敬；政府妥协之后，他们就一反常态。后来邮政员加入了劳动联合会，一变成为革命党和爱国党，进而开始以暴力形式破坏社会。《阅报》所刊访问邮政员罢工领导者一文即为明证。

三

政府的软弱无能是引发群众暴动的根本原因。此种教训，并不鲜见。暴动群众以舆论自由为借口，宣扬损毁、焚烧、叛逆与破坏。政府应该运用强有力的措施，来批驳谬见，管制舆论。但这些危害甚大的宣传之辞，却并不容易消解。今天宣判的有罪之人，隔天便为自由之身，惩罚的意义何在？当邮政员罢工之后，曾有议员建议赦免其罪，同意之人甚多。如果身为国家议员，却如此不负责任，平庸懦弱，那么法令又将如何施行？

目前的危险主要来自群众领导者的言论，而非行动。如果言论一旦深入人心，革命的发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我们应该记住巴黎公社叛乱时期，正是言论的巨大力量造成了京城一带的焚毁。

但是我们在应该镇压之时却一味惧怕。潜在之力一旦取代神祇主义，它的力量将强大得无法抵制。处在动乱时期的潜在之力，发展最为迅速。这种力量足可以将善良的平民变为杀戮的狂徒，正如革命时期船员将人溺毙，富基耶坦维尔被人断头一样可怕。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的社会虽然存在社会党的威胁，但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极端。如果仅仅试图以法令来控制这种可怕的潜在之力，是不可行的，这样只会使本国工业受挫。

人们信奉这种潜在之力，是由于选举人出于保护私利，而不顾及法令的制定。我们如果询问选举人是否收回西部铁路，那么我敢肯定，赞成者为十万分之一。

因此，立法者的盲从与附和，逐渐变成了人们在俱乐部、委员会、劳动团、酒店等地茶余饭后的谈资。例如，立法者会公布“帮助左派政党转变方向，消灭无耻的资本家、资产透明化”等舆论，来诱导群众。

这些舆论有其益处，了解大众心理的政客经常以此作为竞选资本。但是

他们从不实行，因为他们同样知晓群众从不利用理性。群众的服从来自情感的需要而非理性的支持，群众甚至乐于围观刺杀恺撒的布鲁斯。但是群众又怎会理解布鲁斯的行为仅仅是为了观察恺撒呢？

四

只有群众之中的非凡之辈，才能深刻理解群众心理。即使群众突然转向，这些人也可以应付自如。普通政客无法明白其中蕴含的深意。他们因为惧怕而画地为牢，将自己束缚在那一方狭窄的理论困境之中，随意立法，那些贻害无穷且无法实施的法令大都由此形成。这些法令将会危害国家的工业、商业和国库，而这些损失更甚于言论所造成。

近年来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潜在力量所引起的加价行为，这项行为是为了制定下议院提出的工人养老法草案。虽然这个立法还没有正式颁布，但是下议院议员人所共知这项法案无法通过，原因是每年需支出执行费用 700 亿～ 800 亿法郎。上议院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肯定表决，证明了其改正的决心。德隆布尔道出了真理，他说："下议院表决的养老法草案，会造成公有财产的损失和国民劳动的衰败。"因此，议员们因为畏惧潜在力量而制定法律，即便他们明白真理，又有何用？

单独一种力量，就足以使人们感到恐怖，何况再加上怨恨和羡慕这两种力量？这三种力量是操纵如今政治的重要因素，所得税法草案就是基于此而产生。据这个法案的提倡者所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公平和公正，这实在是大言不惭。

这个法令利用了人们的怨恨和羡慕心理而广受欢迎。如果民众知道纳税人只有 50 万的话，公平何在？这项法律最终因为议员的畏惧心理而通过表决。

如前所述，潜在之力，藏暗弃明。目前群众已有耳闻，少数社会党人由于嫉妒大工业家的兴旺事业，而存摧毁之意。善哉法介曾说：“一些政党之所以支持所得税法，是因为这个税法的税率可以独立制定。薄征亲善之人，而厚敛不睦之人，如此一来，选举就事半功倍了。”朱罗氏曾说：“这项民主制度的改革，是落后的草案，十分恶劣危险。它把公民的财产，交给独裁专制的统治者，这是损害和扰乱法令的草案。”庞加莱曾说：“这个草案引发了公共财产的危机，不仅会减少未来国家的收入，也使纳税人负担过重。这是国民产业和民众的危害，一旦执行，必有反抗。”

如上所述，由于这项法案危害深远，所以大家都不赞成。但是它竟然通过了表决。将来之事目前难以见到，只是目前的小学教员、酒商、社会党、委员会以及工人社团的力量都很强大，无人能够抵制。我之所以现在才讲这些人，是由于所得税法案并不涉及他们，他们也宣称不问此事。

五

统治者在这种潜在之力的压制下，恐惧了20年之久。由于这种潜在之力的影响，不利的法令和增收的赋税不断产生，致使工商业蒙受损失，工人阶级却从中得利。

由于恐惧，导致一个阶级借立法之名，来限制国内声誉显赫之人，进而谋取私利。这类人有很多，他们或者以宗教为由来剥削甲，或者以财产为由来剥削乙。如果我们的议员不仅畏惧教会、畏惧工人、畏惧革命党，甚至畏惧职员，那么将来恐怕要畏惧所有人了。

制定这些危害深远的法律是否能够赢得工人阶级的拥护呢？答案是不能。群众对于只有胁迫政府，才能得到的好处，没有感激，只有怨愤。

那么这些软弱无力的政府又因何而存在呢？答案是没有替代者。多尼亚克在《今日法国》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明确：“那些能够维持四十年的政权，与其说是它们本身的能力，倒不如说是敌人力量的贫弱。”

他的说法成为一种普遍观点。现在的政府如果仍然妄图延续，就要避免树敌。因此，政府应该转变统治策略，综合采用怀柔方式、强硬方式和镇压方式等多种政策来进行统治。若非如此，那么政权总有一天不仅支持者无多，而且会被群众所推翻。

诚然，这个忠告难以实行。最难之处莫过于我们要摆脱恐惧的威胁，如果不然，我们就会一直处于寄人篱下、任凭摆布的尴尬境地之中。而世界上最后一丝潜在之力，将随着世界的毁灭而消亡。

第四章 神权的近代变革——国家主义

一

拉丁民族共同信仰的国民宗教为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这种宗教盛行已久，深入人心，而且根深蒂固。它并不是过渡时期的宗教信仰，因此不能够用理性或者情感的力量去引导。由于它的教义已经普遍为大众所接受，深信不疑，所以如今除了少数没有权势的异类，没有人敢于对这种宗教置喙。我国虽然党派众多，如信教的教会党、保守的王朝党、激进的社会党等，他们吸收会员的方法也各异，但他们的实质基本相同，都属于国家党派。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党派都信奉教义。这种宗教的教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国家主义指所有的拉丁民族所信奉的宗教；狭义上讲，仅指法国所信奉的宗教。法国人国家民族意识强烈，他们认为国家创造了一切，因此国家有责任来领导、管理、指挥民众，同时也应该保护民众的自由。这种国家主义，如今已经逐渐取代了古代宗教中不可或缺的神鬼之义。

如果国家无视群众的要求，那么他们就会发生暴动。如此，国家需要拨款购买果农因种植过量而滞销的葡萄，需要斥资赔偿船主因无力与外国竞争而遭受的损失，更需要批准工人因贪图享受而要求享受的假期。长此以往，

随着群众要求的逐渐增多，国家管理的范围也日渐扩大。这样一来，工厂、铁路、航业等所有工业机构都由国家所控制，我们国家将变为共产主义社会。

国家主义不仅取代了神明的地位，也取代了过去作为神明代言人的君主的地位。路易十四作古已久，但我们国家仍然保留着他的统治方法，即集权专制。如果潜在之力的领导人对此提出异议，国家就会以遵循传统作答。集权专制制度在今天的存在，证明了它是古往今来治理国家的一种统一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如同死去的路易十四一样，是一种过时的制度。国家这种因循守旧的行为，和当时教会排斥异教徒的行为并无二致。

在如何对待群众这一点上，古时的君主与如今的领导人有鲜明的对比。古时的君主独裁专制，不听群众意见，而今天的领导人却过于听从民众的要求，这样就较难治理民众。与君主的行为相比，这种求宠行为更需要纠正。以制定律法而言，君主的出发点是追求整个国家的利益，但如今的政客却只是为了赢得竞选。如果民众明白政客只是空许诺言，而不会谋求进步，那么群众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些所谓的国家代表们。

前文已经引述过多尼亚克对于政府的看法，在此，我将再次引用他对国家专制的观点，来证实所谓的国家代表也有反对者。他认为："自从国家政权成立之后，一直因循守旧，采用君主时代的统治原则。政府对于外省的管理方法，与殖民地几乎相同。更甚的是对待外省的态度堪比对反对派。"外省办理事务，即使小如开拓市场、扩建水源，都需要经过中央的同意，秉承中央的意志，更不用说其他事情了。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是沿用古代君主监察外省的旧制度。

如今国家专制制度的普遍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证明了。以贻害无穷的法令而言，事实已经证明，今不如昔。如今的立法者目光短浅，缺乏长远规划。即使民众提出一些表面有利于世，实则危害深远的要求，他们也会不计代价地接受。没有比今天的政府更令人失望的了！国家主义的扩张，不仅镇压抵

制人民，也扰乱破坏国家。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详细叙述。

二

前文所述的政治心理方法，其实可以轻易地解决近来看似棘手的事情。以国家印刷局事件和海军事件为例，国家印刷局的建造迟迟不能完工，而海军投资无数却依旧衰微。调查委员会的发起者调查许久，仍旧无果，哲学家则认为没有必要寻求原因。除了建筑师之外，大家都认为国家印刷局无须重建。重建的预算为442350法郎，4年完工，而据监察委员会的正式数据，开工7年，实际开支已经达到10亿法郎。即便如此，国家印刷局的落成仍然遥遥无期。委员会调查后认为，这个项目耗资巨大是由于国家官员侵吞国家财产所致。他们铺张浪费，缺乏规划，前后耗费数十亿法郎的例子很多。例如一个建造完毕的楼梯，因为不符合装饰而重建；铺设完成的数千米长的地板，由于对某个科长的脚疾有碍，会感染肺炎，因此全部毁掉换成另一种劣质木板。这位科长的脚是如此贵重以至于国家为此耗费数十万法郎。不仅如此，还有更离谱的事情。因为忘记了墓穴的存在，导致斥巨资购买的各种机械无处安放，所以又重新毁掉一部分房屋来重新建造。国家经营不同于私人经营，私人若如此经营，早就倒闭了，但是国家却不至于。国家损失的钱财来自纳税人，而不是官吏。由这一个例子即可知道国家浪费的巨大，但是如果同调查所揭发的海军状况相比，这些损失只是九牛一毛。

据杜麦的报告，我国海军管理十分混乱，海军计划各异，程度参差不齐。国家没有治理的方法也无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积弊日久，海军实力由二等降至五等。而且根据委员会委员阿让的统计，海军消耗的资金达700亿法郎之巨。据卡约的统计，1899～1909年间，商航的奖励资金则为693亿法郎。两

项相加，耗资已经十分惊人了。这种资金的损失，不但无力使军航振兴，而且促成了商航的衰落。由阿让所说海军中的腐败事迹，我们就可以推知这类事情肯定还有很多。据阿让所讲，某个舰船由于不满意钢甲的重量，一再改变，由重换轻，再由轻换重，仅此一项就耗资300万法郎。众所周知，我国由于工业体系的落后，制造钢甲的成本已经超过英国的30%。其他国家两年就能完工的军舰，我国至少需要五年。因此阿让表示："国家不仅需要警惕这种铺张浪费的腐败行为，也应该惩治这种行为。"

类似之事，不胜枚举。土伦对一些被捕的军需承办商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25年中，所有的军需品都没有常规的入厂检查。这些军需承办商随意上交物资，致使国库蒙受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人都对此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国家主义政府的处事原则。这种原则，如果用来经营私人企业，只会导致破产。

三

上文已经讨论了海军、国家印刷局和其他国家事务混乱的根本原因。国家的领导已经转变成为官吏的治理。换言之，国家的责任分散至各个具体的部门中去，国家不具有任何责任。各个部门中的官吏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公共利益，他们既没有主动性，又相互猜忌。如果同一个人在私营企业中任职，结果就会不同。

外国海军强大而我国海军衰落的原因在于：外国海军的兴盛得益于私人企业的经营，我们的海军则逐渐受控于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国家主义的侵入，那么它一定会走向衰落。

《政治与议会》杂志刊登了英国议员考克斯哈罗德的演讲。考克斯哈罗

德表示："英国政府很少经营工业，可是一旦经营工业，就会损失巨大。由私人经营，则会获利很多。例如电报行业，1870 年之前是私营，股东每年可获六成利润，自从官办之后，亏损 2500 万英镑，这是心理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缺乏自主意识，又没有责任的驱动，他就会不思进取，难成大事。但是社会党却对这个道理视而不见。"

由于西部铁路收回之后，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因此拉丁民族国家主义的发展并不迅猛。拉丁民族中并无听闻开辟专营产业的议论，官吏数量也并无增多。最近一个议员在下议院表示，可以将酒业与保险业收归国有。现转录《谈论日报》中对于此种行为的讨论，以正视听。

"宣称我们的财政政策将趋向专营，是所有选举宣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疯狂的想法，有朝一日终会成为法令。具有良知和远见之人，都认为中央集权的速度过快。中央集权过快所造成的公民思想的懒惰、官吏数量的增加、人口率的停滞、国家财政的赤字等都亟待整治。雪上加霜的是，如果酒业与保险业官办的法令通过，国家负担将会更大。那些议员会认为国家多控制几个行业并无麻烦之处。群众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以国家为名义而中饱私囊的人。这些人如今又以重组资本为由，限制富人，将经济行业收归国有。"

收入所得税的征收，象征着国家控制资本的开始。没有人知道社会党对国家的合法掠夺要持续多久，程度如何。工人养老法的颁布，象征着国家慈善事业的开始。没有人知道这种社会慈善之途会走多远。义务教育的开展，象征着国家教育集中的开始。没有人知道这种知识普及法令能坚持多久。如果试图阻止种种政策的推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作为国家中坚力量的劳动者的衰颓，然而国家在那个时候已经腐朽荒芜了。

国家主义与官吏主义联系紧密。假如要限制国家的权力，首要任务就是要限制官吏的权力。随着国家管理的行业逐渐增多，管理这些行业的行政部门也日渐重要。如今我国出现了不少小的封建团体，它们的势力也慢慢膨胀。

这些团体的存在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威胁。以今日的邮政员事件为例来说明，有些议员认为这个团体的势力需要进一步的巩固和增强。可以想象得到，议会将来一定会受到这些议员的威逼利诱，最终表决通过这个法令。

某位财政总长曾表达过如下看法：“一旦这个法令通过，大权在手的官吏就能够操纵国民。这种政权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官僚是一种真正的官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掌握政权，统治国民。而这不亚于一场革命。”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革命官吏，或者承认那些被他们贿赂的官吏，就如同承认了这些革命官吏的统治。同那些代表国家的官吏一样，这些人也自命不凡，认为自己的权势很大。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从公文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如何如何……”，轻蔑的态度溢于言表。这也是他们把民众当作奴仆的一个明证。

我们应该采取特殊措施，去尽量避免上述时弊，消除这些祸乱的根源。这种特殊的措施应不同于平常的行动，换言之，即阻止法令的通过，同时承认官吏终身制。国家控制这些官吏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私营工厂主对待雇员的形式。这些工厂主通过签约，取得了雇用与解聘的自主权。我们国家应该效仿此种方式，与从事专门行业的人员，如工程师、电报员等，签订不超过10年的合同。

这种方法一定会有人非议，他们会认为频繁更换官吏的话，称职的官吏会很少。我们则认为，让新鲜的血液不停地补充国家岗位，对国家有莫大的好处。以今日的情形来看，就业压力十分严重，一个职位刚刚空缺，就有无数申请者纷至沓来。如财政部助理一职，日薪不过6法郎，申请的大学生已逾50人。如果我的建议可以被采纳，那么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但是，我的建议真的可以被执行吗？

五

由于国家主义的概念根深蒂固，因此我们受控已久却不自知。如今受到它危害的人更不计其数。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人起来抵抗了。如今大家慢慢明白国家不应该操纵工业、慈善行业与教育行业，不应该强迫公民的宗教信仰，更不应该试图愚化人民。国家的真正职责在于选择某个党派，在于维持国内秩序，在于保证国家安全。其他的事情就不是国家应该管制的了。再简单的真理，也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我们仅希望，不用花费过久的时间，使国家的暴政渐渐地消除。纸上谈兵固然容易，其实我们都明白，国民性最难改变。

第五章　战争的心理因素

一

哲学家认为今日的战争可以避免，如今文化的进步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战争却是今天国家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无法确定科学的发展是否能够避免战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能够使现代的战争变得更加残酷。事实上，即使成吉思汗和阿拉提战争重现，其惨烈程度也无法与科技时代的战役相比肩。

如果一种现象能够从古至今地出现，那么它是人类生存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就如同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一样，人类无法避免，更无从抵抗。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源。正是在战争的帮助下，我们的祖先脱离了野蛮，建立了伟大的帝国，一切文化，如美术、科学、工业等才能发展。如果没有战争，那么永远和平的国家如今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吗？

我在此无意讨论战争的利弊，我想说明的是战争之所以存在的心理原因。这种原因非常复杂，最重要的是优胜劣汰，强者生存，而这也是生物界的共同特点。文化的发展可以抑制战争的发生，但是却不彻底。由于各民族的心理结构、生活习惯与日常行为都不尽相同，所以就会引起潜在的排斥与厌恶

心理，这就是民族冲突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世界上有很多战争，比如侵略战争、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传统战争等，看似类型各异，其实它们都可以称作种族战争。波斯与亚述、希腊与亚洲、罗马与蛮族，包括俄国与日本，都属于这种性质。又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也是如此。不同种族有不同的信仰习惯，一个种族盛行个人主义和思想自由，另一个种族则提倡拉丁式的绝对权威，如此冲突就在所难免了。从历史的表面来看，这种冲突会被认为是君主竞争的结果，但是实质并非如此。由于每位君主在位时间都有限，所以他个人的意愿、欲望与梦想不能代表整个民族。

二

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文化的进步和民族的交流，来缓和民族冲突。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希望也仅仅只是希望。

以前交通不便，各民族语言不通之时，欧洲相似的文化表象掩盖了各个民族的心理差异。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知晓各民族心理的特殊之处。现在交通日益便利、商业交流频繁，民族心理的差异也逐渐显现。同样的问题，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冲突不断。交流越频，意见越大；利益联系越紧密，差异就越明显。因为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我们寻求和谐，却引起分歧。

蒸汽机和电的发明在缩短各民族距离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之间的军事戒备。虽然各国都在其边界建立了如同中国长城一般的警戒线，但他们仍然担心这个不足以防御别国。于是，不管是专制国家还是自由国家，都主张驱逐外国人。澳洲驱逐了中国人，又驱逐了美国人，如今更禁止运载平民的船只驶入港口；英国不再雇用外国人；俄国遵从民意不允许犹太人居住在大城市；德国的普鲁士政权曾经驱逐意大利与波兰的铁路工；瑞士 1892 年虽然否决了

禁止外国工人劳动的草案，但今日却只允许军需制造商雇用本地工人。种种迹象似乎表明 20 世纪并不是一个和谐互助的时代。如果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冲突，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拒绝交流。距离的缩短与交流的频繁只会导致民族仇恨。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国家十分注意保护自己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绝不容许别国的入侵。从古至今，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共和政府，都是如此。由此可见，这也是今天政府必不可少的政策。民族心理的差异不足以解释现代民族冲突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因素。

我们可以用合适的心理学依据，来解释现在所有国家不自觉的排外心理。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国中的外国势力过强，就会有同化这个国家原本的国民精神的危险，而这种危险足以导致国家的解体。比如罗马帝国，当外族人民多于罗马人民时，罗马帝国的性质就改变了。如果我国的人口逐年递减，而邻国的人口却由于人口过多而要求移民我国，那么我国就存在危险了。由于这些移民将会收入颇丰，且不负有纳税与兵役之责，而其他国家不允许他们入境，那么我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些移民在其国内多是游手好闲、素质低下之流，而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允许其入境，这个举动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马赛一地，现在简直可谓意大利人的殖民地，甚至比其殖民地的意大利人都多。假如法国再不采取措施，那么以后的法国将由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与三分之一的法国人组成。到那个时候，法国这个种族存在的依据何在？比起别国的文化侵入，我们更愿意承受战场上的杀戮。

三

由上可知，文化的进步与民族的交流不但不能避免民族冲突，反而可以

增加民族仇恨。导致这种结果的心理因素我们前文已有所讲，我们现在着重来看经济因素。哲学家与慈善家不了解战争的必要，他们只会悲叹战争的永不停息。如果没有战争，世界永远和平，那么一切文化与科学将停滞不前，我们将会重新步入蛮荒时代。所以，福格耶表示："如果世界真的能够和平，那么 50 年后人类就会腐败衰落。和平的破坏力要比最残酷的战争大得多。"

我们不能否认战争的不利影响，它带来的破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财产的损失、人口的伤亡与民族的衰落。但是在考虑国家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综合权衡战争的优劣，全盘规划。

战争带来的破坏中，最轻者便是财产的损失。历史中从来不乏以贫胜富的民族，因此贫穷对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说，不足为惧。统计学家的数据显示，德国需要数千亿的资金来稳定掠自法国的土地，欧洲各国则花费数千亿的资金来扩充军用装备。我并没有看见大量资金的耗费，对国家本身有何不利影响。就算有些国家接近破产也无妨，至少他们用坚强的毅力与艰苦的生活来巩固了军队。众所周知，军费是国家财政中最必要的开支，因为军队可以防止别国的入侵。以今天的欧洲而言，除了人口数量较小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非常倚重军队的力量。国家不能吝啬军费的给予。如果不掌握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沦为别国的附庸，沉重的赋税会让国家得不偿失。

现在的政府与民众，只会一味颂赞和平。大家都明白，弱小和衰微的国家，被其强大邻国吞并的可能性极大。我们无法忘记奉天战役之后的耻辱。当时我们的盟国俄国势力衰弱，于是德国立刻在摩洛哥向我们挑衅。德国在外交电文中的傲慢语气让我们非常难堪。后来德国由于害怕英国炮击其海港而中止了战争。由此可知，国家绝对不能向别国展示弱点。

经过这次军事事件，欧洲各国都吸取了教训，马上增强了军事力量。增加赋税是增强军备的前提条件。英国通过征收赋税的方法，将每年的海军军费开支增加 1000 亿英镑。沉重的税务负担引发了英国之后的政治危机。这件

事情给我们的启示为，一个国家在战争之前，早已开始了财力的竞争。

战争所带来的人口伤亡影响深远。我们就曾深受其害，拿破仑战争的20年间，损失了300万人。由于死者都为正值壮年的青年男子，国家以后人口的增多或减少都会受其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人口出生率常年停滞的国家而言，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四

战争有其两面性，既能带来毁灭，也能带来重生。经济学家只关注于计算战争带来的破坏，却对它带来的收益视而不见。收益作为战争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容忽视。战争最大的收益在于国民性的产生和巩固，而国民性则是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

战争的胜利与失败都可以巩固国民性。以耶拿之战为例，人们普遍认为战败的德国损失惨重，我的意见则恰恰相反。这场失败事实上加快了德国的统一进程，否则的话，德国的统一要推迟数百年才能完成。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耶拿之战并不是德国的悲剧，实际上是我们法国的悲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了整个欧洲，结果又怎么样呢？经济学家看到了财政的损失，心理学家则看到了国民精神的复兴。征兵法令使全欧洲的青年加入了军队，这不仅大大延缓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近代文化毒素的发展，也使现代社会的宗教基础得以保全。没有什么比征兵令更能教导我们坚强、忍耐和牺牲了，它甚至能暂时充当我们的理想。虽然这种兵役制度与古代的残酷压迫政策并无二致，但它确实帮助了欧洲社会免遭各种有害因子的破坏。由于神明主义这种宗教权威的消失，它的利用价值并不高。然而征兵令对民族性复兴的强大作用，早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德国将军毛琦在笔记中写道：“我国青年在学校中受教的时间很短。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巨大优势在于：这些青年在学校教育结束之后进入了军队，继续接受培训。有人说我们的强大源于学校里的老师，但是我认为，事实并不是如此。社会的自然发展导致学校无法教育人们履行义务、珍惜名誉和热爱祖国，更无法教育人们为了信念自我牺牲。我们强大的原因在于军队的教育，而不是学校的教育。这 16 年来，军事教育增强了我国青年的智力和体力，教会了他们遵守纪律和谨言慎行，让他们成为了正直、爱国、勇敢、坚强、服从的成年人。”

征兵法令不仅提高了国民精神，也使近代工业的发展受益良多。比如军需武器的改良研究，带来了冶金工业五十年前难以想象的长足发展；再比如战术的制定推行，带来了铁路业和造船业的巨大进步。

五

无论是战争还是战争的威胁，都可以提高民族精神。而军队精神则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后备力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赞颂这种精神。

如果这些论述仍旧不能打动那些目光短浅、心慈手软的哲学家，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印度因为和平生活而遭受劫难的事例。众所周知，印度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数百年来和平无忧，然而转眼间却屈服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之下。由此可见，承平日久，并不见得是好事。最近 20 年，印度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增加了 30 万。它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还要多出数倍。由于物品的产出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了贫穷的普遍存在。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越多，饥荒的危险就越大。虽然印度有可以利用的铁路、电报，但饥荒还是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它带来的损失比最残酷的战争

要大得多。1866 年，阿丽莎一省，饿死的灾民达 100 万人；1868 年，旁遮普一地，灾民达 120 万人；1874 年，德干高原，灾民达 130 万人。战争带来的危害与其相比，仅仅是九牛一毛。在饥荒中死去难道就胜于在战场上牺牲吗？我们不能一味地渴望和平而拒绝战争。

六

上文所述战争的利弊，只是针对理论而言的。现实中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只能顺从而无法选择。尽管如此，我们现实中的备战也应该多考虑战争所带来的益处。

预防战争的最好方法是增强军队的士气。这种士气是军队真正的力量所在。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即使拥有最好的军事装备，也仅仅是一群战斗力低下的乌合之众罢了。从今以后，我们要把试图破坏这种精神的作家、演讲者，当作国家的敌人和叛徒。一旦失去这种精神，我们国家将会遭到最严重的入侵，从而导致我们国家的终结。

我们应当反复提倡这种精神，我们也应当始终铭记一个预言。据军事家预言，未来欧洲的战争将是一场历史中屡见不鲜的终结性战争。这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能导致一个国家完全灭亡，会毫无顾忌地蹂躏它波及的任何地方，毁坏房屋树木，戮尽人民。

我们在培养青年和军人的时候，应该传达这种精神。我们不能相信那些演说家的说辞，他们对于和平、博爱等事情的演讲是毫无益处的。我们肯定记得拜占庭这个人，他与这些演说家无异。当穆罕默德的大军兵临城下之时，拜占庭却还在谈经论道。当我们因生存出现问题，需要回避战争和冲突时，我们也丝毫不能减弱军事力量。如果战争实在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必须要有

团结一致、坚决抵抗到底的决心。胜负关键不在于军队多寡，而在于士气的充足，这就是所谓的常胜之道。

著名将领都深知战争并不仅仅是战术问题，也是心理问题。拿破仑曾说：“战争一半是心理作用。”我们只有坚持必胜的信念才会取得胜利。

我对于“战争的胜负在于心理”这一问题，可能并没有十分清晰的阐释。我再通过一个事例来说明。军事家所界定的军事失败，有一个范围和标准。只有战争带来的损失超过了这个标准，才称作失败。军队所能承受的损失是20%，超过20%，军队就很难振作。军事家限定的失败程度仅仅是军队的五分之一，军队的实力还保持了很多，为什么士气就被摧毁了呢？经过了数百年的观察验证，结果发现原因在于心理作用。但是也有反例。近代的日本战争损失超过了这个限度，却并没有招致失败。这个反例引发我们思考军事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军事教育该如何培养军事精神呢？如果军事教育得当，即便军队的损失超过了20%，也仍然能够与敌人对峙。等到敌人的损失超过限度，这样战役就能反败为胜。因此我们说：“历史上已经有很多战役证明，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军队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军队是否拥有饱满的情感和坚定的意志。”（若要对此深入探讨，可以参考波利斯少校所撰写的《军队以及统帅的心理》。这本书是根据我的《群众心理》《教育心理》两本书的原理所写。）

七

整齐划一的行动和坚强刚毅的心理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教育与训练同样重要。只有靠深入军心的教育，才能使士兵的行为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接着，只有靠长期的训练，才能达到士兵知识水平、心理因素和体能实力的整齐划一。毛琦的笔记中不乏这种例子。法德战争时，德军

侦察到法军变更了作战计划，马上下令变更作战计划。德军在没接收到命令时，就已经做好了新的部署。这就是整齐划一的行动，即使没有新的命令，也能够随机应变。德军的纪律已经深入人心，而法军的纪律则还是那些条文。外部纪律适用于小型军队，而大型军队则需要内部纪律。因此，这种深入人心的内部纪律，只有靠长期有效的训练才能达到。

第六章　经济纠纷的心理原因

民族之间的利益往来，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也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厌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战争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文明进步带来的经济纠纷，很容易引发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问题的重点所在，这种经济纠纷直接影响到国民心理，它的危险程度比战争更甚。

我曾经表示，蒸汽机和电的发明缩短了东西方的距离，它们之间会有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很多人对我的预言不屑一顾，但近来的俄日冲突，已经为东西方的大战拉开了序幕。

欧洲长期把东方当作消费区，不断向东方输出物资，如今，东方已经可以生产我们曾经向他们出口的产品。由于东方工人的劳动成本较低，因此，东方反过来开始向我们大规模输出他们的产品。欧洲曾制定关税政策，以试图扭转东方的贸易顺差，但效果并不明显。

如今的冲突还局限于工农业产品，将来的冲突范围会逐渐变大。印度、日本以及即将加入进来的中国，都将与我们在市场上展开竞争。曾经印度的棉纺织品需要从曼彻斯特进口，现在印度的孟买却开始出口棉线。印度和中国的工人工资极低，但他们制作的产品却与欧洲工人相差无几。因此，美洲

和澳洲都开始驱逐亚洲人，以排挤他们的竞争；我国梅洛的纽扣工人也以罢工的形式，对日本在国际市场与我们的竞争表示不满。

一旦印度、日本、中国利用他们的煤来建设工厂，用他们的低价商品来征服世界，又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呢？未来欧洲工人的薪金，可能与印度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相差无几。有人说："未来经济世界的工资标准，将以劳动工资最低的地方为准。"因此，东方工人的工资数额，将会成为欧洲工人工资的制定标准。然而社会党人却向工人阶层许愿，认为将来会提高收入，这难道不让人啼笑皆非吗？

我于25年前提出这些看法时，印度、英国的报纸都曾表示认同。但是他们依然认为东方工人的工资会逐渐向西方看齐。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他们根本不了解国民性的特点。国民性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稳固，不易改变。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侨居美国多年的中国人，美国的奢华环境并没有改变他们一茶一饭的简单生活，他们也不需要欧洲人生产的产品；再如印度工人，每天五六苏的收入就已经使他们心满意足。由此可知，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国民性。如此，又怎么能寄希望于他们工资的改变呢？

经济事务上的变革，使出口权从西方逐渐转移到了东方。现在东方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可以预见的是，将来欧洲会在东方的冲击下更加衰败。

现在的美洲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出口的权力。但是由于美洲的工人基本上是欧洲移民，他们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产品价格也不会低。所以，欧洲虽然无法向美洲出口，却也不怕美洲产品入侵欧洲。

日本、印度、中国则需要提高警惕。我们不仅无法向他们出口产品，相反，他们的产品还会控制我们的整个市场。如果我们无法抵御这种来自外国的竞争，我们就需要降低欧洲工人的工资。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才有能力与东方各国竞争欧洲本土的顾客。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关税壁垒的建设，它无法解决我们与东方的竞争。抵制之途只有一个，那就是闭关锁国，自强自立，自给自足。但现如今欧洲人口膨胀，想要自给自足有一定的困难。

统计学家的数据显示，欧洲多数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而生产力小，根本无法做到自给自足。闭关锁国，切断贸易，无异于引发一场饥荒，所以我们只能减免关税来避免供应不足。严重的债务和赋税已经使欧洲戴上了沉重的枷锁，若是再这样发展下去，欧洲的未来将不堪设想：欧洲的文化将会衰败，人口将会减少到自给自足的水平。但是，只有此时那些经济学家才会醒悟，认识到人口增加过快的危险和控制人口数量的好处。

在国际经济纠纷的调停上，少数欧洲精英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显示出我们的优势，但是精英数量很少。而欧洲大多数人的手工能力与其他民族相差无几。欧洲工人并不比中国工人、日本工人优秀。美、澳洲人由于惧怕竞争而将他们驱逐出境，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这种竞争是上等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大可不必忧虑。但是这种冲突却发生在下等人之中，他们智力相等，不同的是需求，那么谁的工资低，谁就能够取胜。

如果上述冲突停滞不前，倒也无关紧要。但是问题一旦发展，就会非常急迫。因此，我们不能把问题留到将来，等着后人解决。

第七章　大学教育对心理的影响

一

莱布尼兹曾说，教育可以在一百年内改变一个民族。特莱士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不恰当的教育可以在短时间内毁灭一个民族。

莱布尼兹的话并没有错，德国在科学、工业、经济上的成就就是百年来大学教育的功劳。特莱士的话也没有错，法国的衰败就是由旧的教育法所导致。所以我倾向于谈论不恰当的教育的危害。不当的教育制度只能塑造道德沦丧的坏人、危害国家的叛徒和言辞华美的空谈家。他们只能用来讲课，在实验室和工厂就毫无用处。

教育问题同样是心理问题。旧式教育的基本原则从始至终都是一种错误。依据这种原则诞生的大学，实际上就是扰乱社会的根源。

二

一天午后，我在家接待了一位身材修长、目光锐利的老人。他手持我所

著第九版《教育心理》一书来拜访我。他对我说："现存的教育制度必须废除，它是导致法国衰败的主要原因。我作为上议院议员、理学院成员、医学院教授，执教鞭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十分重视教育的理念。我即将在上议院进行一次演说，希望您能把相关资料给我作为参考。"

虽然我与这位老人之前并未谋面，但我听闻他是最好的外科医生。自这次交往之后，我们有过多次交流。我们一致认为，要改变我国的教育现状，要经过三个步骤：首先要改变大学校长的心理，其次要改变教授的心理，最后还要改变学生和家长的心理。由于任务过于艰巨，这个杰出的上议员打了退堂鼓，取消了他的演说。

三

教育，大概是世界范围内研究最深入，相关著作也最多的领域。各个国家的教育问题都会受到民族的传统观念束缚。但就法国而言，这些教育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人人都知道不可能改革。

所有的议员、教授、学者和文人都认为，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在荒废时间。人们都知道，如果想要在人生中取得一番成就，需要自行寻求其他教育，以此来替代传统教育中学到的幻想、错误和思考方式。

尽管大家取得了这种共识，但是他们在近50年里所有的改革都宣告失败。不仅如此，他们的改革只取得了增加弊端的结果。这些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们有悖于教育原理。过去改革的重心在于课程的改良，但是真正的改革是改革教育理念，而不是改革课程。遗憾的是，教授们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会让学生死记硬背，传授理论，却缺乏实践经验。

如此这般，学生又如何理解领会课程的含义，乃至独立观察、思考、推理、

判断他们学到的道理呢？

读者们可能已经知道大学生的愚昧无知来自教育的弊端，却并不一定通晓这些弊端形成的原因。我最近听了两位大学教授在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其中一位是理科教授利普蒙先生，另一位是与我同科的学长埃培尔先生。

利普蒙教授认为法国的教育是最差的，而德国的教育及其在国际的影响力则非比寻常。这一观点与其他学者相同，但是他潜心研究的其他结论却十分无知。看来专家一旦离开他的研究领域也就与旁人一样愚昧了。若非利普蒙教授为人十分严谨，听众甚至会认为他在戏弄大众。他认为教育败坏的原因是："我国的教育落后原因在于，它来源于基督教会。"至于改革的方法，他认为十分简单，即大学应该摆脱政府的管辖，并独立拥有授予文凭的权力，而政府只保有署名权即可。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过荒谬了。

埃培尔教授的演讲竟然和利普蒙教授的演讲一样，都让人感觉十分愚昧无知。他说："政府已经看到了教育的弊端，并要寻找切中肯綮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法就是，要加强初等教育的老师和高等教育的老师互相交流。"他的改良建议则是"将博物馆学的部分学科改成国民搜集学"。这个措施就能使改革成功吗？近来埃培尔发现了他的观点存在问题，又在杂志中撰文说："第一项改革应该根据学科的作用来分别安排；第二项改革则是由政府和大学根据学科特点安排学科的增减废立。"

由此可见，这些专家无法探究教育衰败的真正原因。他们不去改良教育方法，却只关心改良课程。在刊载埃培尔教授文章的同一杂志中，勒夏特列只用了一个例子，就说明了实践者和只看书本的理论家的不同。这个就足以证明埃培尔之流采用的书本教学法，存在很大弊端。勒夏特列的例子如下：一名法国的工程师要安装西门子的热气炉。由于这类炉子的种类繁多，他用书本上的方法来安装，不仅花费时间，而且花费金钱，结果却并不成功。后来他向不靠书本知识的、受过不同于法国教育的工程师请教。这类工程师，

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或者试验吹管，或者试验煤质，或者试验灰盘所需的水量，几天下来，安装的方法便已经了然于胸。不仅如此，他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远少于法国的工程师。这个例子使两种教学方法的优劣立现。

四

一代有一代的教育，每个时代都有其对应的新式教育。民族需要进步，教育需要改革，但是我们却总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前任外交部部长安诺托曾说："法国教育是完全的书本教育。在 25 岁之前，青年们都坐在教室里诵读课文，却荒废了农业技能。这样一来，他们的知识不增反减，他们只知道课本知识，根本不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学术界的杰出人才也只会埋头苦读，钻研理论问题，不去实践，埋没了自己的社会价值。空谈重于实践，是我们近代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而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等，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

前外交部部长仅用寥寥数语，就道破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实质问题。如果想透彻地探究这个问题，只有一部浩瀚巨著才能做到。这种错误的教育方法已经蔓延到了高等教育中。1910 年 3 月 18 日的《巴黎晨报》中，多名医学院教师关于助教考试的评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实践性强的专门教育，这不仅仅对于我们很重要，对于公众同样重要。我们在巴黎及里尔举行的医学公会中都表达了这一观点，但却都被忽视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助教考试这个政策是最不公平的，它只关心考试所用的空洞理论，却不在意学生必须掌握的实践知识。"高等教育的空讲理论之风都已经如此了，更不用说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了。这种教育风气一旦侵入了专门教育之中，国家工业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五

我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注重培养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一些品质。学校对于学生的人品、性格等毫不在意。教授、行政人员或许无此需要，但这些品质对其他各种职业的人而言，则必不可少。英国却与我国恰恰相反。从他们的殖民地印度政府就可以看出，英国人十分重视人们的性格品质。虽然记忆力好的印度人可以很容易地考取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职位，但是之后他们却因为懦弱的性格而逐渐被辞退。

塞莱（Chilly）在《英国印度》一书中清楚地表现了英国人对于纯理论教育和品格教育的看法："印度人拥有的是知识，但是英国人崇尚的是品格。品格是什么呢？品格是指人类良知中表现出来的光辉，例如处事沉着、雷厉风行、拒绝诱惑的意志和不畏胁迫的毅力等。总而言之，品格是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高度责任感。英国人并不认同那些优秀的成绩、精彩的演讲或华美的文字所代表的智慧，他们认为这些方面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达到。劳伦斯伯爵并没有最优秀的才能，却能被任命为印度总督，正是由于他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天生才能，也就是正直、坚强的品格。"

关于如何培养自制、守序的优秀品格我另有研究，在此不再赘述。一名第二十一骑兵团的上尉参谋，曾写信对我说："我曾试图按照您对于军队的真知灼见改造我的部队，很有成效。可惜的是，军队的多数长官都属于纸上谈兵、不屑实践之辈。"现在的年轻军官大都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纪律来自人自愿遵守。于是，他们就和部下一起探讨各种事务，结果部下的心理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这样反而阻碍了纪律形成。不单军队这样，学校也是如此。（学校心理请参考拙著《教育心理》一书）

六

我国的大学通常用记忆和空洞理论来考查学生成绩，如果我们到德国的学校参观一下，一定会感到自惭形秽。列位读者倘若读过贝斯所著的《美国教育制度》一书，就能看出很多问题。我在此将引用亚克曼教授的文章，以使大家了解美国教育的面貌。

美国的教育以个人的自主学习为基础，它的教学方法以实践为主。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即开始实践练习，之后实践比重随着年纪逐渐增加，即便是理论性较强的文学也是如此。它的教育不单是老师教授语言，同时也包含各种图片和模型。美国的学生十分自由，自学意识很强。在纯实践的学科之中，学生亦是自己运用实验仪器，去寻求各种现象的内在原理。其他的各类学科，即便是空无的理论也要用实际方式来表示，使学生知行合一。总而言之，美国的教育都把提高实践能力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

英国的教育方式也是如此。现以苏格兰教育局教员准则中的一段话作为说明。

“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获得证书，而在于培养青少年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要使他们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研究问题要靠自己而不是老师的传授。”我以实验室的课程为例来说明，学生可以先通过老师的讲授明白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学生要靠自己的实验来得出结果。老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他们得出的不同结果，以得出统一结论。最后再由老师评价同学们的结论。教师可以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引导、启发学生，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不仅仅是告诉他们已有的理论。

七

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很多国家都在采用。德国的经济和科学的兴旺发达也是得益于此。只有拉丁国家由于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心理没有转变过来而仍旧固守成规。尤其是老师的心理，他们本身就是旧式教育所造就的，所受的教育就是书本教育，行为习惯也来自书本，又如何知道社会实际呢？

改变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接受大学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妄图快速掌握通过考试的方法。而能够快速通过考试的方法就是熟记书本知识。这样虽然可以应付考试，但是时过境迁之后，这些知识就所剩无几了。难道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一些主张注重实践的老师会遭到校长的排挤。有些老师认为实践虽然不是学生通过考试的捷径，但是它能够掌握牢固的知识。校长却并不这么认为，校长说做实验、讨论对考试没用，完全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举动。可惜的是，家长也持同样的观点。上述种种使大学的教育问题积重难返，而这能够怪谁呢？

大学教授对于教育方法的认识甚至不如普通的小学教员。马恩县小学教师联谊会的一段宣言可以佐证。

“教学不是简单的转述，而是启发学生自己思考；教育不是直接灌输，而是引导学生独立探索。教育者的成就在于引领学生独立观察、思考、判断、实践，而不在于简单的传授。”

八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教师群体中进行宣传时，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的教师往往多于一般的小学教师。《意见日报》曾对此进行调查，称这是由于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多半是激进的社会党，他们整日妄想打破社会现状。

考虑到大学的现状和由此产生的观念，这种心理并不奇怪。大学的理念就是用文凭来划分不同的人才，次等为业士，中等为学士，高等为博士。无论是助教、教员还是拥有类似头衔的人，都以清高自居。而且由于他们的工资太低，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他们总是希望改变现有的社会格局，提高他们的地位，来一展他们的才华。实际上，认真地考虑社会现实，我们知道考试得来的文凭，并不足以体现人的真正品质。

文凭加深了这些人对社会的不满程度。设想下面一种情况，新颁布的法令强迫人们去服兵役，而人们在部队却遭受了毫无教养的长官的管教。由于文凭制度的存在，人们并不满足于被没有知识的队长所控制。若是一个社会由愚昧无知的人来领导有业士、学士文凭的人，恐怕他们很少会有人想要保持社会现状。这种不满成为人们反对爱国主义和军队的主要原因之一。改变社会的想法来源于大学，而现在已经影响到了小学教员。

现在的教师们开始倾向于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原因也在于此。如果教育总长的意志坚定，那么这种倾向不足为惧，但是现今的教育总长俨然已经沦为了民众的奴仆。更甚的是，小学教员反倒成了人民的代表。教育总长只会一味逢迎，又怎会有所抵抗呢？这种平等的思想膨胀如斯，大学教育又当如何？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批评这些小学教员，因为他们也深受我国的高等教育之害，他们奉为圣经的书本来自大学教授的编写。其荒诞不经、狂妄自大

的言辞，同宗教狂热的法国宫廷时代类似。这些编写者对拉封丹寓言的篡改，即小鱼的故事，可以称得上尽人皆知。

九

我所著的关于教育心理原则等书在不断出版，可见读者还是认同我的思想的。但是这些书在大学中影响很小，他们困在固定的课程中，不会讲述课本之外的东西，使用的方法也因循守旧，全部来源于自己学生时代所受的教育。尽管大学不予理睬，其他地方却积极响应。培养陆军将领的陆军大学，就抛弃了旧式大学教育原则。博纳尔将军和穆德辉上校都曾经运用我的教育理论来教导未来的军官。我的理论的核心原则是："教育要将人们的被动行为转变为一种本能。"根据我的原则，波利斯少校完成了《军队及统帅心理》一书，这本书现在已经在实践中大有成效。综上可知，我的理论自有其可取之处。即使我是在孤军奋战，我也要毫不犹豫地向大众传播我的思想。

十

迄今为止，教育制度改革的失败带给了我们很多教训。立法者应该从这些教训中汲取经验，不为眼前的利益所蒙蔽，而去寻找长远有效、真正优良的改革方案。如果改革成功，那么就算是普通的民众，也能够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的改革不能够依靠法律的力量。我始终强调，法律是用来表现、展示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的，而不是用来塑造国家的心理状态的。

只有经过坎坷的探索发展，真正以科学和工业引领社会进步的时代才会

到来。届时，人人都有可能在社会中承担重要的职责。只要他接受新式教育，具备独立探索、思考、判断和自制等能力，就能够在科学、工业、商业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国家的旧式教育却对这些品质关注很少，没有任何作为。

议院教育调查委员长黎波认为：“教育者应该为社会的衰败负责。”我在此引申一下他的说法：“我们的大学，是危害法国的根源之一。”

第三篇

民治政府

从伦理角度看，人民主权的理论与宗教理论一样不合理。过去的人在这种不合理的宗教理论中已经生活了很久，现在的人也没有摆脱其遗毒。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相比起理性，人类更适应生活在不理性的状况下。

第一章　精英和群众

一

世界经济扩张是当今社会的一大问题。为避免文明的倒退，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很多人不了解，文化智力差异导致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千差万别，这也是当今社会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平等理论，但智慧差别的巨大鸿沟，就算使用法律的力量也无法填平。原因无他，智力是自然法则的产物，法律无可奈何。

科技进步极大地带动了现代文化的发展。专业技术所要求的丰富知识、大量实践经验和果决的判断力等素质，高智力的人都远胜过普通人。领导者的才能越强，普通人的任务就越简单，更何况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使普通劳动者的行为日趋机械单调。如此一来，社会各阶层的差别日渐凸显。即便是教育，也很难帮助人跨越阶层之间的鸿沟，因为普通人只能从教育中汲取很少的营养，他们更容易被人人平等的思潮所蒙蔽。他们嫉妒、愤懑精英阶层，却从不反思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的原因何在。没有这些社会精英，就没有现代科学、美术、工业的巨大进步。现在的工人的工资是一百年前的三倍，他们享受的安逸的生活，更甚于路易十四时期的贵族。而这些都是精英的功劳，

所以，根本就不是普通人给精英打工，而是精英给普通人服务。

现代社会的进步完全归功于精英的努力。精英们职责不断增加，工作越来越努力，8 小时工作制与他们无关。他们的富裕难免受到那些宣扬人人平等之徒的嫉恨，但我们要知道，工业界精英们往往是两个极端，他们或者是金玉满堂，或者是家徒四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只做没有风险的事，那是不可能富裕的。表面上的他们令人艳羡，事实上普通人根本体会不到他们内心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就像办工厂一样，最新的机器刚安装好，却有更新的发明诞生了，新的竞争者也随之出现，一切都要重新规划。若是新的发明不断涌现，竞争不断加剧，会加剧企业家的危机感，使他们不再尝试。

二

想要完全理解本章的意思，首先就要明白现代文明的发展来自精英的努力，它的一切都与精英息息相关，下面就这个问题深入探讨一下。

得益于科技进步，高智力的人能够更好地引领社会生活。政治观念的进步则给予了普通人参与统治的权力。若是普通人能从这些引领社会生活的精英中选择代表，那便皆大欢喜了。但是他们偏偏不这样做，这就导致了精英和群众的水火不容。人们十分需要精英来带动社会进步，却又不肯接受他们做自己的领导者。因此，寒微的精英更容易获得群众的青睐，而那些奢华的精英，则要遭受到群众代表制定的法律剥削，被迫交出凭自己努力得来的资产。

群众对于精英的两难选择，是现代社会各阶级差距增加、冲突增多的原因。一方面，社会发展离不开精英；另一方面，普通人却妄想控制精英，这种行为就像野蛮人围攻罗马帝国一样。那么精英和群众能否和解呢？虽然很难，

但这个问题并非无解。观察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虽然群众表面上看起来有革命愿望，实际上他们却非常保守。以破坏的事物为例，群众面对它，第一想法不是新建而是恢复原状。破而后立不是改良民族、寻求进步的良策，因为一天的破坏甚至需要几百年的建设来弥补，所以我们需要提前避免革命。

通过限制群众的权力可以做到避免革命。可惜的是，由于现代各国民主制普遍进步，想要改变这种制度就很难，因此不能随便地限制群众权力。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另寻良策。唯一的解决之途就是精英委曲求全，做出迎合民选政府的姿态，对群众因势利导，来推进自己的主张。打个比方，这就是提前构筑堤坝来抵挡海啸。

从伦理角度看，人民主权的理论与宗教理论一样不合理。过去的人在这种不合理的宗教理论中已经生活了很久，现在的人也没有摆脱其遗毒。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相比起理性，人类更适应生活在不理性的状况下。实际上，如果那些政客没有在群众之中宣传荒谬的理论，埋下怨恨的种子，让精英迎合群众的喜好并没有什么困难。正是这些错误的理论和对精英的愤懑导致了双方的对立。群众的美好生活得益于精英的努力奋斗，如果没有精英，群众将会一贫如洗。只有等他们深刻认识到这个道理，才有可能改变这种对立的局面。

工厂没有厂主，或者工厂成了国家的资产，这都是工人党派所期望的。一百年前科技不发达时倒还可能发生这种事，在现代社会则是不可行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群众却偏偏难以理解。社会党脱离实际，白日做梦，竟把宣扬一些海市蜃楼般的理论当作一项崇高的事业。1910 年 2 月的社会党大会上，一名工人界代表颇有共鸣的发言，充分说明了社会党人思想的荒诞不经："我们得到解放的路子只有一条，那就是将资本家的产业变成我们工人的共同财产。我们要自行管理这些产业，我们要从资本家的奴隶转变成自由的资产所有者。"工人来管理工厂，就像由水手来驾驶船只一样，焉有不倾覆之理？如果工厂由国家来管理，倒有可能坚持长久一些。但是这些工人代表冥顽不灵，

这样下去只会让他们的工资逐渐减少。

这些道理是如此浅显，在外国，尤其是英美两国，传播得非常广，但是我们国家的人却并不明白。英美两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到现在，并没有像拉丁人社会那样变成互相攻击的阶级斗争，其原因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但可以证明的是，新式教育，特别是民主制的新式教育是关键原因之一。新式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深刻理解智力、资本、劳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

在教育改革成功之前，人人都需要好好地认识它。我们要知道，民选政府并不意味着体现平民意志，它体现的依然是领导者的意志。群众向来只能接受这种统治意志，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如同傀儡一般被统治者牢牢控制。群众如果以极端的方式表明他们的意志，就会形成通常所谓的运动。

群众并没有创造出来运动，他们只是以不可阻挡之力推动了运动。当西班牙人弗雷尔被执行死刑时，巴黎市民还没有完全认识他。攻击西班牙大使馆的事件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

群众在根本不了解整个事情的内幕的情况下，被寥寥数人激进的演讲蛊惑，做出了围攻西班牙大使馆，甚至杀人劫掠的暴行。群众的暴行让那些蛊惑者也感到恐惧，第二天他们便让运动变成了和平游行。同样的一群人，昨日还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暴徒，今日就变成彬彬有礼的绅士。转变之快，让人咂舌。现在的领导者都知道，只要手腕够高，群众能够遵从领导者的任何命令。

所以，所谓的人民主权只是表面上的，政府依然是由少数人掌控。今天的政府政权，与人们理想中的共和政体相去甚远。

领导者引导舆论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掌握群众心理学并加以应用即可。

如今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也必须掌握这种基本方法。我在 15 年前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并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加以阐释。现如今还有很多人在研究这本书。

我在此不准备列举群众的种种性格，只对一些经常在时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重要的群众性格加以探讨。

举例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虽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是陆军大学的教材，但是，许多政客对这本书还知之甚少。他们每天对群众的温和、群众的判断、群众的良知大加赞赏，然而事实上，这些并非是群众的性格。群众可以因某种理由而牺牲，这是他们表现出的美德，且值得被尊敬。但是，他们的判断能力却不可恭维。历史即是如此，可以换个角度来看。

我们的法律制定者对群众的心理状态有诸多误解。由于他们认为群众是知恩图报的，因而，他们为博得群众的欢心，订立一些无益而有害的法律。意料之外的是，群众对软弱的人十分鄙夷，对那些经不住威逼利诱的人，丝毫没有崇敬感。他们会在领导者妥协之后，尽可能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在铁路雇员养老法出台以后，这些人和军官、法官有了同等的休养金。当这些人发现要求可以通过威胁来实现的时候，他们便与群体合力要求涨工资，而这种做法足以降低公司的股票价值。这个要求必须实现，毋庸置疑。

我试图说明的是，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千差万别，诸如思想方法、行为方式，还有利益。群众的性格多如牛毛，诸如群众的无理性、图简单性、易受感染性、轻于信从等。若要贴近群众的观念，需要使用简单的、形象生动的寓意词汇。例如资本家，一定是懒惰、大肚、榨取工人血汗钱的中产者；国家肯定是宪兵和军队；教会主义，就是教师政府；社会主义就是工人可以不劳而获，而中产者必须认错的政府，诸如此类。

政客们有一种本能，他们对群众只能理解单一概念的能力，以及暴力的作用了如指掌。所以，政客们往往用所谓的竞选纲领，来使自己在选举中获

胜。教会的千亿法郎、教会祸、所得税之类的文辞，常被他们反复使用。英国人的这种概括方法的运用极为娴熟，他们的比喻往往能够创造一种意境，而最终的选举结果足以证明这些简单词汇的力量。英国的选举，没有拉丁人冗长的演讲或陈词，只是到处都有张贴的绘画广告。几个简单的词语就浓缩了统一党的全部政见，例如，把票投给激进党，就是支持反对英国海上霸权。大家熟知，英国海军是有优势的，英国人尊敬它如同尊敬宗教学说。若是有人想要反对，后果可想而知。

画家的力量，在增长词语的声势中不可小觑。一幅决定了选举结果的绘画即可证明此点。画的左边，是年号 1900，它的下边是一艘宏伟的战舰，寓意英国海军，旁边是一艘小船，代表德国海军。画的右边，是年号 1901，它的下边是与英国大船几乎一样大小的德国战舰。所见者一目了然，英国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可以想见，它的统计数值，没有人会去检查，因为这项检查工作需要推想评鉴的知识和能力，而群众是不懂这些的。

应该知道，这种方法就是利用了平民的心理，例如易感、轻信、重复言论等等。由于双方都使用了相同的手段，所以成绩不佳，英国选举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仍旧由人数相等的两个党组成。

易感、易动，是群众容易被操纵的重要原因。他们可以因为感动、兴奋，去信奉卡皮托勒的英雄，也可能因为感动、兴奋成为塔尔皮亚的罪犯。在罗伯斯庇尔被杀之前，巴黎平民将他尊奉为神，而当他被押往断头台的时候，在他车后欢呼喝彩的也是这一群平民。马拉遗骸运往万神殿的时候，群众欢呼雀跃。而时隔数年，也是同一群众将这具遗骸弃之于沟渠。同样的遭遇，克伦威尔也曾经历过。既然理性无法引导群众，那么引导人就用感性来影响群众。假设对手的方式也是如此，那么，胜利会倒向呼声最强烈的一方。

暴力因素不可或缺。英国终选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平素以循规蹈矩闻名的英国总长，在进行群众演说的时候，对革命激烈派的口吻大加运用，

诅咒、诋毁颇多。劳埃德乔治在公众演讲时说上议院“是可怜的懦夫的集合，是可悲的无能之人，既无心为善更无勇为恶”。类似的词汇，在各个总长的口中屡见不鲜。

对平民心理的研究应该更多予以关注。基于群众的能力，以及他们不负责任的自我感觉，群众通常饱含自尊心，且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在本书中，近代的许多群众性格能够得到证实。

无论群众的情感实质是什么，他们情感的表现都是强烈的。自尊与谦卑顺从在群众身上表现得同样强烈。在遇到有地位的人的时候，群众的这种性格表现尤为明显。曾经，我们向工团说明革命委员会不合常理的，甚至苛责的法令，而工团恭敬、谨慎地接受了。

群众的这种心理状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引用 1790 年德国人康柏的笔记内容作为例证。在这则笔记中，记录者提到了群众的自尊、自卑，以及视情况而变的性格。笔记记述了国民议会时，查格特在宣读国民议会致国王请愿书时的情形。

> 查格特请愿书说，国民议会谨……
>
> 呼喊声、跺脚声。不用谨、不用谨，去掉这个字。
>
> ……呈于陛下之足……
>
> 喧哗斥责的声音四起，震动了柜子的玻璃。
>
> ……足……厌恶足……国民议会无论如何不能放在人的足前。
>
> 查格特狼狈不堪，只能失望地往下读：
>
> 国民议会和陛下……
>
> 赞成的声音响起。
>
> ……贡献……
>
> 强烈的反对声再起，不用贡献。

这一天的会议始终在这种情形下进行。这些德国人民在惧怕和失望中离开了会议场。第二天，他们在凡尔赛宫观摩向国王呈请愿书的场面时，又非常开心。昔日，那些不能触犯、自爱，且有尊严的立法者，在看见路易十六出现在走廊里的一瞬间，都全部热情地对他恭维起来。昔日傲慢的人，现在，他们有的蹬在凳子上，有的爬到柱子上，有的踮着脚，一同仰望这些人的领导者。伟大国王万岁的呼声，响彻整个宫殿。然后，他们恭敬且温顺地跟在国王身后，走向礼拜堂。

四

上文所述，即是群众的弱点。而群众的优点，也是不可以被忽略的。他们的利他主义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由于他们不能用理论进行研究。然而这却是社会的美德，且大大有益于社会。一个能够运用理论进行研究的人，常常是自私的。他们很难会为了公益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但是群众可以，他们拥有这种自我克制的能力。虽然有些举动是盲目的，但仍能看见有成千上万的人冒死支持。大帝国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群众虽然不能创造文化，但是，他们能够用勇敢、忠顺来维持文化的长久存在。

平民的心理性格还有轻信。他们的轻信程度很高，如孩子一般。在他们的眼中，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得到的。如果群众想得到月亮，理论上应该答应他们，但是政客们素来不做这种承诺。在选举中，群众会相信对对手的污蔑和诽谤，但不会相信他们犯了十分严重的罪行。因为这样不仅不能降低对手的威信度，反而会增强对手的影响力。这是由于，群众对于重要的罪犯，常常怀有一种敬仰。

没有界限的轻信不仅仅是群众特有的情感，它也是我们的常态。轻信是

我们情感的基础，而非怀疑。对于自己工作中的事物，我们只拥有一少部分衡量的资本，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很少能表示出我们的怀疑。所谓的怀疑家的怀疑理论，是完全不可信的。他们只是变更了他信奉的事物，例如将死亡的神秘，替换成旋转桌、梦呓人，或者是偶像。

群众的轻信几乎等同于原始人的轻信。传单广告的制作者对此熟知，他们还懂得承诺以及反复诱导的效用，因此他们常常对此大加利用。他们用编造的语言麻痹群众，因广告而发家致富的人不胜枚举。若在诱导性极强的广告之中，再诱导思维单纯的人认为自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那么，广告制作者所获得的利润就会加倍。现实中的财政家，很多都是通过重复假的言论来获取利益的。他的广告编辑不需要什么想象力，他们只需做一件事——不停地做肯定的断言。环球报所刊载的，关于阿拉伯从未存在的某矿股票的报道，就是一例。这个股票每六个月就会散布数以百万计的传单。他们总是宣称，巨额的红利马上就要进行派发了，而且如果此时购买股票，将来的收益会在10倍以上。小资本家一哄而上地抢购，他们都信以为真，生怕失去赚钱的机会，结果一无所获，红利更是无稽之谈。但是，5年间，这件事情始终存在且从未间断过。这些工于技巧的广告，其收益达到1200万法郎之多。而事实上，他的股票的真实价值就是一张纸的价值。

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不及赘述，在此，仅引用同一家报纸所做的评论来论证。

“储蓄者的轻信，是无法度量的。他们的轻信不着边际、没有界限。他们不管有无证据，也不问真实与否。承诺、肯定的断言，还有虚幻的口头愚弄，越是拙劣越容易被他们信以为真。即使他们知道这个没有好处，更或许将来能证实它的虚幻，他们也无所顾忌。

把这个问题转放到政治上，就可以看出，某某人及某某政策之所以有效，就是利用了轻信。所有承诺都是无法实现的断言，是因为竞买而针对敌手所

加的价，是可以收效明显的词汇。”

虽然，我们都身处在普遍的轻信之中，但是，却没有足够明显的危害。文化的原动力，均来自刚强者。可畏的大宗教、大帝国的建立，全靠这些轻信者。这些有益的轻信，保障了维持国家兴盛的行业习惯。祖国的信仰、思想的信仰、未来的信仰，都是轻信。这些心理生活的枢纽，都是用轻信来维持的。一个民族，若无信仰，就会失去精神动力，随之被破坏的还有社会关系，从而国势日衰。怀疑主义其实就是为国家送终的道具。

第二章 怂恿之源

一

平民势力的推动，往往使政治事变迅速发展，达到公众和政治家不可预测的程度。事件的骤变，在土耳其革命中曾经表现出来。在几天之内，邮政员罢工也同样表现了出来。他们推翻了数百年的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他们发布了罢工宣告。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动乱中，温和的市民变成了杀人的强盗。他们烧毁寺庙和教堂，挖坟掘墓。这种意料之外的事件的发生，根本无法用理论去说明它的真相。若想了解事实，理性理论必须弃之不用。因为理性理论会把不切实际的原因，带入我们的想象。

这种事变产生于不知不觉之中，它是有规律的，并不具有偶然性。关于这个规律的研究，我们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我们只明确了其中一点：这种变乱之所以在瞬间发生，就是由于引导人的煽动和蛊惑。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些人是怎么办到的？依照理性的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应该被轻蔑的，但这些行为缘何如此迅速且准确呢？

二

儿时的一次经历，我至今难忘，那是在外省的一个小城的街道上。30 年后的今天，我才理解了那件事。

事情本身并没有令我难忘，我对当事人的印象更为深刻。那个人的衣着十分华丽，我在猜想，他是古波斯的僧人吗？古条支的州长吗？印度的富豪吗？无从知晓。这个人的车驾有紫色的马鞍，古式的车架，车上还有豪华的座椅。他的后面有两个侍卫，并肩站着。他们的长喇叭闪闪发亮，发出神秘响亮的召唤声。敬仰他们的群众从四下里聚集过来，在那个人举手一挥之后，人群安静了下来。然后，他站起来开始演说。群众一声不吭地恭敬地听着。我离他太远了，未能听到他所说的全部内容，只获悉这个人从远方带来了便宜的药品，而这些药品能治疗一切病痛，且药到病除，百分之百见效。喇叭声在他讲完之后，再次响起。受蛊惑的群众开始抢购这种灵药。当时，我也有意购买此药，但迫于身无分文。后来我为此很懊悔，因为听说这种药确实疗效显著。但是，当地的药剂师却断定这个所谓的药其实就是糖。与一个穿着华丽，且有侍卫跟随的僧人相比，一个普通的商家的言论，绝不致使人信奉到如此地步。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在中学阶段学到了许多没有用处的知识。我清楚地记得，老师曾教导我们说，理论构成了我们的信仰，并指导着我们的行动。然而，这个僧人的神奇药品以及它的药效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为什么书中的知识和我所见的现实差异如此之大呢？既然我们的行为是由理性指导的，那么，这些毫无用处的药粉又为何能够治好病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苦思了许久。漫长的求索过程之后，我才开始有所悟。这个人所运用的知识，是人民历史生活中的经验总结。他售卖的不是药品本身，而是引导世界不灭的无形元素——希望。一切宗教的主教，以及各时代的政客，他们不是与这个僧人一样，在售卖着希望吗？

这个人模仿宗教创造者的故事，演说、宣扬一些信仰。他通过四种重要的原动力，树立起民众的信念。四种原动力：一是足以产生诱导和强迫力的声望；二是无证据无理由的断言；三是使人信以为真的重复言论；四是令个人信念由弱转强的精神麻醉。此四个方面，构成了怂恿文典的四项基本要素。理论学教授会教导大家，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只需用理性去面对，不必相信。

这些元素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无论何时何事，皆有效用。若你是普通的幻术家，你可以凭此销售灵丹妙药；若你是精细的财政家，你可凭此售卖一文不值的证券；若你是强国的帝王，你可以凭此来说服你的人民做出重要的贡献，以建造海军。这些怂恿的元素，可以诱导我们形成某种行为习惯。也就是说，它只能作用于情感。它对智慧的成长，并无什么用处。教师和学生需要用一种实证的方法，来说明这些元素的不适用性，因为老师和学生所探索的是知识，而不是信仰。

知识和信仰是两码事。历史上，柏拉图曾明确指出，它们在建立方法上是有差异的。对于普通人而言，信仰的获得要比知识的获得容易得多。信仰不需要证明和推论，而知识需要。那些怂恿文典的重要元素，仅限于以情感为基础的意见和信仰的创造上。大多数的群众行为，都是由这些意见和信仰所鼓动的。这些意见和信仰的创造者，就会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若演说者对听众的智慧指指点点，那么，群众必然不会相信，更不会听从他。只有动作、语言以及形象的词语，才能够对群众的感性造成影响，并触动他们的意志。

上文已细述诸多鼓动群众的方法。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无法举例说明，它也是群众所具有的。这个因素解释起来较为复杂，概而言之，是诱惑。

演说家很善于运用诱惑。语言的诱惑对人所起的作用较大。听众的精神就像是一把古琴，演说者对它的一响一动都了若指掌。演说家据此揣摩他的措辞和表达方式。而平庸的演说家和胆小的政客却不谙此道，他们只一味地

谄媚，盲目地顺从群众的意愿，以此来取悦群众。真实意义上能够操控人类的人，一定是首先利用诱惑的人。群众或女子一旦被诱惑成功，他们的不满只会来自诱惑者，他们的意志也等同于诱惑者的意志。

诱惑家好像有着惊人的吸引力。他们不必为自己的言论做出论证，简单的断言就足以使被诱惑者对他们深信不疑。这使得著名的演说家，在发表或刊登他的演说的时候，很少对言论做出解释。这是因为，他们深知，文字怂恿和言词怂恿在方法上的差别很大。他们的个人声望，依然可以在文字的怂恿中，产生巨大的威力。例如，著名作家卢梭，他之所以令人信服，并不是因为他所用的最平常的论据，而是他的声望。对于诱惑家而言，深深烙印在听众心里的信仰是他唯一的劲敌。如果这种信仰被智慧和能力入侵，那么，一切将烟消云散，智慧和能力犹如铜墙铁壁，无法逾越。

磁石的引力，固然很重要，但若无其他物质的帮助，有时它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这也是演说家不可或缺的。现在谈一谈居于次要地位的“善于言辞”的问题。怂恿人的前提，首先是思想的表达，然后将这种思想灌输给听众，并使周围的群众一起被这种思想感染。其结果是使听众能够设身处地感受到演说者的感动。这也是安托万的做法。安托万曾在恺撒遗骸之前，发表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演说。听众之前对刺客充满了同情，而在这个演说的鼓动下，他们瞬间转变成想要为恺撒复仇的人。

这些怂恿的因素，无论是作用于普通的群众，还是作用于精英，效用是一样的。怂恿的原则是先揣测听众的想法，然后顺从他们的思路，接着再诱导他们转而顺从你的思想。这个原则的作用，可以用德国首相布洛郡王的事迹来证实。这位近代大演说家的事迹被记录在塔迪厄的著作中。

在政治会议中，演讲的关键在于熟知听众的期待。演说家和听众二者之间达成一致，演说家才能取得成功。布洛深谙此道，他能在演说中针对听众的反应随时调整他的言论。在这一点上，他首屈一指。在他的演说中，有谄媚的言辞，

也有断言德国实力过度的语汇，甚至还用了傲慢的语气。例如：“德国不喜欢被别人踩着……德国不喜欢旁观……德国不喜欢孤立……”等等。他经常使用这些常见的习惯用语，显然是有理由的。他知道，大多数议员都是庸碌自尊之辈，要想得到他们的欣赏，只能靠这些常用语。他对听众的操控如同对待一盘棋局。

前文已述，群众的轻信度是没有界限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引导者诱导，并听从引导者的指令。但是，轻信的力量还不够大，不足以长久维持下去。历史上，少数的几个时代，依靠着牢固的信仰，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例如，在红十字军的初次战争中、在宗教战争中、在革命时代中，信仰的洪流势不可挡。然而，事到如今，失去激情的革命社会党，在维持社会秩序的人面前飞扬跋扈，而在群众面前则畏首畏尾。这种运动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呢？

各个时代对引导人的任务，都有所表现。人们对此早已熟知，但是心理学者却始终没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若要对此理解透彻，只有从未被探寻的领域中发掘。因为这一点是我们行动的动力，是思想转变后对行动的驱动。

这个尚未被探寻的领域非常神秘，其中充斥着许多迷惑。动物的心理情况也与此相似。在这个不可认识的世界门前，科学知识只能被我们用来进行仔细观察，而无法用其进行深入的探索。既然这个模糊的领域无法探明，那么，我们就应该回过头来，研究最容易且显而易见的事情。

上文中，我们已经列举了一些怂恿的元素。如果把每种元素都详细描述，恐怕没有一本书能够做到。环境的怂恿、报纸的怂恿、无名委员会的怂恿、个人利益的怂恿等等，这些值得探究的因素很多，但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尚未涵盖所有内容。当然，对于这件事的研究，是远远比讨论诸如康德之徒的那些毫无用处的学说，或者宇宙的本体，来得更有意义。虽然，这项研究是有益的，但是，它困难重重。

巩固平民的信念，以及精神熏陶，这两点非常重要，不容忽视。它们是动乱能够迅速传播的根本因素。邮政员罢工、巴尔色隆的动乱，都是因它而

起的。这种动乱都是由引导人发起的。他们起初借用群众共有的不平情绪，在群众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接受，然后再用机械的渲染传播法，使这种不平情绪的范围不断扩大。

传播作为一种手段，极其重要。在许多历史现象中，元素没有被突显。如果没有传播，许多信仰将无法成立，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传播者只是精神层面的传播，而非理性层面。

精神传播在大革命的舆论运动，以及构成某一时代的精神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精神传播的行为尤为重要。因为现今的时代，早已摆脱了历史的束缚，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众的时代。

三

在探究群众和个人行为的真正起因时，情感和指挥的差别是不可忽略的一环。情感与指挥产生影响的发生机制不同，因此不能等同论之。这一点，我在著书立说时十分注意。哲学家黎波也在其书中反复强调了此点的重要性。

虽然，今天的人们顽固不化，仍用智慧的词汇来解释情感，以至于情感和智慧的概念混淆不清。基于此，我们另辟蹊径，用纯粹的情感自觉来进行解释。我们有必要知道，智慧的理论与情感毫无瓜葛，因而不能用于解释由情感所引发的行为。

知识丰厚者往往自幼受到严格的理论训练，因而，他们对历史的书写，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他们并不知道，影响民族前途，以及民族文化的重要事件，都是由不自觉的心理原因造成的。换而言之，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是在非理性的指挥下完成的。理性创造科学，而非理性创造历史。

第三章 工人的心理状态

一

近代心理学者在一些新的探索上所取得的功劳和意义，我无意掩盖。他们喜欢观察两栖类动物。至于蛛形动物，他们虽然兴趣浓厚，但跟踪观察的意愿却变淡了。我常常无法理解这些心理学者。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社会生活中每天所见的现象，并追索这些现象的原因呢？这项研究或许可以洞见社会运转的重要规则，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这类可供研究的事物有很多。近代心理学者还没有对这类社会事件的发生提供精确的解释，所以，一旦事情发生，常会使人感到意外。

德拉维城的叛乱，以及与之类似的平民动乱，都是不可预知的。这些忽然间发生的事件，之所以令人意外，是因为人们并没有理解平民的心理。德拉维城接受了劳动联合会领导人的命令，他们拿起兵器，进行叛乱。为了避免惨遭屠杀，军人被迫自卫。其结果是，许多工团加入了劳动联合会：活版印刷的工人罢工，导致了报纸出版的迟滞；电业工人的罢工，使巴黎陷入一片漆黑。如果不研究平民的心理，这些事件就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事后处理工作手段之拙劣，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一向标榜自己洞明世事的人，也

并不了解群众的心理。表面上看，德拉维事件的起因颇为复杂，因为事件之后，各方并没有产生异议。责任被置之不理，而错误都应受到处理。群众违背了法令，猛烈地攻击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军队，惩治在所难免。而政权，无论它是哪种形态的，都应该尽职尽责。由此可知，政府方面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但为什么整个工业界对政府怀有不满并大加指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群众服从和被煽动的方式。动乱的原因是否合理无关紧要，哪些因素使煽动者的思想深入群众的内心，才是研究的重点。

幻想对平民精神的影响很大，它是影响动乱起因的又一重要因素。否认它的作用，就是否认历史。在这些类似事件连续发生之际，理性的作用远远不及梦想的力量强大。成千上万的人可以为梦想而献身。梦想也是强大帝国得以建立的关键动力。

与过去相比，虚幻的号召力在今日更加强大了。过去，群众受到幻想的迷惑，今日仍旧如此，只是幻想的称谓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

我们应该先介绍普通群众共有的一般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再研究工人的心理及其特有的观念。

群众，并不像报纸、电讯所宣传蛊惑的那样，一定要有众人的聚集。即使分隔两地的人，精神也是可以有联系的。所谓群众，其实是共有以下这些性格特点的人们，如缺乏毅力、易怒、盲目轻信、是非观念淡薄、难以理性说服、热衷领袖崇拜并服从。他们经常被煽动而做出最激进的行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群众一直沉溺于拜服在暴君的脚下，并频繁地改变他们的暴君。

特锐德说："群众的性格共性，并非无迹可寻。比如他们非常容易冲动，

拥有膨胀到令人耻笑的自尊，他们好似疯癫了一般随随便便就侮辱他人，他们的狂热仅凭幻想，却毫无责任感，他们聚作一团意气用事，毫无节制。他们时而崇拜，时而唾弃，时而歌颂，时而厌恶，时而山呼万岁，时而恶语中伤，群众从来不懂得中庸。”

这样的心理特点，在群众性的大事件中屡见不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拉维骚动事件。在一些引导者的煽动之下，工人们猛烈攻击军队。军队的自卫与反攻反而激发了全法国工业界的愤怒。这些工人们正如其他群众一样目无法纪，和激愤的人群一起痛骂政府。政府的错，无非是没有禁止军队自卫使其坐等屠杀而已。斯塔尔人曾说过：“死亡之中必然存在群众自以为是的冲动。”

在工人们暴力攻击军队的事件以及此后的两次罢工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群众盲目地服从引导者的指令。活版印刷工人们罢工以阻止报纸出版，却最终只实现了目标的一半，因为领导者们没有果断做出决定，协商和讨论延误了宝贵的时间。电业工人的罢工则成效很大，因为他们不经讨论便发布最后命令并强迫工人们执行。每个工人都接到如下命令——“委员会命令全体工会成员于 1908 年 8 月 6 日下午 8 点停工，10 点开工……”署名为 P. P 的命令被服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沙皇俄国皇帝或者别的独裁君王。

报纸也小心翼翼地刊登了这位工人专制者的宣言。根据报纸的报道，P. P 反对军制、蔑视政府，并严词谴责别国国王，他反对国家总理用军人替换电业工人，并将发出命令警告和劝诫。这位游侠式的专制者，把罢工当作自己的权杖，轻轻一挥便让工业界从中获益。他的权力固然很大，但是我敢立一句忠告，千万别以为权力大了，就可以倚靠。这样的权力只是群众意识的表象，其他人同样可以利用。群众固然容易被煽动，但同样容易改变服从的对象。果然，不久这位 P. P 就被群众所抛弃，落了个和南方反叛领导人同样的下场。我为他谋划了一个去处，争取去一所大学教授实用心理学课程，给那些政党

的政客和工业界的首领们讲讲他是如何操纵群众的，这些人乏于此道，而他在这方面却相当精明。

怎么知道政党的政客和工业界的首领们乏于此道呢？从共产党联盟关于德拉维事件的宣言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虽然遭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鄙视，但仍然大言不惭地说："与罢工和抗争中的各个领导人和工会一直保持着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敝党自始至终都是民众团体活动中的参与力量。"这和某报所登的"把它们的威信禅让于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人"的说法简直如出一辙。这种奴才心理，源自过去教徒的服从精神。这两者相比较而言，我更敬重服从教皇的教徒，而鄙视那些给工会领导人当跟屁虫的政客，因为前者没有贪利之心。

不理解宗教精神的力量，就无法真正理解文明人与暴乱者联合起来屠杀军人、阻挠报纸发行、破坏公共生活，以及其他古罗马皇帝如尼禄、黑里阿加巴卢斯登做梦都想不到的奇事。这些人能从卑劣的服从中得到什么？只有毫不掩饰地被他所侍奉的主人唾弃罢了。

共产党的议员们不懂得心理学，而秩序维护者们的见解也很有必要一提。报纸刊登了某温和派议员的话说，正是因为没有足够迅速地表决工会所要求的法令，才导致了德拉维事件的发生。按他的说法，似乎应该在收回西部铁路之后就立即颁布所得税法，暴露工人的产业情况并准备掠夺。总之对于革命工会的要求应该言听计从，其实工会联盟早已放出话来，并不在意改革。一直服从、永远服从、胆小怕事，难道不是危险吗？

想知道胆小怕事的后果，可以在电业罢工第二天去国务总理家瞧瞧。那一天，总理召集巴黎六个区的电政局长到家里商讨善后事宜。拥有 300 万人口的巴黎市自然不能任由几个工会联盟摆布。因此，总理提出开除相关人员，并用工兵代替。结果六位局长中，只有一人赞成此做法，其余五人宁愿服从工会领导人的命令。第二天，这些人派出使者给那个恐怖的人提供了一个

四千法郎工资的职位。这件事情要不是有人亲眼所见为凭，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群众最容易鄙视懦弱的人，而最敬重强硬的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以怯懦取胜的先例。替换电业工人其实很容易，机器都是自动的，工人的任务非常轻松，只要通过简单的学习，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各家报纸都谴责了电政局长的懦弱。《时报》称：“自社会开始恐慌至今，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此次这般懦弱的事。我们不应去考虑革命派的态度，而应该好好反思有没有治疗懦弱的良方。政府履行职责，却没有人支持，非但不提供支持，反而甘愿遭受攻击。”

既然厂长既不愿意自卫也不善于把握群众心理，他的降职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三

除了前文所讲的性格共性，工人的心理特点其实更具特性。这种特性源自一种小众的观念，因为反复被提及以及相互的影响，这种小众观念现已成为定论。

这种观念十分简单却又错误百出。工会的宣传者如此表述它：“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可这财富却不为工人所有，而属于没有参加劳动的人。想要消除这种不公平，应当以工人为本，推翻当前的社会。想要推翻这个社会，需要工人们结成团体，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化，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工会所使用的方法，是接连组织罢工并要求涨工资，以蚕食工业营业利润。这种日益蔓延的运动对传统产业非常有效，因为传统产业的经理们惧怕工人势力，又不顾及股东利益。他们一再退让，致使利润下降到零，紧接着，股票的价格也将步此后尘。这样的状况必将导致新的产业很难寻找到

资产投资人。股东们一旦遭此境遇，必然会转而投资外国公司。我们知道，如今法国进口外国制造的货物已经越来越多了。工人们缺乏远见，只顾眼前利益，冥顽不化。这样衰败下去，无异于杀鸡取卵。

由于一些学者心怀怨愤、毁谤社会，工人们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情况，如今越演越烈。这些学者在学识上一知半解，又唯恐天下不乱，他们靠背诵厚厚的教科书获得文凭，憧憬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可社会不重视他们的才能，于是他们诋毁这个社会，愚蠢地指导着当今社会的人文现状和经济要素。

可见，是这些由大学制造的堕落的人误导了工人们，使他们自以为在为世上之大不公而牺牲，最终难免走上作乱的邪路。工人们觉得自己的所得不合理，剩余价值被他人剥削，所以他们的脑海中还存在幻想。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财富创造者，是农夫、实业家、工程师、知识分子，总之所有有能力的人，除了工人。诚然，手工劳动也助于发明创造，可是近代机械的不断进步已经使手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电厂的工作，只需要很少的工人就能完成。正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工业，以汽车工业为例，所制造的商品价值中，只有五分之一来自工人手工，可手工业者却对报酬仍不满足。中产阶级中的许多法官、医生、工程师、律师、官员等 20 年的劳动所得都比不上工人的工资，如果再考虑培养这些职业的教育费用，简直入不敷出。

巴黎的大多数工厂中，姑且以前文所讲的汽车厂为例，据说手工工人的工资最低为每天 6 法郎，这相当于大学中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助手的薪酬，而有的熟练工人日薪可以高达 13 ～ 14 法郎。普通民众普遍认为人类智慧生而平等，他们觉得工厂领导获得的利益太多了，普通工人可以和受过教育的人一样管理好工厂或公司。其实工人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能力不够。那里可以找到工人们自己创业取得的成绩吗？

这种对优秀的人的积怨心理，正广泛传播。在大城市如布雷斯特、第戎、鲁贝、图卢兹，许多如普通工人、车站运输员这样平庸的人被选为市长和市

议员，不仅消耗了财政，也加速了组织的破坏。人们都知道这样做的不堪后果，所以改选的时候争先恐后想摆脱这些庸人的阻碍。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在阿尔萨斯洛林地方大选中，斯特拉斯堡和米卢斯两个城市都拒绝任用工人。尤其米卢斯城由于施政混乱不堪，导致市议员改选时竟没有一人成功再选。

一个民族只有经受过教训、总结过经验，才能认清自己的错误。经验虽然可能带来破坏，但它有弊端也有益处，有时也应该顺应。如果让共产党的工人统治全法国所有自治区，那必然会招致人民对社会主义最深的憎恶。到了那个时候，群众或许才会知道，平等并非自然，能力才是最大的权力，是国家财富的源泉。拥有高级知识的少数精英分子，如学者、实业家、艺术家、工程师和经过选拔的工人，才拥有真正的实力，真正的资本，这资本就是智慧，是那些只知道幻想的愚昧人永远无法夺走的。

第四章　平民意向的新形式

一

从眼前的结果来看，邮政员罢工与别的罢工并无相异之处，然而从长远考虑，这是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现象。

许多行将消散的小群体存在于这个社会中。这些小群体只关心自己，却毫无爱国心，即便牺牲人民大众的福祉，也要追求自己小群体的利益。邮政员的罢工，证明这些小群体已经开始消散。他们使其他民众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如困于围城中一般忍受着饥饿，他们丝毫不顾及公共生活秩序的破坏及其所带来的衰败。

这种小群体将自私心置于大众利益之上，许多外国人都非常叹息。如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时报》说："眼下的罢工表明法国的国民生活中有一些险恶的情形，他们令人十分惋惜。如果要用战争迅速解决欧洲目前的恐慌，那么法国的军事力量恐怕不出数天就会被消灭到最低程度。灭顶之灾将不可避免。"

从此次罢工中得到的教训，其一是一小部分公民对大众利益的无视，其二是社会新势力的形成使得本次罢工具有突然性。这新势力在人们的视线之

外产生、发展，等到自己的力量发展到足够强大的时候，才出现在国家议会的面前，并出其不意地展示出它未来可能的实力。

这种猝不及防的势力的发展，在与国家政权作对的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的权威。共产党还在为此次罢工成功而庆祝，他们难道不是错误的么？邮递员罢工的成功，是因为国会逐渐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国会只知道制定毫无效力的法令，虐待各个阶级的公民。人们都知道女邮递员因为去教堂做弥撒而被县长撤职的事，也都因此事而愤愤不平。正是出自这个原因，他们才对罢工者表示支持。这种民意的变化，给我们的时代带来混乱与堕落。大革命中，我们曾经取缔团体推崇个体，可如今团体又卷土重来。我们曾经废止人头税以避免纠察，可如今纠察也东山再起，甚至比过去的宗教虐待还要残酷。过去的暴政，如今都改换了名目一一恢复。在工会的神权政府下，我们将失去一切自由，仅有的自由，就是怨恨我们自己。

这场罢工发展迅速，却缺乏正当的理由，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出它源自一种政治心理。发布罢工宣言时，邮递员们很难说出罢工的理由，这从他们宣言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出。1909 年 3 月 19 日的《晨报》刊登了罢工中央委员会的宣告："我们向来不曾将罢工作为保护我们职业的方式，只因为西米扬侮辱了我们同行的女员工，全体同行才表示不满。"我们知道妇女一直以来都被当作飞鸟，怎么可以因为她们而阻碍全国的公共生活？罢工者们似乎也不得不再列出别的理由，于是又提出要增加员工福利，可无非是要求将每三年自动涨薪的期限提前三个月，这理由并不充分。

实际上，这次罢工另有隐情。15 年来，邮递员一直自诩为选举的中坚力量。这样特殊的地位，使得政府对他们一直是有求必应，他们的工资比大多数官员都高，在各类工人中也属高薪。他们的知识水平只相当于官员的初级教育，所做的工作又相对简单。那些带头罢工的人，拿着六千法郎的年薪，即使是考勤记录最不好的员工，四五年后年薪也会涨到四千四百法郎，而游

行的人年薪也有五千五百法郎，退休后还能拿到薪水三分之二的养老金。勤奋工作的员工每三年就有一次晋升机会，差一点儿的也不过推迟三个月而已。当初政府在报纸上公布晋升规定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只要工龄足够就可晋级，这是何等的宽容。邮递员的地位如此优越，他们为什么还要罢工呢？是这些群众太有恃无恐了。《时报》分析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十年甚至十二年以来，每一任副总统都采取迎合他们的政策以博取他们的支持。只要是这些人提出的要求，副总统们一概认为合情合理、容易施行并予以应允。他们的要求总带着命令的口吻，很容易在胆小怕事的官员那里得到满足。久而久之这些命令式的要求便成了惯例，最终酿成大祸。"

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谄媚这些邮政员工的代表，据说他们工会的会长每星期都去官员家里用餐，对于人事的续用、晋升以及司长的任免等事，副总统也都会向工会的人咨询。他们还经常以经费不足、钱不够花为由与长官们争执，最后往往不欢而散。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在恭顺的官员们面前摆主人的架子，一旦遭到抵触，怎么能不愤怒呢？所以 3 月 12 日，他们找了个微不足道的借口派代表面见总统，要求取消选择式的晋升方式。要求被驳回后，他们恼羞成怒，吵吵嚷嚷地跑到电报总局闹事，煽动罢工。第二天又举行全体员工表决并一致通过，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整个事件中，政府只有空泛地抵抗，从威胁开除员工并得到议会支持，到最后彻底地宣告妥协，态度简直卑微至极。大权在握的政府，竟然屈从于叛乱官员的指令。邮政人员代表发表胜利宣言的时候说："昨天我在总理办公室，看到长官们几乎要跪下来求我们停止运动。我觉得，是我们的决心让我们如此强大。"

没过几天，闹事者就领会了这次胜利的意义，他们的代表说："这次运动让我们理解了'主人'一词的含义，我们觉得，如今已经不再有主人，我们也不是职员，大家都是同事。"这位代表其实是过谦了。与其称邮递员为同事，不如就叫他们主人还更恰当一些。

城市警察这样的小官吏们也知道了只要威胁就能达到目的，他们毫无道德约束，纷纷提出要求。那位深谙心理学实践之道的工会首领P.P，在事后说了一句箴言："让下属们意识到自己拥有前所未知的力量，这是当政者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他也明白了要按规矩办事，他懂得利用法律让官员服从。他曾对着众人说，就算他命令将行政长官扔进油锅里，人们也会照做，幸好这样的命令执行得缓慢，否则真就太危险了。

共产党也在它最重要的报纸中对此次胜利加以评述："工人们从此明白了掌握电报、电话、邮政等工具的重要性，今天工人可以利用这些工具罢工以达到个别目的或者免去副总统的职务，将来决战之时，这些工具更可以用来解放民族大众。政府已经走上了退让的道路，最终必将堕落崩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据报纸最近的报道，许多国有董事会都以派出一名书记的方式加入了颠覆秩序的革命联盟。是真是假暂且不论，我们可想而知的是官员们的畏惧。叛乱官吏们虽然只是暂时的胜利，但他们会带来可怕的长期后果。暂且讲讲近期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他们破坏了以往的秩序，颠覆了国家财政和公共事业。速度或快或慢，但后果肯定相当严重。现代社会唯一具有真正约束力的道德体系，如今灰飞烟灭。

这种现象并非一两天所能形成，它有很深的渊源。政客们贪图胜利，不断用不切实际的承诺愚弄选举人。选举委员会、小学教师和酒商们，如今已然成为我们的主人，这样的事情，只有一切等级、一切纪律、一切对公共利益的忠诚都逐渐被摧毁的时候，才会发生。古罗马、雅典和意大利共和国那种最暴虐混乱的独裁政体，将是我们的归宿。

二

邮递员罢工造成的状况应该想办法予以解决。深受法律万能的拉丁幻想所浸染的政客们，建议用法律来解决动乱。政府随机颁布官吏地位法以惩戒官员罢工。向来保守稳重的某家报纸，也认可这种方法。可是我姑且问一句，免职或者逮捕的方法能挡得住万人大罢工吗？没人会觉得可行。先前最后一次罢工时，政府也曾以开除作为威胁，有用吗？没用。

其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第二次罢工之后政府也曾被逼无奈使用过。若不是局长们在电业工人罢工时显得那么懦弱，邮递员们也就不会紧接着罢工。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无路可逃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被俘虏，要么去战斗。如果投降做了俘虏，就只能听任胜利者的摆布。可如果采取防御去战斗，或许还能博得一胜，即便失败了，无非是和投降了一样做俘虏，而且还保全了名誉。由此可见，解决当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与议会团结起来，同非法团体和势力战斗。

电业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也许会和邮政工人联合起来，城市也许会混乱不堪，巴黎也许撑不了几天就会有饥饿发生，战斗也许会很残酷，但胜利终将到来。可现在如果懦弱地退让，将来仍不免一战。况且现在军队仍在掌握之中，将来却不一定。秩序与革命，二者不可能共存。我们的民族经历过许多动乱，可从来没有长久处于革命状态中。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也是一样，政府有好办法，可是又不敢用。因为许多总统在从政之前也曾煽动过罢工，他们与叛乱者本来就是一丘之貉，怎么敢背离呢？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和平解决这股反社会的力量呢？从理性的角度看，反抗之说只是表面现象，和平解决是有可能的。可实际执行困难很大，因为其中一方是在感情用事，不可理喻。正如愤怒、嫉妒、崇拜等字眼的力量，属于另一个权力范围，非理性所能达到。所以，我们应该改变的是精神，而非

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常常不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纠正群众错误的精神状态，消除他们的嫉妒与激愤，这并不容易。身为政界人士，我们坚信社会不可以随意改造，国家也不是万能的上帝。人民大众心理的进步，是民族进步的基石，虽然这一刻还很遥远。这次邮递员们罢工所表现出的工会主义，是最为危险的。这危险不在于他们对利益的觊觎，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坚韧性。如今的议会已经威望扫地、朋党林立、毫无实力，这样的议会很难去和工会抗衡。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经常被那种毫无价值却拥有强大意志的果敢的人所统治。这些人充满自信，意志坚定，他们颠覆强大的帝国，他们创立能奴役人精神的宗教。

真理虽微，终能广传。意志坚定、纪律严明，就足以震慑他人、保卫自己。坚持不懈，就足以创造一种新的权力，因为权力正是势力的永恒延续。

第五章 让人失望的议会和竞价法

一

法国大革命伊始，人们还不习惯砍下异己者的头颅。圣居斯特虽然觊觎德穆兰的人头，但终究没有得到。德穆兰，这位著名的民族作家，曾于革命结束前在笔记中做出最后的论述，许多文人学者可能都没有读过。我也是在共和国二年农历七月二十日的报纸上才亲眼所见。这篇论述表明，革命之初，悲天悯人的他曾非常担忧有损于民主制的竞价法，文中他讲了一个罗马时代的故事来进行反驳和攻击。

这位民族作家说，从前罗马有一个共产派的议员名叫格拉古斯，他经常对工人们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并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但也因此招致了元老们的忌惮。著名议会为了打击这位共产派议员，维护元老们的威望，收买了一位名叫德鲁斯的无党派人士，并用竞价法攻击他。这个方法大致如下，只要格拉古斯要求将面包以一磅四镑的价格卖给平民，德鲁斯就把价格压低两镑出售。没过多久，那些之前崇拜格拉古斯的人便不再信任他，甚至聚集起来打破了他的头。你可以尽情想象元老院得意的神情。当时很少有人同情格拉古斯的死，后世更是漠不关心。德穆兰讲的故事大致如此。可竟然没有

人能理解他的论道之词。民众们迫于每天加价的压力，便坠入暴乱、闹事、专制的深渊中。

从表面来看，竞价法确实是战胜对手的好方法。共产党的议员们曾许诺，只要党派选举获胜，就给各选举人年薪6000法郎的职位，其他人也可以许诺，甚至可以将年薪加倍，再奉送一辆从中产阶级手中掠夺的汽车。这样的竞价没有上限，可到了真正兑现的时候，如果和承诺相差太多，就会十分危险。

竞价的方法十分简单易行，所以政客们经常随意使用，以至于成了恼人的恶习，直到今天才发现它带来很多问题。许诺容易兑现难。许诺者即便以党派反对为借口，对兑现期限稍加拖延，最终也难免被选举人发现原来是画饼充饥。议员因为竞价而失去信任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立法者虽然也是一片热忱，但没有人能建造空中楼阁。何况他们的承诺实在是不可能实行，他们制定的法律，总是和自然法则相违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每天增加痛苦。竞价一个接着一个，议院前脚刚刚表决每年支出八百万法郎的工人养老法案，后脚又表决了年需两百万法郎的铁路工人养老法，如此接连不暇，相关人也清楚这样表决的错误，所以请上议院审核削减其数目。

最初被华丽的诺言所欺骗的民众们，如今大多已经觉悟了。当初投票的时候，那些候选人是那么谦卑，可一旦当选，今天他们对待弱者又是那么残暴，他们的诺言也是那么地难以兑现。如今的议员，既是选举委员会的奴仆，又要面对投票后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人们的愤怒，他们的地位毫无可羡慕之处。潘伽烈笔下一个外省公证人的遭遇就反映了这种生活。他曾充满幻想，可幻想很快就一一破灭了。他当初与选举委员会打成一片，当选之后，也曾试图保持独立。可很快就有人告诫他，这可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他不得不加入一个党派。之后信件如雪片般飞来，都是要求棕榈奖章，要求援助，要求职位的，这样怎么能不受到胁迫呢？之后不久，他当了总统，

椅子还没坐热，就有二十多个想谋条好出路的热血青年涌进他的书房。他虽然婉拒了他们，可这些青年还是当上了事务司的司长、副司长、科长、科员。他想办些实事，可内阁会议让他陷入绝望，原来他们只是想一直连任下去，以避免些不必要的麻烦而已。他最终厌倦了这一切，辞掉职位回了家乡。

有这样一种议员，他们踌躇满志地进入议会，一旦与群众纠缠在一起，就变得无所作为。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左党议员拉波里。他曾在一次演说中讲道："议员在公共事务中竟然毫无自主权。议会的行事方式是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也没有诚意。议会用坑蒙拐骗获得表决，从来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议员打着对选举人公平的幌子，都依附在部长的门下。议会和政府要么被日渐强大的民意所裹挟，要么被财政界少数几个只关心自身利益的财阀所挟持。政治力量的博弈，成了对三股强大势力的竞价和贿赂，过激的民意和财阀就是其中两大势力。议会不顾长远利益，草率地表决法律。四年中我得到的教训就是，任何品行端正意志坚定的人，在议会中也只能是白费力气。"

二

人们厌恶议会，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竞价法的盛行。很多公民都有这种厌恶心理，后文另叙。这里要讲的是竞价法对政府行事方式的影响。当竞价成为习惯，人们遇到威胁便自然而然地服从。同事之间竞相退让，只因惧怕被对方胁迫。通过考察不难看到，威胁常来自工业界。大多数社会法律，都是议会不顾反对和抱怨而制定，这些可怕的法律将肮脏散布各地，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一位大型航海公司的总经理近日便道出了由这些法律所导致的航海业无可奈何的衰败。工业的发展受这些繁杂的规定

所限，很多工厂不再使用学徒工，导致数以千计的儿童犯罪。每年有 90 万法郎要用作老年人的救济费，根据正式报告，这笔费用要从选举人的津贴中支出。如果再加上酿酒业拿走的一百万法郎和工人养老法所规定的几百万法郎预算，还有工业的负担，以及为维护个人利益而竞价的费用，选举人的负担是再清楚不过了。立法者毫不顾忌法律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还有何话说？很多表面上无关痛痒的法律，实则消耗巨大。1908 年 4 月 2 日《巴黎市政公报》刊登了一位市议员的报告，文中讲到，新制定的工人法律，使市政府每年需要增加 60 万法郎的预算，付给煤炭和水利工厂。

市议会似乎也不太有理由诉苦，因为市议员用的竞价手段丝毫不亚于政府官员。《全球报》8 月 19 日刊载了巴黎市议会颁布的所谓人道法，这项法律使巴黎各个电车公司的股东每年增加支出 75 万法郎。这些公司资本亏损，营业下滑，出现了不给股东分红的情况。共产党一定会叫好，可一旦将来股东罢工，市政当局恐怕不得不仍按原计划行事。到时候所有纳税人都会受损失，共产党也不例外，他们那时候才能体会到经济规则的力量，不过为时已晚了。

如今，竞价方法、人道主义、胆小怕事已经笼罩了我们，即便痛斥也不见得会有好转。只有缺乏固定性的民族，才会流行这些祸乱，等待着它的，只有衰亡。

三

议会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并不难理解。其一，许诺泛滥，画饼充饥；其二，试图兑现这些不可能实现的许诺，而造成商业、工业、财政中的混乱；其三，兑现许诺而冒犯了上层阶级；其四，失去了信奉国家权威者的信任。

让我们分析社会各阶层民众，进一步论述反对议会主义的内容。教徒以及旧教徒反对议会，这自不必说。这些人是国民的大多数，他们先是惨遭掠夺，又被围困和搜刮，最后饱受虐待。想要他们对镇压自己的人表达友好，这有可能吗？他们有十足正当的理由反对议会。

至于小学老师以及大多数低级官吏，他们反对议会的理由也许并不十分正当，可他们对于议会的厌恶感是相同的。从来没有哪届政府如此关心小学老师的利益，也从没有哪届政府让小学老师如此失望。最近小学老师联合会加入了劳动革命委员会，足见他们的真实意图。

真正的政府官员，人数大约80万。他们的要求越被满足，反对的呼声就会越高。如果不加以控制，必遗患无穷。这危害不仅仅是沉重的预算，还会有政权更迭、国将不国。如果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政府便可以信任，一旦他们的欲壑没有填满，他们就会像邮递员那样群起作乱。这些官员们如今所觊觎的，是将部门的生杀大权分散到各行政厅，由厅长们完全专制。倘若真成了那样，我们还不如返回帝制。皇帝的专制，起码是暂时的，不长久的，我们还可以有所指望，而这些无名司长们的暴政，会让我们永无出头之日，彻底断绝希望。可是我们已经被这些人笼罩，眼看就要生存不下去了。百年以来，法国曾更迭过许多政体，更换过许多元首和总统。只有这些官员的权力，从没有被触动，一直在扩张。他们聚集在一切肮脏破败之上。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唯一的主子。

四

工人们20年来从法令中获取的好处，不比小学老师和官员们少。可他们却对法令表达了最多的不满。要解释这种现象，根本用不上马基雅弗利。因

为平民的精神很难改变规则的结果。群众只会尊重和服从强硬的政府，他们绝不会对胁迫而来的利益心怀半点儿感恩。鄙视懦弱，才是他们的原则。大到全体工人，小到劳动联合会，他们全都反对议会，这毋庸置疑。他们愤恨所有立法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而对教会党稍显友好，也许是他们之间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工人们现在憧憬着用一个平民专政的政体取代激进的民主独裁政府。他们对平民专政的魔力深信不疑，他们相信劳动阶级一定能实现共同富裕，而这是中产阶级所无法做到的。

罗史说：经常听到议员们不切实际地许愿和宣扬，说人民群众应该当家做主、至高无上，人民群众享有一切权利，无须承担义务，任何愿望都可以实现。近来民众已经普遍将议员视作他们的臣子。

如今平民宣传者们有这样一句座右铭："不需要官员，也别理会议会，我们只需行动起来。"共产党员也感觉到反对愈演愈烈，曾试图通过阿谀奉承博取友好，可最终失败了，他们甚至不敢出席工人大会，即使偶然出席发言，也会遭人训斥。证明见于1909年5月21日的《时报》，上面登载了德让特出席巴黎议院时遭侮辱的情况。

五

实业家和资本家反对议会的理由虽然不同，但都很正当。他们是国民财富真正的创造者，政府却从未对他们表示过欢迎，非但不表示欢迎，还在他们遭受破坏、焚烧以及其他各种暴力侵害时，不提供保护，甚至制定残酷的社会法律，整日阻碍他们工业的发展。如今，他们只能坐等苛税将他们的产业剥削殆尽。

鲍丁在《实际政策》一书中说，人们并不希望得到特殊优待，因为这个

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精英的代表。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精英，这我已在前文述明。精英的使命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大。科学、工业和物质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都依赖于精英，这是困窘的奴仆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共产党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境。

可见，议会主义已经四面树敌，招致所有阶级的厌恶。只有中产阶层还没有反对它，他们只是默然观察。就像之前很多次那样，这里我再次引用多尼亚克的文章作为证明："法国的中产阶层数量庞大，他们受十次革命的影响，对于各种政体，都只是淡然观察。他们既不保王，也不拥帝，也不属于共和党。他们为共和国投票，只因为法国现在是共和国。他们最保守，可他们保卫和守护的是当今社会的基本要素。他们也很忠顺，可他们只愿意忠顺于给我们带来和平与安定的人。一旦失败，既未可知，所以无用。"

议会中最让人失望的行为，是对外省议员的残暴。想要赢得选举，议员们不得不恨委员会之所恨。只要不是自己党派的人，一律粗鲁地对待。卢贝总统之前曾是下议院议员。在《星期日报》刊登的他的访谈录中，他说："县区单选法使议员代表制腐朽到了可悲的境地。还有谁想要维护它呢？选举制在外省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其所制造的残酷，是巴黎人无法想象的。'要么投我的票，要么就是我的敌人'，他们毫不避讳这就是他们的规则。敌人的农田遭了雹灾，敌人的牲畜感染了瘟疫，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只有特定的选举人才给发抚慰金，其他人一概拿不到。他们倾家荡产，是自取其祸，谁让他们当初不投胜选者的票呢？如果法国现在仍是中央集权制，这种风气也许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可制度早就变了，不平之声恐怕终会普遍。"

明事理的人也已经开始严厉训斥下议院的风气了。从均选时共和国共和委员会的宣言，就可看出这一点。宣言下的署名全是研究院、大学、工业界和律师界有名望的人，如卡诺、布沙尔、克鲁瓦塞、戴斯特、潘勒伟、哈曼、

迪尔、弗雷等人。这个“等人”之中大约有五十多名卓越的人。这个宣告蕴含着一层深意，那就是精英们在为自己受到太多压制而抗争。宣言中有一段如下：“县区单选制使人们一直对政治现状和选举风气有所诟病。比如官员一旦当选，便擅自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不顾公平而私惠个人，破坏公共事物，将私利置于公益之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应该解放被奴役的议员，让他们自由行使选举权，让他们有道德、有尊严。政治应当是理念的博弈，而非人身攻击。”

六

议会制度遭到如此广泛的反对，为什么还能一直存在呢？因为所有文明国家都采用它，它是无可替代、唯一可行的制度。无论是议会制的国家，还是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这样拥有世袭君主的国家，或者法国、美国等采用总统选举制的国家，都采用议会制度。议会常作为立法机构，而总统为行政长官。以土耳其、俄国为代表的欧洲最后的专制政府，最终也采用了议会制。可见，议会制无可替代。

既然议会制漏洞百出却又无可替代，我们就应该设法完善它。正如我前文所讲的，应该修改议员选举法，使议员独立于选举人，并摒弃问题官员，使官员们像在企业供职的人员一样，不必先有约定再做任用。这样可以简化任免，就如同让下人们不再变得像主人一样乖张傲慢。

议会中最急需改变的，是领导者应该更强势一点。不要以息事宁人为由，颁布一堆缓和的法令和乱党和解，这样只会让叛乱分子、纵火分子和破坏分子越聚越多，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我不明白当权者为何到现在还意识不到懦弱的危害？一次又一次地赦免，叛乱却从未停止过，到最后损

失越来越大。比如1907年的南方两省反叛和军队一个团的哗变，1908年德拉维的武装暴动，1909年邮政工人、航海业工人罢工以及梅鲁、马扎默尼两地的革命罢工，他们的破坏方式层出不穷，甚至炸毁了海轮。1909年还有马赛航海员工的罢工，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反叛者们也像当权者那样软弱，这样的局面必不会如此持久。叛乱愈演愈烈，如果维持秩序的政党们继续懦弱下去，恐怕我们的国家最终会沦为无政府状态。

第六章 专政政治的进步

一

当今一个典型的特征，是革命工会主义正在转变为绝对专制主义。近来某主流报纸刊载的事例很多，我举其中一个例子："赛特发生一起工会虐待事件，工会强迫 12 名工人不许劳动，这相当于砸了他们的饭碗。工人们何罪之有呢？原来是因为最近罢工的时候，他们不愿意为人所用、同流合污。其他城市的工人没有如赛特城一般受工会如此迫害。赛特是个苦地方，最近的经济危机更是雪上加霜。这里的船运工人频繁罢工，提出很多要求，他们几乎已经毁掉了地中海周边法国第二大海港的所有生意。城市日益贫困，海岸逐渐荒芜，已经很少看到有航船入港了。"

类似事件不仅出现在赛特，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从前是特例，如今已然成为常例。这样蔓延的事态，一定有深远的原因在其中。社会政治事件并不像自然现象，通常都有其发展的渊源。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演说家们对专制制度的鄙弃以及对自由制度的推崇之词，一直不绝于耳。可同时期的历史事实却与这说辞截然相反，人们厌恶自由，尤其是他人的自由，却对暴政表现出普遍的喜欢。我们所有的政治纷争，都纠缠于某个政党对某个阶层的某种暴政。从路易十四时期，人们

便没有了爱，国家肆意地迫害新教徒，屠杀詹森教徒。今天的人们仍是这样，用同样的方法剥夺异己者的财产。如今的这些小君主们固然无法和路易十四相比，可他们对于独裁的渴望是相同的。工会继承了专制政治的衣钵。

法国一切党派都反对残暴以及类似的暴政倾向。法甘曾说，孩子们从小在学校所学到的，就是对各阶层人民的憎恶。大家都清楚，许多小学老师都非常热衷于在平民中宣扬这种心理倾向。社会中的各类人群，都心怀对专制的喜爱和对宽容的憎恶，我们只能屈从接受。这种专制心理，一开始被君王和贵族所用，后来被中产者继承，如今落在了平民手中。平民需要暴力来维护手中的专制，这种暴力也让共产党感到不快，他们向乱民主子阿谀奉承的姿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有奴隶对奴隶主才说得出那样献媚的言辞，其他人说不出那样的话。

乱民领导人发出的一切指令，他们全都小心翼翼地服从。这些宣传者及其追随者，拥有非常恐怖的煽动力量，要服侍这样的主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以前，人们不懂得处理事务需要公平、需要程序、需要赋权，他们只会随波逐流，跟着多数人的喜好和要求走。如今，人们抛弃了这个习惯，对于无法解决的事情，需要进行表决，于是有人开始煽动，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经济发展规律，践踏着自然规律。这样的煽动，代表着工会主义的意志。劳动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是最有煽动势力的，他们专制权力之大，连共产党都无法想象。

这些领导人的内心世界十分肮脏。德夏内尔曾在演说中分析过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心中只有专横、傲慢与妄想：他们蔑视议会，在劳动联合会中霸道行事，足以证明其专横；他们唾弃普选，反对民治主义，足以证明其傲慢；他们信奉自己可以开天辟地建立新社会，足以证明其妄想。这些人声称不相信神话，可他们自己就如同原始人一样活在神话之中。这神话已经转化为一种别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玄奇，它是人的一种低级意识，它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的彻底退化，它代表着原始和野蛮的卷土重来。人类

可是费尽了努力，才走出那个时代。

这些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欲求很类似于最初的基督教徒。犹太人预言家也曾反抗富人，并预言大公时代必会到来。教会的神父，也曾对圣巴西莱、圣吉恩克里索斯托姆等人说，富人们都是强盗。圣杰罗姆也曾宣称，富人窃取他人财产而致富，应该将实业公司的财产平均化。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人们可以搬出的典故，确实不少。

二

对暴政的依赖，是一种民族心理，是我们心中与生俱来的。倘若不信，可以分析其他国家采用与我们相同的制度后，是什么结果。

先列举各国发展程度相似的工会主义为例。在法国，工会主义成为一种暴乱的武器，它煽动叛乱、挑起怨恨、反对国家、攻击军队，使社会解体，国家危机重重。在英国则正好相反，工会主义平和许多，它调和工厂主和工人的关系，没有煽动、没有怨恨以及反叛。我国的工人代表去英国考察时看到这样的情形，感触良多。下面是他的一段报告："英国朋友们的国民精神让我们十分惊讶，他们拥有博爱之情。没有人反对政府，在曼彻斯特的劳动会上，我们曾多次亲见会员们举杯祝国王健康。他们参加工厂主的宴会，和工厂主们的友谊似乎比外交关系还好，这和我们国家动不动就指责政府的情况很不相同。"

我不知道这个世纪中会不会有新的宗教产生，倘若真的产生，并且能让我们拥有拉丁种族所缺乏的容忍性格，以及对暴政的抵触，我们一定会欢欣鼓舞。工会领导人的暴政，如果只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叛乱或者罢工，还不能算最危险，最危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见的。他们持续不断的动乱的影响若渐渐积累下来，将使得整个公共事业和工业逐步解体。这意味着，我们的社

会生活将会崩溃。

社会恐惧使劳动量减少，生产成本增加。自电业工人罢工以来，人们出于恐惧，都谨言慎行。兵工厂要五年才能造一艘船，而英国人只需三年。政府在污染中堕落，尸位素餐、渎职无能的情形比比皆是。官员对公共事业毫不过问，只盯着一己私利。随意的小群体的破坏事件时有发生。短短几年之中，海军就有六艘大型战舰被破坏，这绝不是意外天灾所致。

政府与专制平民狼狈为奸的事情也有很多，比如残酷对待教会、抢夺工业财产、暴虐抵制工商业等。现在又托出所谓所得税，法国几百年来从未出现过如此压制个人主义的武器。各位经济学家不下二十次的论述，以及德隆白的论文，都在证明这种税法非但不能减轻个人负担，还会破坏财政。法国工会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十分欢迎所得税，他们无非是打着这两个主意：第一，反正受害的不是他们党派的人，让别人窘迫去吧；第二，通过财政检查，可以随时掌握他人财产，他们就可以像没收教会财产一样，把这些财产一次性或者逐步地抢归己有。不过，这个法令目前只能起到打压异己、缓解盟友负担的作用，将来如果真正实施这种检查制度，必然招致抵触和憎恶，它将带着整个国家一起走向灭亡。工会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结局。要知道，即便是乖顺的羊，逼急了也会愤怒。工会那些人心中只有专制的欲望，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有这样的见识呢？

三

不必避讳，倾向暴政、轻视自由之风已经在法国流行。但这中间也有些崇尚自由、明白事理的精英，他们反对暴虐地对待和奴役所有阶层的人。不过这部分人很少，还不足以形成一派势力。如今他们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在减少。

那么我们提一个很艰难的问题，为什么本就为数不多的这样的精英还在日渐减少呢？议员及其选举人中，有很多教授、医生、实业家、工程师这样的贤明之人。他们为什么成了鼓吹颠覆之人呢？为什么学院和大学中充斥着革命共产主义、反国家主义和反军队主义的散布者和领导者呢？

如果我们回答，教育并不一定带来良知，或者明理之人看不清太过明显的道理，这样的回答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这种心态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最恐怖的，是我们前文所讲的对议会表决的操纵。前共产党议员傅尼莱曾讲道："所有议员都戴着一副恐惧的枷锁，不管他们是最动乱派，还是最纯粹的议会派。作为社会的导师，我们曾给信众们许诺一定会有天堂，可如今，我们把他们指引到了什么境地？议员被选举委员会的喧嚣所裹挟，胆小怕事不敢有所作为。他们不但不反思自己谄媚平民的行为，反而竞相攀比，唯恐他人不知，个个争先献媚。谎话说得太久，连自己也会信以为真的。"

除了上面这一条，我们还要分析另外一条原因，就是拉丁组试图通过法律改造社会的错误行为。所有党派对法律可以救世济人这一点都深信不疑，所以，议员都有意愿做些实事。可他们并不知道社会需求的复杂，他们治理社会就像旧时的庸医治疗病人那样，随随便便就放血、腹泻，错误百出。国法万能的观念，在法国已经成了教条式的定论。无论如何辩驳，都无法削弱人们对它的迷信。波尔多分析大学一位教授曾著书论证国家的神道使命，他说："按照这位教授的观点，国家应该确保人民福祉和社会安康，如中世纪的教

会一样行使职能。民主社会的教育家中，竟还有这样的人，不懂得社会真正的推动力，而是活在幻想之中。令人遗憾的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国家独裁主义深深印在共产党派的脑海之中，他们宣称国家可以掌管一切，为所欲为，可以毫不顾惜信约权力。”

这种乖张的思维方式，只有非洲的黑人酋长才会有。可是，他们有时仍然能利用情感而得到人民的信任。按照共产党的主张，连国家都可以不要了。最近，共产党的领袖曾在议会发表过这种观念，某长官批驳道：“假如国家与企业签订合同，双方发生争执时，只有国家一方拥有解释权，哪有这样轻而易举的事呢？国家以政府名义与私人签订契约，竟然第二天或者二三十年后要毁约，这样的国家还能有威信么？这样简单浅显的道理，竟然还值得拿出来辩论，足见专制制度强大的蛊惑能力。”

四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了立法者的心态。那么中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又从何而来呢？

中产阶级没有能力辨别妄想与实际，于是用一些花哨的语言来掩盖自己思维的拙劣，粉饰他们拥有的成绩，比如“进步者与时代同步”等。其实无论好人坏人，都看穿了这一点，况且法国人普遍认可国家党，中产者不想异于他人，所以教会、共产党、保王党等各党派中的中产者也纷纷要求国家用法令改造社会。社会主义综合所有这些意愿，得以很快渗透进中产阶级之中。

除了前文所述中产阶级的意识现状外，对传统的毫无掩饰的憎恶，是中产者赞同革命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受传统习俗的束缚最重，却又最厌恶传统。他们很清楚传统力量非常强大，不可能被消灭，因此反对这些传统。

正如奴隶反感主人，却又不得不服从。

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也拜服在新宗教式的低等激进民主党派面前，如同亚洲那些得宠的臣子跪拜他们的专制皇帝一样，这里面的原因都不简单。他们中也有崇尚自由的人不服从专制而逃离了主人。前文出现过的上议院议员皮尔卡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曾发布公开信表明自己的弃离专制的想法，他在信中说："我不是离开工会，我只想远离暴乱的群体。有些明事理的人只是束缚于传统习惯，所以还追随工会。他们因为胆怯，还不得不做着竞价的勾当，可又因此而心生恐惧。我向来不待见缺乏毅力的人，可为了给坚守良知的人做个表率，我选择不再顺从。党派可以另找乐意被他们奴役的人，这样的人共产党不难找到。还有很多人心理产生转变，愿意服从于比暴君专制更恐怖的暴政。如今，还有人在为自由制度做理论辩护，然而暴民及其领导者们都被专制主义蛊惑了双眼，怎么可能搭理那些辩护呢？"

第四篇

工会派的幻想与无政府主义的发展

各国各地，因共同利益而结成团体的现象非常普遍。德国就有不少工会，例如屠夫、教师、法官、衙役等，都有自己的团体，但他们都很安稳。只有法国的工会，才试图颠覆国家，翻身做主人，这是文明倒退的表现。如果将来工会取得胜利，我们这个时代必将陷入动乱，其他社会组织都将毫无抵抗之力。

第一章 工会派的幻想

一

人们因共同利益而结盟，这是近代的一个规律。大工业带来的，只是利益的夸张。之前，各国就已经存在过各种帮会，中世纪的弗诺朗司和西恩，都是基于工会的职业联盟，如今的理想家对它们推崇备至。革命时代取缔的那些帮派，本质上也是工会。

使小团体拥有个人所无法拥有的权力，是这种制度的一个好处。个人行为和意图的实现需要艰难的实践，而且并不十分盛行，小团体避免了这些，它已经快要发展为人类唯一的相处关系。如今，人们已不如从前那般敬仰政治制度，国家观念也已淡薄，先驱们留下的信仰已消亡殆尽。而工会的影响日益强大，正在逐步成为新的权力中心。譬如签订公共契约时，工厂主不是直接与工人沟通，而是与工会洽谈，这个制度在工业界已相当普遍。

卑劣的工人们确实从工会制度中获了益，却也付出了遭残酷暴政压迫的代价。他们也许还幻想拥有权力，却再也不可能得到自由。简单审视一番便可发现，这制度并没有特别出众之处。而它的势力大小，则因各个民族的心理特点不同而不同，工会主义的历史就在眼前，可以证明这一点。

工会主义有两种形式，依据种族的不同，分为和平工会主义和革命工会

主义。第一种是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工会，他们只追求经济利益，不关注阶级冲突。倘若换成拉丁种族，工会主义就成了破坏社会、扰乱秩序的工具，我们正在研究的，就是这种工会主义。法国也有一些只保护自己利益，不从事破坏活动的工会，他们与英国、德国的工会大体一致，但势力很小。

以劳动联合会为代表的革命工会主义则不同，他们蠢蠢欲动，并摒弃和怀疑共产主义，认为它是国家主义。为什么呢？我前文已述，并举了工会领袖P.P的言论作为例证："让下属们意识到自己拥有前所未知的力量，这是当政者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人对纪律的作用了然于胸，他趁着政府软弱，四处制造混乱。利用少数判定规则获得最大的权力，使人们都服从于他。他的经历，无论从心理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考察，都很有意思。以他为首的一小群人，非常有决心，他们可以建起一个和国家平起平坐的组织，并有能力迫使议会将共同宣告的法令迅速表决通过。从政治方面看，权力固然最重要，但有时候，不一定要真的拥有它，只要能让人相信你有权力，这就够了。巫师千年以来都受人推崇，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巫术可以提供真诚的帮助。

让一个人明目张胆地有权有势，是最难的事；而隐姓埋名地发展势力，则最简单。第一种情形，容易引来非议和指责；而第二种情况，人们则会安心接受。在法国，人们非常敬重幕后不知名的委员会，他们控制着议会，是议会真正的主人。著名政治家潘伽烈曾在演说中形容这种疯狂的议员："他们乐此不疲地利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进行表决，又侧眼观察着他们的选区，然后扪心自问，这些人能让我们的委员会满意吗？"就连最激进的共产党员，他们经常粗鲁打断议长的讲话，却对痴人说梦般的委员会小心翼翼。只要得到委员会旗下报纸的赞赏，或者一小群酒商的赞助，就俨然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者之一了。

委员会的势力之大由来已久，如今似乎还稍有收敛。他们订立的那些为害工业的法令，被商人联盟阻止。共产党的委员会曾命政府收回西部铁路所有权，这件事商会没能防止，但议会的多种赋税法令都因零售商们的联名反对而最终没能表决成功。总之，不论是政治利益联盟，还是职业利益联盟，

他们的权力将来都不会落在某个人手中，而是会被幕后小群体所掌握，当然这些小群体有人带头领导。劳动联合会的始作俑者，很清楚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他的章程是组织一个广泛的团体，委员会只负责管理团体事务，并无实权。委员会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权力，实际上大权在握，其中最要紧的就是禁止联合会会员参与讨论并提出异议。

多数工人表决通过，委员会才能获得权力，这其实是个脓包一样的困难，经常使政客们无计可施，但这难不倒联合会的创建者们。他们的宣传非常简单，说这是少数人代表多数人行使权力，他们还煽动反对民治，又将党派观念融合进来。为了自圆其说以服众，其内部人士声称：“民主主义，只是用来普及选举制的工具，人们却逐渐在不知不觉中，利用监督权来镇压少数。工会主义的前途则与此不同，有人认为工会主义激进，那只是顺从之人对革命者的说辞。这两种主义其实大相径庭。”

那么这一小撮反叛者的言行有何依据呢？没有。一切都只是他们的本能。他们的领导人，比所有派别中最高深的理论家，更了解工人挣扎的处境。加入劳动联合会的叛乱工人，与目无法纪的封建贵族没什么本质不同，人们给他献计献言，也就如同给独裁君王出谋划策一样，不必遵守什么法律，只管凭自己一时兴起去做就是。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去遵守法律，而是让法律为我们服务。

专制君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劳动联合会这样的特权群体同样目无法纪，他们形成一种新的专制政治。其中的某位领导人曾说：“法国工人应该蔑视一切权力，摒弃一切礼节，置身一切阶层之上，不必顾忌是否合法，只管行动，这是行动成功的关键。”就算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也没有这样目中无人。

新的专制势力的领导者对人民的蔑视与残酷甚至超过了亚洲的独裁者，但他们会用一些花言巧语和引诱的手段，让人民蒙在鼓里。这些言论没有诽谤，革命攸关之际，人民希望被勇敢果断的人所带领。平日里人民大众习惯了保持沉默，“有觉醒意识的人，勇于战斗的人，才有权代表工人发言”。所谓有觉醒意识的人，自然是劳动联合会的那些领导人，这还用说吗？这些人很

清楚人民的劣根性，所以对待人民就像对待奴隶。他们的代表从来不向人民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为什么要罢工。一些有独立精神的工人稍稍表现出质疑，就会立刻遭到已经沦为委员会走狗的同事们的拳打脚踢。委员会代表的命令，就如同农场主打向黑奴的皮鞭。

劳动联合会一位有头有脸的会员格里菲勒，他写过一本书，名为《一位革命家的旅行》，书中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罢工常由一些奇怪乖张的行为引起。“马赛沿岸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位工人代表，他们权势极大。他们会在工人们正忙着劳动的时候，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原因拉响鸣笛。这鸣笛是通知工人们停止劳动、开始罢工的信号。也许有人要问，什么原因罢工？很可能厂长和工人们自己都不知道。”从这段描写，足见有威望的人想要获得工人和群众的服从是多么容易。工人们信服他们，甘愿为他们牺牲，这连最残忍的暴君都无法做到。人们都知道巴黎附近那位砖厂厂长的遭遇，他想转让砖厂，却苦于没人接手，于是他把砖厂转为股份公司，并将股权赠予厂内的工人。为避免工厂经营不周，仍由他暂时管理。砖厂工人们发自内心的欣喜可想而知。不料这件事被劳动联合会的人知道了，他们担心厂长和工人的合作开了先例，于是禁止工人们接受股份。工人们竟然也毫无异议地服从。厂长的一片好心被拒绝，不得不关闭了工厂。

工会领导们所用的专制手段其实并不新奇，过去的暴君也都曾用过。不过时至今日，只有那些对人民的服从深信不疑的人，才敢运用这些手段。如果有别的新兴势力也用同样的方法，会怎么样呢？这其实不是问题，革命工会派才不会顾及民意和法律，他们利用恐吓、破坏和暴乱罢工，几乎是事事如意。倘若某处的罢工运动还不够热烈，委员会就会派几名经验老到的代表前往煽动。暴乱开始之后，这些代表就会去往下一个地方，继续履行他们的宣传使命。这种方法，足以使人民对工会的信仰不断扩张，以致影响选举、影响法律，使法律代表共产党人的意志。在 1907 年的南希大会上，有位党员曾说：“工会主义以抵制、毁坏部分人罢工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你

们想要进行社会革命，无非依靠这些手段和武器。你们想要颠覆国家、闭关锁国，真是愚蠢得令人发笑，这样可能吗？正如前文所述，工会虽然成员甚少，但已足够创造新的思想并宣传和散布。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格德，也反对劳动联合会的所作所为以及那些手握强权者，他曾说："破坏路灯、打伤军人、烧毁工厂，这样的勾当怎么可能改造产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不论是部分人罢工，还是全体工人罢工，这种暴乱式的群体行动，和他们所宣扬的革命之说自相矛盾，不可能成功改造产业，我们应该与之决裂。"

革命工会派回应他说，这些方法，成效十分显著，是最好的革命手段，很多事例都可以作为证明。以职业介绍所事件为例，我们多次暴力示威，迫使库姆斯内阁立即将法案提交到议会，上下两院，不出三日，就迫不及待地表决通过。还有别的方法能这么简单有效吗？

假使前文中的内阁能表现出他们驱逐老年教徒和手无寸铁的女教士时四分之一的毅力，社会的骚乱必不至于像今天这般严重，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实际上，是政府彻底的软弱，成就了劳动联合会如今的权势，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法国，绝不会在英国、美国发生。前文已经讲过，这样的叛乱分子，在美国一定会被抓起来关上几年，绝无宽恕的可能。英国工会中，从没出现过搞破坏的事，因为会员的破坏要由工会承担赔偿责任。只有法国这种懦弱的政府，才会被劳动联合会的阴谋家们所利用。但是他们的胜利，有些过了头了，他们暴虐太甚，也不是没有好处，终究有一天，他们会遭遇内阁的反攻，被严酷的法律制服。

德拉维罢工中，劳动联合会深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所以恣意妄为。罢工者们破坏机器、抢掠路人、攻击汽车，法庭不得不出面追究责任。但是联合会勒令政府不许追究，并以总罢工相威胁。这相当于默认了工人们拥有烧毁工厂、抢劫邮车的权力，只是没有写进法律罢了。当时法庭还是不可避免地以很轻的罪名判决了几个人，可没过几个星期，这些卑劣的、对平民俯首帖耳的议员们，又习惯性地成了软骨头，表决赦免了那几个人。革命者初尝胜利的甜头，政府

的软弱让他们有了威胁的念头，尽管这念头不免荒诞。他们让政府意识到了联合会的实力是多么恐怖，并开始一步步对无还手之力的总统施压。

指望政府去防卫，是不可能的，不过劳动联合会还有个比军警更重要的对手，那就是它下面的无政府党。无政府党在颠覆社会、建设共产主义方面，与共产党政见相同，所以工会虽然厌恶他们，但也没法拒绝他们的加入。无政府党同志们的脑海中，只知道打砸抢烧是手到擒来之事，可是这帮漫无目的的游神们，未尝没有四处破坏社会、暗杀多数君主的念头。想要将这些人聚集在麾下，并且遵守工会的纪律，是不可能的。所以，虽然劳动联合会在共产党大会中取得成功，但是不甩开这些新的同盟，他们一定会付出代价。后面将有章节详细讲解。

如果工人们还像往常那样习惯于服从他人，他们并不会得到多少好处。因为工资的高低由工业的发展情况所决定，如果国家工业萎靡不振，就算工人全部加入工会，也不可能多拿到一分钱。如今，工业已经有了衰退的迹象，如果资本家们因为恐惧而最终选择没有暴乱和罢工、没有打砸破坏、没有法律阻挠的外国去投资，那工人们的工资一定会更少。

这样的事实，是那些自称为工人们谋福利的人所不敢讲的。他们也知道，没收他人财产，改变不了劳动者的命运。真正决定劳动者命运的，是能力，可如今，他们无能却手握强权，没有人再重视能力。工人们为何不向亚当所描述的美国工人学习呢？美国工人白天穿着褂子进厂工作，晚上洗完澡还可以去俱乐部休闲，只要他们培养能力，增加自己的职业价值，就可以过这种舒服日子。美国有每天可以拿 25 法郎的工人，当然也有每天工资 4 法郎的手工工人。敢问文化印象派，为什么要将手工工人称为绅士，又将绅士打压得如手工工人一般呢？我知道，共产党的答复不无良知。我也知道，他们的蔑视，其实是源自卑劣的嫉妒的夸夸而谈。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民族的心理水平，社会的进步在于阶级的融合，而非党派间不绝于口的阶级的抗争。

我们社会曾经大力支持工会的发展，现如今反被工会吞噬。政府虽然

做出让步以求息事宁人，可被劳动联合会傲慢地回绝了。近日，工会甚至拒绝共产党议员出席他们的大会。工会派的政治意图，一直很模糊，目前他们还只知道破坏。他们的理论家试图编织工会社会未来的愿景，这个社会由劳动者所组织的工会构成，工会之间互有联系。这样的国家组织方式与共产党所宣扬的国家形式大相径庭。这两派的政治思想，南辕北辙，毫无调和的可能。

二

很多沉稳老到的人按捺不住激动，这样的宣扬之词在他们口中传颂，说工会主义就像曙光，指引着新的时代。其实这些人自己都不确定，这曙光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工会主义曾在意大利共和国实行了长达数百年，这种国家其实就是各工会的联合会，议会由工会选出，领导国家事务。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节选一位人道社会党员的论述来分析这种政体的成效，他叫勒纳尔，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城市之间、街区之间、家庭之间，纷争连绵不断；仇怨、反叛、放火、杀人，抵制、流放、抄没，动乱四起，永无宁日。这就是意大利各地持续了数百年的混乱状况，无论是美丽的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城市，都是如此。有一段时间，人们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怪兽嘶吼、魔鬼呼号的人间地狱。"

昆廷布沙尔在《外国社会主义》一书中，曾有这样的描写："这种工会制度残酷镇压工人，很多国家宁愿接受最残暴的军人专制，也不愿被这种制度所笼罩。大革命时代，我们坚信帮会制度应该被废除，因为它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太残忍。实际上，意大利共和国工会的暴政要比这些工会残忍一万倍。"

文化的力量，是各个大国前进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文化巨匠们，都主张消除个人或帮会间永无休止的利益冲突，而推崇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工

会主义并非时代的进步，而是社会的倒退。

各国各地，因共同利益而结成团体的现象非常普遍。德国就有不少工会，例如屠夫、教师、法官、衙役等，都有自己的团体，但他们都很安稳。只有法国的工会，才试图颠覆国家，翻身做主人，这是文明倒退的表现。如果将来工会取得胜利，我们这个时代必将陷入动乱，其他社会组织都将毫无抵抗之力。一个民族，一旦反对法制，陷入动乱，最终必难逃暴君的残酷专制，以及外国的武力入侵。希腊和波兰之所以亡国，正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

如今，我们的民族意志已经崩塌，其结果之一，就是以邮政工人叛乱为代表的工会运动的胜利。工会派们还经常在大会上叫嚣反军队主义，反爱国主义，宣扬无政府主义。巴尔干事件的发生，似乎将法国拉到一场恐怖战争的边缘，可这些人还在面目狰狞地罢工，完全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们心中没有祖国，对于他们来说，工会就是一切。

今天，革命工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纷争愈演愈烈，这两者都是暴政，都令人觉得可悲。我认为相比较之下，前者的残暴要轻于后者，毕竟工会主义是多个小团体实行专制，它们之间会有权力的制衡，而共产党所幻想的一党专政，其暴虐还有谁能推翻或者承受吗？由于性格中的坚毅逐渐丧失，以及对自然规律没有认识清楚，我们已经遭受了这两种暴政之一给我们带来的苦难。这两股力量相互对抗，或许可以同时削弱对方，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希望非常渺茫。

第二章 工会主义无政府派的发展

一

过去，预言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特异功能，圣经之中很少有预言家的记载，但凡提及之处，措辞都十分敬重。如今，宗教已经进步了很多，使得稀松平常之人也有了预测将来的能力。一天之中，甚至数次可见预言。我这些话当然不仅仅指向共产党，他们都是预测未来的行家，所有动词，都要用将来式。我想对现如今很多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的人说一句话，假如你们和共产党人会谈，我保证十分钟之内，你们一定会听到预言。他们预测的，要么是法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未来，要么是他人的命运。

我有时也遵循大家的习惯，试着做做预言，但都是对很远以后未来的预测，因为预测得太近，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你的预言是否正确，当然，我也尝试做过短期预测，不过那都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很简单的论断。比如费莱事件，被巴黎某家大型报纸所刊登，全城议论得沸沸扬扬，可我预测它在西班牙绝不会产生影响；再比如，我曾预言无政府主义者一定会加入劳动联合会，这一条如今已成为现实了。

对于后面这点，在我做出预言近一年之后，劳动联合会已辞职的书记尼尔，曾这样表述他的看法：“我们关闭前门以防共产党的危害，却又打开后门让

无政府党的流毒溜了进来，我们宣称要防止政治势力渗入工会主义，结果却成了这样。无政府派的政客渐渐使工会主义有了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以至于如今，我们的宣传时时刻刻都在为无政府主义叫好，根本不需引用嫌疑犯们恐吓政府主义的言辞。工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了无政府主义，只不过还没改换名目罢了。”

打着工会主义旗号的无政府主义，这个概念足以说明拉丁工会主义现在的实情。和平工会主义的开创者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这个概念，工人们将来一定也会的。不过，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不可能成为一门政治学说，它只类似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一群病理学者聚在一起会诊，可病人却高兴不起来。捣毁机器、焚烧工厂、杀害军人，只有半疯的人才会去研究这些东西，做这样的研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英国、美国的工会主义有胆有识，他们改造工界、成绩卓著，可我们的这些无政府主义信徒们，头脑发热、走火入魔，哪有时间去计划改善工人们的处境？

美国劳动联合会会长戈珀斯，曾给法国工会派，提过一些很好的建议。美国工会拥有两百万会员，而法国工会只有三十万，美国工会拥有很多财产，旗下报纸有三百多种，他们显然很瞧不起法国工会毫无意义的动乱，他们说，法国工会派的思维实在太幼稚。戈珀斯在演讲中曾说：“以前，人们的思维还不成熟，我们周围有共产派、无政府派和劳动派，相比之下，我们的势力那时候还很弱小。工会主义的宗旨应该是建设，而不是破坏。罢工破坏国民工业，这本是中世纪才有的暴行与动乱，法国工人界的所作所为，和这有什么不同吗？”

美国联合会会长的这席话，应该足以震撼法国工会派。但是，这些人心胸狭隘、心智浅薄，根本理解不了这番真理。工人们只知道观察，他们最近才明白，原来厂长的能力，决定着工厂的生产情况以及他们工资的高低。拉丁工会派从不承认这样的观点，倘若问他们有什么梦想，他们一定会回答“没有厂长”，他们所有人都会这么说。这其实也是常来工厂考察的思想家们的

梦想。其实只要稍作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工厂领导人的能力，决定着工厂的价值，有什么样的主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工厂。

复杂的近代科技为今天的工业带来很大的困难。困难不在于军队对工业品的征集，而在于给工厂寻找一位胜任的领导者，有了领导者巧妙的管理，工厂才能发展得繁荣。若是毫无管理经验的新手领导工厂，则注定迅速失败。没有厂长的工厂，就像没有船长的航船。现在动乱，必然导致未来的衰败，这是真理，可已经成为工会领导人的无政府党却对此置若罔闻。他们只想颠覆社会，再建设共产主义。这些人，其实不仅仅是工会主义的敌人，也是共产主义及其他所有社会组织的敌人。他们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国家太软弱。国家法律保障着他们的生存，可他们仍在与国家作对。

前面一章中，我逐条分析了法律的危害。现在举个例子来说明：某部长于 1884 年创立了职业工会法。这位部长是个演说家，却对心理学了解甚寡。当时订立这个法律，很多人都警告他。上议院一位议员说："我担心这个法令会使将来的国会权力，落在受大工会指挥的工人手中。"结果后来，这位议员被这个部长嘲弄了一番。还有一位上议院议员告诫说："我们将来一定会受其所制，要么让工会消失，要么被它绝对控制，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我们都知道，工人很容易被煽动和操纵，我们决不能毫无节制地把权力交给工会，任其专制。"更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法令必将使反军队主义和反爱国主义更加兴风作浪，这个法令一旦表决通过，情况将会雪上加霜，工人联合会将针对国家军队和社会资本展开斗争，抵抗军队、煽动纵火、抢掠工厂这样的事将连绵不绝。这些狂热分子，都生活在自己的臆想中。

社会学校开学时，饶勒斯曾对二次革命期间法国工会党员的著作做过一些分析研究，他发现，这些人用革命爆发破坏的，也正是他们以后想要建设的。饶勒斯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人们一定会惊讶于这些人所鼓吹的革命是多么容易。推翻政府易如驱散幽灵，颠覆国会不费吹灰之力，军队将会步步退让，

站在平民这边。而在工会想要建设的理想社会中，调和、折中、妥协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即使是议员们今天所用的最平和的手段，也难免会引起破坏。他们用联合代表大会代替今天的国会。他们不仅要解决工会问题，还要解决土地问题、货币问题和其他一切问题，几乎囊括社会所有因素。他们的治国理念，其实就是民主主义原则。这些人还常常指责我们是妥协派，说我们一旦接触实际情况，就会窘迫不堪等等。”

二

建设社会那是将来的事，劳动联合会今天造成的破坏就已经相当明显。他们的动乱导致很多工业衰败，这些人却从不反省。穷困潦倒的工人们，生活也将随工业的衰败而更加窘迫。航海工人的罢工以及涨薪要求，已经严重破坏了我们的航海商业。我们列举几大航海公司10年间的红利分配情况作为证明。

几大航海公司10年间的红利分配情况

公司	红利分配（法郎）	
	1900年	1908年
联运公司	50	0
哈弗公司	50	20
海邮公司	25.5	0
大西洋总公司	16	12

数据来源：当地大学生的调查。

梅林在上议院演说时讲，这样的衰退完全由不当立法和工人目前的叛乱心理造成。1910年3月11日，《公报》刊登了他的讲话：“在我看来，工业界已经丧失了经营的动力和自主精神。接连不断的针对资本的罢工和威胁，

无法无天的对劳动自由的侵犯，以及对产业所有者和财富持有者的赋税压迫，是造成这一衰败现状的原因。是革命派，将我们推入这样的深渊，他们目光短浅、态度草率，他们的行为，简直是杀鸡取卵。如果富人变成了穷人，那穷人只会更加贫穷，他们这么做，不是追求财富，而是在推广穷困。”

一些统计数据显示，我们的商业盈利仍然具有优势，政客们也常常引用这些结果，其实，这些数据只是表面花哨，事实上谬误百出。前文提及的演说家们，很容易就能戳穿这种粉饰的虚假繁荣。近二十年来，很多国家贸易规模增长迅速，比如德国、美国、比利时等。我国商业已经降到第十位，还哪里有所谓的优势。别国发展如此迅速，唯我国裹足不前，有朝一日，恐怕会出现商品积压销售不出的局面。这样的经济困境，难免会引发国家争端。

别国如此强盛，我国如此衰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别国有许多在世界各地求学、准备报效祖国的有志青年，而我们的大学所培养的，是被开除学籍的人。梅林认为，即使将来官僚主义的风气被消除，这样的青年依然会存在。但是在我看来，官僚主义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应该从最严重、最根本的因素着手来解决我们的衰退问题，比如大学的教育。

三

任何政党，都有它的建党宗旨。即使是宣扬破坏机器、侮辱国旗，这么卑劣的宗旨，仍能吸引很多愚昧无知的人。我们过去的教育，培养出的就是这种人才。教育完全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所以，有那么多巧舌如簧的人聚集在无政府派工会主义的下面，难道很奇怪吗？

无政府派人士因为害怕遭到法律制裁，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倡破坏工厂、切断电线这样的行为。于是，无政府派的教授们试图创造一种理论，用

以掩饰和美化工会主义的行为，不过，要创造这样一种理论，并非易事，他们的试图最终收效甚微。贝尔松是最温和敏锐的哲学家之一，他在法国课堂所讲的理论，被革命工会派奉为经典，这让很多人大为惊奇。所以，布克列教授才告诉我们："新派人信奉贝尔松。"其实，在现代派、新天主教派以及其他很多派别中，牵强附会的人总是很多。总而言之，这些人尊重的，是不正确的导师，寻求的，是反智主义的知识。他们主张用直觉代替逻辑，他们认为，只有直觉才能给人一种只可意会的莫名快乐，只有凭直觉才能真正领悟生活、理解生活，只有直觉，才能让人把握一切、相信一切，他们让人们相信，所有人的感觉，就是真实生活的感觉。

那样的理论读者能理解吗？我保证他们不能，我也不能，至于工会派，我敢说他们更理解不了。一种理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不可理解，群众推崇它，也正是因为理解不了它。当年，禳谢尼对于时代的论述，几乎让整个欧洲陷入迷茫，竟然没有一位神学家能解释清楚那些教义。

实际上，工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知道，一个政治理念，只有以某种哲学为依据，才会有说服力和影响力。黑格尔、孔德以及其他哲学家的学说，都已经为各党派所用，为了与众不同、体现新意，应该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所以，无政府主义为了给他们焚烧工厂的暴行找一个哲学理论的幌子，宣扬他们是受人类天性中本能的指引。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到实用主义哲学倾向的危险。他们忘了，人类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才从本能进化为理性的。文明人用理性战胜了本能，人类才逐渐摆脱本能的束缚，踏上文明的阶梯。而革命及其野蛮行径，正是本能对理性的复辟。历代的野蛮人和强盗，都是打着本能哲学的幌子。

革命工会主义的理论和政府的懦弱纵容，已经引发了恐怖和混乱，不过它的最终结果也许会很有限。民族精神，是最为牢固的东西，即便耗费

最长的时间、发动最暴烈的革命，也很难改变多少。革命耗资巨大，收效却十分微小，不过有时候，革命也会留下一些东西。欧洲战争，持续近20年，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时代，300万条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只得到了法国人权利和法律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其实不经历革命也可以得到。只要我们愿意等待，等到以铁路和电车为代表的工业力量，压倒封建断头台的力量，我们同样可以获得平等。可是，上帝没有赐予拉丁人等待的能力。

第五篇

关于殖民政治心理的错误

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根据我们的性格特点和需求，一步步改变，才发展成为今天的样子的，它不适合于别的种族。如果用我们的教育方式，去教育阿拉伯人、印度人或者别的东方人，那么最明显的结果，将是这些人会猝然失去其心理归宿和精神支柱，比如习俗、信仰及其他传统观念。

第一章 我们的殖民原则

一

20世纪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是东方与西方经济的对抗，这种对抗将来可能造成的财富损失和人民伤亡，也许会比过去所有的战争还多。处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大国领导人的责任将会更加举足轻重。如今，我们保持的各殖民地，关系都比较稳定。所以，我们要更加重视殖民地的治理。欧洲各国治理殖民地的原则因种族而不同，不过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我们法国独有的；第二种，是其他各个国家所采用的。这些国家建立殖民地，是为了拓展及维护其利益。而我们建立殖民地，是为了用我们的制度和理念统治殖民地，法国的所有殖民地几乎全都如此，无论被殖民者选择臣服还是选择拒绝。我们一直对自己的治理充满自信，执迷不悟，等到灾乱接连不断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治理殖民地的原则，不管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都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我曾在《印度文化》一书中，对英国侵略及治理殖民地的主要原则做过一些阐述。我尤其详细地分析了印度，比如英国人是如何征服印度并使其人民和财产归于大英帝国的，英国人是如何谨慎治理印度的，以及英国人如何犯了一个违背心理学原则的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使印度将

来摆脱殖民而独立。这些内容，本书自然不会详述。这一章，我主要分析法国治理邻近殖民地时所采取的理念，以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后所造成的效果，以阿尔及利亚为例。

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殖民地研究的热门，其中有两位学者很有影响力，他们的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学界观点。第一位是法国学校的教授，勒鲁瓦潘龙博士。本章我主要讲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指挥阶层一直以来的治理理念及其价值，对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成效则不做仔细研究。我的讨论只针对理念，不针对实施理念的人。如今的政治家，受理论的影响很小了，他们更注重政治利益的需要。作为一个推崇理论的人，我想讲一讲舆情，我也不强迫人们欣然接受舆情。如今，没人可以不顾舆情而进行治理。舆情可以被改变吗？不可能。法兰西民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最具革命精神，其实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一群人。阿尔及利亚领土面积和法国相当，人口只有五百万名伊斯兰教徒。为了让这五百万人真心服从治理，我们动用了六万军队。英国人统治两百五十万名印度人，也用了相同数量的军队，印度有五十万名穆斯林，其治理难度，不亚于阿尔及利亚。（印度的穆斯林，大多数是纯种阿拉伯人，他们遍布尼扎姆国各地。海德拉巴的住民蒙昧得令人发指，英国政府不得不颁布政令，禁止欧洲人未经允许并在没有防护者的情况下穿越市区街道。英国人在印度实行着类似的政策，防止印度原住民接近欧洲人。印度每个城市都被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土城，一个是欧城，它们相距数公里。我们常说的专区，就是欧城。）

除了五百万穆斯林，阿尔及利亚还生活着八十万欧洲人，其中只有一半是法国人，其他大多数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马耳他人。这些欧洲人不与伊斯兰教徒通婚，他们只在欧洲人内部联姻。这种联姻关系，未来必将催生出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的性格将与其他各种族都不同，与祖国相比，他们看重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如今在他们眼中，祖国就是专门修缮铁路，维

护公共设施和发各种救助金的，像个提供福利保障的监护人。

至于那些穆斯林民众，他们大多是非洲侵略者的后裔。柏柏尔人占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是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几乎没什么区别，想要在穆斯林之中区分他们，可以把他们分别看作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其实现在，只用游牧和农耕已无法区别这两种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相互融合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勒鲁瓦潘龙的著作，“穆斯林的法国化”，这同时也是法国治理阿尔及利亚的基本理念。

法国化的这种统治理念，其实非常残酷野蛮，它跟过去美洲移民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一样，就是掠夺他们赖以游牧的土地，让他们生无所依，生死由命。

其余的不必多说，我们只看看维利是如何讲述法国政府所采用的驱逐方式的。

阿尔及利亚总督处置那些反叛部族的方法，就是没收他们一部分土地。政府接到他们的命令，便会遵照执行。他们将原住民强行驱逐出家园，然后选择优良的土地给欧洲移民生活所用。30 年来，去往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越来越多，被剥夺土地的原住民也越来越多。那些部落原住民被强迫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远走他乡。30 年来，法国统治者在阿尔及利亚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其后果不难想象。那些阿拉伯人被一次又一次地驱逐，他们不愿意尽心尽力耕种粮食，或者开垦荒地，因为他们耕种的部族土地一定会被别人掠夺，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将化为乌有。而且，他们被逐渐驱离接近水源的地方，一旦干旱，他们将无能为力，收获的粮食不够填饱肚子，牲畜也越来越少。总之，到处都是惨遭掠夺、饱经磨难的土著人，他们对欧洲移民的怨恨与日俱增。虽然 1863 年元老院的决议书宣告，有产业的部族可以保有自己的产业，可这没能阻止驱散行为的进一步加剧，他们还特意改换了名目，不叫驱散，叫征用。这个方法包含两个部分：第一，抢掠土著人的土地，

分给欧洲移民，建设欧洲人的居住区，禁止土著人踏入；第二，失去土地的土著人将一贫如洗，不过法庭将判决给他们赔偿金，每公顷五十至六十法郎不等。土著人之前靠耕种三十至四十公顷的土地，足以养活一家人，一年到终还会有结余，如今土地变成了一千五百至两千法郎，这些钱用不了一两年就会花完。这就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诡异政策，在国家专权统治之下，殖民地就这样毁在了政府手里。前面所讲的，就是法国殖民地可悲的历史，它的结局也可想而知。国家将土地分给没有国籍的人，这些人不会耕种土地，更不会讲梵文，政府建设的村落，如今已变成荒野。这些行动耗资巨大，行政官员却仍然执迷不悟。几年前，某位总督还在提出请求，要花五千万法郎征用阿拉伯人的土地，用来建立政府村落。幸亏这个议案没有被议会两院通过，否则一定会激起新的穆斯林叛乱，祖国的数千万资金将付诸东流。议会虽然否决了这个提案，可他们也曾将其提出来讨论，差点儿就表决通过，由此足见法国舆情对我们尚未发展完善的殖民事业的影响。阿尔及利亚的治理经历了那么多波折，所以也就不奇怪花费的代价为什么那么大了。计算阿尔及利亚的经营情况，收入除外，我们亏损了四千万法郎。用这么大的代价，换得阿尔及利亚的和平与稳定，也算能聊以自慰了。不过我们别忘了，常驻军队，也是维持殖民地相对安定所必需的。

二

侵略并殖民阿尔及利亚之后，当地的舆情，导引着两个基本原则，在治理方法中相互运用。这些舆情主要包括：一、没收阿拉伯人的土地和产业；二、将阿拉伯人驱逐到沙漠里去；三、用制度强迫他们法国化。阿拉伯人不可能心甘情愿、任遭驱逐，因为在沙漠里，他们不可能找到食物和饮水。这

几百万人为了不被饿死，纷纷起来反抗。既然驱逐的方法行不通，那么有没有可能将他们法国化呢？答案是没有。因为一个民族，不可能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其世代相传的精神特质。被交替运用的这两个方法原则，其实都很低劣，连抱着侥幸心理去改良它们都不可能。这些方法如此为害深重，可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采用。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的行政人员将会意识到它们的危害之大，他们也终将幡然醒悟，应该像英国人、荷兰人治理他们的殖民地那样，利用当地的习惯、风俗、信仰和生活方式来治理被殖民者。这才是最简洁、最经济、最稳妥的治理方法，只是我们现在还很难实行这种方法，因为舆情反对。书刊报纸中所宣扬的观念足以证明这一点。西方世界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宗教社会，于是，我们自以为全世界都是如此。很少有欧洲人知道，在东方，宗教问题高于其他一切问题。东方人，有些是穆罕默德的信徒，有些是湿婆（婆罗门教三神之一。三神为：梵天王，创造之神；湿婆，破坏之神；毗湿奴，守护之神）的信徒，还有些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他们处理政治事件、民主制度、公共事务以及私人生活，都是依宗教规则而行事。饮食、起居、春种、秋收，这些日常生活，东方人都视为宗教行为。英国人很明白东方人的这些性格特点，所以，虽然他们是纯粹的新教教徒，但他们仍斥资建造浮屠供奉湿婆和毗湿奴，对他们本国的传教士，也并不偏袒。英国任何一块殖民地中，都不可能找得到那种宁可玉石俱焚，也要争取信仰自由的雄辩之士，因为他们的信仰本来就是自由的。

我们的政策理念，应该是依靠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教会来保护伊斯兰教，与其打压伊斯兰教的势力，不如扶持他们。法国派往突尼斯的第一位总督，是个对东方饮食了解甚少的人。他曾指示突尼斯的领导层颁布宗教法令，以安抚当地教徒。他的治理观念十分卓越，他明白，阿拉伯人的政治制度源于其宗教信仰，最终他们的宗教习惯，就是尊重他们的制度。十分可惜，这位总督在任时间不长。这个观念遭到了勒华博柳的反对，他认为这是放任政策，

他还宣称，尊重那些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和规矩风俗，简直等于让我们的军队和移民抛弃祖国，去变成非洲人。至于为什么尊重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军队和移民就一定会抛弃祖国变成非洲人呢？这个人忘了告诉我们原因，我保证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前文中提出的殖民地治理策略，正是英国人对待印度伊斯兰教徒时所用的，难道英国人是在抛弃他们的庞大帝国吗？

勒华博柳的观点，正好与法国人普遍持有的平等观念相符。这个观念主张将殖民地土著居民同化为欧洲人。这种同化，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让来源于两个不同种族的人，在相近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生活，遵守相同的法律，遵循同一种生产规则。这样的想法，确实让人觉得前景一片美好，这也是自1793年至今，理论家们梦想中的平等，但实际上，这完全是妄想，印度政府的小官员们会不屑一顾。成为卓越的博学家容易，要理解东西方之间人民的思想及心理差异，却很难。勒华博柳知道，他的所谓同化政策会遇到一点问题，不过他自信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他认为柏柏尔人与欧洲人之间，只有宗教上的差异。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一结论从何而来，但毋庸置疑，这绝对是错的。事实上，文明的欧洲人与今天的柏柏尔人之间的差异，基本上相当于布伦努斯时代的高卢人与今天的巴黎人之间的不同。

按照勒华博柳的观点，既然柏柏尔人与欧洲人有很多相似点，那么就只有阿拉伯人应该被法国化。他所描述的方法似乎也很简单易行，他说："对他们的改造应该从根本因素着手，比如部落制度、公有制度、一夫多妻制度，只要这三个制度改造完成，其他的小细节就顺理成章了。"这种所谓的细微改造，足以让共产党欣喜不已，他却认为十分容易，以至于连改造的方法步骤，都懒得讲出来。但我相信，只要是跟阿拉伯人稍稍有所接触并了解他们心理特点的人，一定会觉得这样的改造就如同要把澳洲的原住民改造成法国学校的教授，或者让哺乳动物学会飞翔一样，很难实现。

勒华博柳称阿拉伯人为野蛮人，说阿拉伯人的组织，是"所有游牧民族

的组织”。他认为所有阿拉伯人都以游牧为生，所有柏柏尔人都是定居生活，其实，这两种人的生活方式早已融会贯通。图阿雷格人是最典型的柏柏尔人，可他们就是游牧民。依据14世纪伊本赫勒敦对阿尔热力的论述，我们不难知道，游牧与定居的区分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过去大多数作家认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在文明程度上有所不同，可他们这个结论只是表面观察得出，不能作为证据。之前我已经多次提及，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在生活方式是游牧还是定居这个问题上，并无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由生存地域所决定的，并不能根据种族来划分。在沙漠与平原之中，不论阿拉伯人还是柏柏尔人，都是游牧民，而在土地肥沃的地方，他们则都是定居民。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本土，都同时存在着游牧的阿拉伯人和定居的阿拉伯人。

在智力水平方面，定居的阿拉伯人与定居的柏柏尔人，几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比个高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阿拉伯人的智力更优秀一些。因为阿拉伯人曾经创造出很灿烂的文明，而那个时候的柏柏尔人还十分蒙昧幼稚。勒华博柳最重视的改造之一，是取消一夫多妻制，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这一改造。他只是详细论述了一夫一妻制的优势，他告诉人们：“家庭应该由一个妻子来掌管，没有了妻子，家庭就会缺乏精神，丧失发展的动力。阿拉伯人实行一夫多妻制，这是阻碍他们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不想去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也不想污蔑每个东方人都是多妻主义者。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制度之所以存在，是有着很多因素的。与欧洲人同时和多位女子保持地下关系，私生子一大堆的情形相比，我倒觉得东方人法定的一夫多妻制要更优越一些。想要了解这类问题及其他耕种问题，可以参考我的书《阿拉伯文化史》，书中可以看到，穆斯林妃妾生下的女孩子们受教育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我们社会中的女孩子低。

今天我们已经证实，一夫多妻制并没有阻碍穆斯林社会的发展。我们应

该还记得，正是阿拉伯人，将希腊拉丁文化传播给我们。六百年间，欧洲各个大学，包括巴黎大学，都在专门翻译阿拉伯典籍，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来从事研究。阿拉伯文化，是全人类文明史中璀璨的一页，虽然他们的文化已经没落，可不能因此就认定，是一夫多妻制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一些有声望的教授提出："只有富人家庭，才有多妻制。"这说明多妻制并不十分普遍。既然出现的比例很少，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多妻制呢？说它是阻碍阿拉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不知道他的依据在哪里。

勒华博柳认为，可以通过我们的拉丁式教育，来改造阿拉伯人。很多人支持这个观点，我曾经也赞同过。可是在游历了很多地方，观察了很多事实之后，我醒悟过来，发现这个方法靠不住。有的读者可能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用欧洲式的教育改造土著人，只会使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变得贫乏可怜。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做详述。

对低等民族，或者不同于欧洲人的民族，实施欧洲式的教育，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根据我们的性格特点和需求，一步步改变，才发展成为今天的样子的，它不适合于别的种族。如果用我们的教育方式，去教育阿拉伯人、印度人或者别的东方人，那么最明显的结果，将是这些人会猝然失去其心理归宿和精神支柱，比如习俗、信仰及其他传统观念。假如有一天，以勒华博柳为代表的那些人的主张成为现实，即用欧洲式的教育改造阿拉伯人，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将会混乱不堪，就像过去奥地利统治威尼斯，如今英国统治爱尔兰、德国统治阿尔萨斯一样。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不时在其著作中表达对杜普莱没能成功侵占印度的惋惜，惋惜未尝不可，但也不必过于痛惜。如果我们还像治理国内及其他殖民地一样，采用勒华博柳的方法统治印度，印度人早就同我们不共戴天，揭竿四起了。

我们在越南就已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的殖民地最终衰败得让人无法

忍受。我们任命政客为殖民地总管，他们带着一帮官吏，就像治理法国一个县那样统治东方人。他们对原住民的风俗习惯没有一点儿了解，结果问题重重，处处碰壁。根据哈曼的说法，这块殖民地应该每年可以给法国带来两百万法郎的收益，可如今，国家却在花费巨额资金以及军队来维持那里。最终结果是，国内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政府也失了威望。通过这个事例，可以看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还不懂得去了解和尊重其他种族的需求、心理和信仰，所以我们也无法成功统治他们。

三

利用欧洲的制度、观念和需求，来治理殖民地的原住民，危害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我也从未见成功的先例。用欧洲式的教育改造原住民，只是暂时虚有其表，其实收效甚微。英国在印度设立了许多学校，同那些学校中的印度学生交流，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和欧洲大学的学士受教育程度相当，可他们的思想观念依然与欧洲截然不同。蛮族侵占罗马帝国的基业之后，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创造出适合他们的文化、语言和艺术。深远的变革，是需要时间才能实现的。

历史已经证明，两种相差悬殊的文明，是不可能相互融合的。一个民族的心理、传统、习俗、宗教，确实会受侵略者的影响，但前提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本就相差不远。有些方法，东方人对东方人可以实行，但西方人不可照搬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人在东方可以拥有那么大的势力，到现在，阿拉伯人在非洲、中国和印度，都还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在各个种族都受欢迎，他们的文化影响着各个民族的文化，比如信仰、预言、艺术。迁入一个新的国家，

他们的文明总能扎根其中。印度古老的宗教受到他们的冲击，连波斯、希腊、罗马都未曾撼动过的埃及法老文化，也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印度和中国分别有五千万名和三千万名穆斯林，这个数目仍在有增无减，整个非洲大陆也遭到伊斯兰文化的入侵，而欧洲的传教者们只去了一个地方，就惨遭失败。欧洲的探险家们历尽艰辛到达非洲中部，却发现只要是阿拉伯商队曾经经过的地方，阿拉伯的信仰和语言就流传开来。

欧洲人可以成功侵略别族的土地，可能够用文化影响其他民族的，只有阿拉伯人。他们成功地传播着他们的信仰、习俗和艺术。

欧洲人很容易就可以征服一个低等民族，比如英国人占领印度，可妄想改造低等民族的思想，则纯属妄想。他们的精神需求与我们还相差甚远，我们不能让他们跨越式地发展。我们的文明只适用于我们自己，不能用来教育这些民族。人们总有生活的需要，人们为了满足需要总要劳动，这使得人民永远生活在动荡不安中，革命事件常有发生。那种可以劳动但自由受限的工厂、矿厂工人的生活，依然诱惑不了东方人。我在游历时，常会碰到曾去过欧洲的东方人，他们完全不羡慕我们的文明。欧洲人自以为幸福、正派、道德，他们认为东方人在接触欧洲人之前，从未见过这些。其实我们的文明，只会让东方人道德败坏，生活窘迫，仅此而已。

前文不过是稍作讲述，这种真理，不是一章一节所能阐述清楚的。勒华博柳最好能深入思考一下，用欧洲式的教育，去同化那些半野蛮的民族，确实可以推广法国人的理念。博学者实行不了的观念，不如让共产党去主张。一个民族的制度，自有其内在因素。我们不能任意改造这些因素，只能顺从它们，接受它们，寻求适合它们发展的途径。文化的应用，不求理论上的优越，只要适合就可以。20年来，我一直在阐述这个道理，如今渐渐有了一些接受者。阿尔芒大使非常熟悉东方的情况，他在《管理以及殖民》一书中，曾表达这样的观点。

种族及其社会，会因自然变化和环境发展而聚集，他们有的文明程度很高，有的则环境相当恶劣。相距越远的民族，越不能用同一种法律、同一种教育去治理。侵略者及其臣民必须承认这个道理，否则只会可怜地犯错。我对自己的观点很有自信，因为它是我通过事实观察得来的。欧洲人想要成功开拓遥远的殖民地，征服各个种族，就必须明白这个道理。绝对不能用同化的方式实行治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物质需求和性格特点，也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侵略者及其臣民只有尊重这些，才有利于发展自己。

大多数法国政客，还远远没有这些观念。我们的行政官员，常在野蛮的殖民地张贴布告，宣扬人权，想让原住民知道我们的制度是多么优越。从这种幼稚的想法中，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治理水平。

四

在治理殖民地的过程中，除了运用同化法外，还有专断现象的出现，这种专断像极了激进民党的做派，当然，出现这种情形，也是形势使然。有些殖民地的总督，管理的地方很小，却常自以为是独霸一方的君主，他们的所作所为，跟奥地利和亚洲的专制暴君没什么区别。1910年3月29日的《晨报》，曾刊登过一位在圭亚那的游客的信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信件中有一段这样讲："祖国派到殖民地来的这些高等官员，他们要么是把殖民地治理当作经营一个企业，要么接受任命只为将来谋取一个议员职位。如果在属地任职的时间稍长些，他们便会染上专制独裁的毛病，经常像俄国皇帝下达圣旨那样颁布政令，逮捕、关押、驱逐，到处制造恐怖，引发动乱事件。如果他们过于恣意妄为，中央政府就会将其召回，转而任命到更好的地方。移民的生活则苦不堪言，毫无安宁。他们在政治上被压制，商业

上被限制，连关税都有不同的解释。官员们的厚此薄彼，让他们的经营没有安全保证。假如你想购买土地种植椰树，政策本来承诺补助 80 先令，可等到你投入资本后，能到手的补助金，只有 30 先令。你如果因为资金不足而去和官员争执，他们会这样训斥你：‘又不是政府强迫你来的，你来这儿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殖民地的状况。看看别国的殖民地，都是收获颇丰，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发展都很兴盛，只有法国的殖民地越来越蛮荒。

前一章中，我曾经节录科特迪瓦现任总督的公告，以证明我们殖民方式的低劣和治理人员的狂妄，英国《非洲邮报》曾经报道过科特迪瓦因此而受到的破坏：“两年来，科特迪瓦战乱不断，自近代以来，西非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况。这都是政府造成的，就让政府去解决吧。”

我们从科特迪瓦的混乱现状中，可以得出很多条教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再横征暴敛。对于之前从未被欧洲人占领过的森林部落而言，这种横征暴敛，就是最残酷的野蛮。这个政策，只有依靠杀人放火、强取豪夺这种野蛮的方法才能实行。当土著酋长的头颅被所谓文明的政府插在矛上示众，当原住民的收成被抢去作为税收，我们怎么还能怪怨原住民为脱离苦海而发动叛乱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德国人的殖民地收效也不怎么好，但这种聊以自慰的话毫无意义。德国人也经常采用残暴的手段，但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也有很多有能力的人。所以，他们成功获得了刚果殖民地丰富的资源。他们并没有自欺欺人，说自己是人类的功臣，他们只说自己在为祖国做贡献。其实，这正是我们殖民的唯一目的。

第二章 欧洲教育的心理结果

一

前文已经探讨了法国的殖民观念。下面要专门谈谈欧洲文明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教育，对领属地的原土著居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个问题在法国常常引起热烈的讨论。所有人都知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舆论和政府选择的手段都是行不通的。他们集中精力去同化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越南的黄种人和马提尼克的黑人，强行地把我们的风俗和法律施加给这些领属地。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不仅关系到法国，而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被侵占的那些领属地的居民们，迟早有一天会提出抗议的。

国内很少有人赞成我提出的主张和原则。但是，要知道我之所以对这些主张如此执着，是因为它们是在我很多次游历之后获得的经验，所以我才会坚定地相信。实践了这种原则的英国和荷兰，如今已经相当强盛了。而我们国家采取的思想倾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才发展得不如它们。这一点通过统计数据显示的领属地代表的抱怨，和日益增重的预算负担，就能清楚知道。

二

在文化的各个基本要素中，只有教育被人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想要知道欧式的教育在原土著居民身上收到的成效，竟然找不到可以参照的依据。我在前文所提到的阿尔及利亚已经对此有经验了。人们要么回答说，欧式教育施行的范围是很小的，要么说，应该以他人在领属地所看到的情形为例去谈论。那么我们先来谈论一下英国人在印度领属地所实践应用的欧式教育的经验。接受了这种教育经验试验的人口数量达 250 万人，试验的时间延续了 70 多年之久。这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这种试验是由麦考利朗爵发起的，那是在 1835 年，当时他是加尔各答的总督参事会的会员。他认为印度的所有书籍和学问，都不如《圣经》和英国人的著作。在他的倡议下，本汀克总督政府便决定让印度的英国学校只讲授英国文学和欧洲的科学，这项试验从未间断地进行着。如今已经在印度创建了四所大学、13 万所中小学校，培养的学生达 300 万人。每年教育所需要的经费都超出 50 万法郎，其中有三分之一用于小学教育，其余的则用于满足中等教育和高校教育所需。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功绩，如果直接来讲就是英国人可以拥有成千上万的工资低廉的下属官员，把他们安置在邮政局和铁路局。同样的职位，雇用他们与雇用来自欧洲的英国人相比，得到的价值会增长 20 倍。这项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也仅仅是从这一个方面来看，其他的要研究的问题还多着呢。比方说，那些由英国的教育所培养出的人，对给予了他们教育的英国，是报以友好还是敌对的态度呢？再比如说，欧式的教育真的能够增长他们的智力和学识，并提高他们的道德感吗？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无须怀疑，因为教育并非世界上万能的良方。在欧洲取得的成效，按理说在印度应该也是可以取得的。印度有

着最为古老的、最为发达的民族文化。然而，事实的经验呈现给我们的结果，与理论上的推测，是截然相反的，这让教师们也很是惊异。欧式的教育事实上已经让印度人陷入了一种精神错乱之中，丧失了思想。后面我还会讲述除此以外的道德沦丧等其他方面。

这后果是今天这些提倡实行欧式教育的人，也无法否认的。他们的态度反映在威廉姆斯莫尼尔的书中，他曾经当过牛津大学的梵文教授，跟我一样也是在印度周游行走的人。他在书中说："我们的教育事业对印度产生的这些能见的不良影响，和它的整体成果的不佳，是我不得不明确承认的。我已经目睹了这种教育所造成的多种坏影响，它培养了许多不好的人。换而言之就是，它培养出来的人，心智没有成熟，精神也是不和谐的。这类人虽然可以从书中得到大部分的知识，但是思想很不稳定，他们大多数都成了巧舌如簧的人，仿佛只是对语言很狂热，而并不能持之以恒地努力。即使他们有行动的力量，行为也往往违背常理，与他们的言辞和文字是不符的。他们虽然舍弃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信仰，但是肯定还是会留存着传统的规则，保持着固有的习惯，因此他们不会成为我们科学事业的继承人，或者有正直精神的怀疑者，或者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尽心尽力培养出来的所谓的有学识的原土著居民，并不知道对我们的付出心怀感恩，反而借助他们受到的不完美的教育，来反对教育他们的恩人。"

正如他所说到的，那些有学识的原土著居民确实有话多的毛病。只要一看到欧洲人，他们就严肃地问对方最喜欢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还是彭松狄太莱？英国国王是不是向伦敦借走过老虎？还有，英国国王有多少妻妾？从中就能看出，他们与我们明显有观念的隔阂。毗湿奴、朱庇特神、英国王子、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古代的民国、近代的君国，这些全都出现在他们的大脑中。他们也很容易产生猜想，认为英国国王和国务总理就是英国的太子，同时也是犹太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婆罗贺摩、保护之神毗湿奴和毁灭之神湿婆的三

神一体。他们尽管沉浸在英国的教育当中，但是依然用本民族遗存的学说来解释新事物的意义。

三

欧洲人在外实行的教育，最后培养了一个与之友好的民族，还是与之敌对的民族呢？上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的答案。能够用来证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印度接受了英国学校的教育的人，无一例外地反对着培养了他的国家——英国。而由印度学校教育出来的人，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英国实施的治理比蒙古所实施的要松一些，使他们还能享受着和平生活。

我们只要读一读印度人印发的大多数报刊，就可以了解到接受了欧洲教育的印度人的想法。他们对英国政府施加的言论，比我国的无政府主义党派施加给法国政府的都要苛刻。原本以温和为人所知的印度人，在接受了英国教育之后就变得穷凶极恶了。英国之所以还没有失去声誉，那是因为大多数的印度人文化水平很低，他们对这些攻击性的言论不会有什么反应。

英国学校所培养的印度人，反对英国时的口号都是“印度是属于印度人的”。这个口号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印度有那么多的民族，语言至少就有200种，是不存在共有的利益的。印度人没有政治和社会本位的意识，除村庄和世袭的贵族阶级之外。而文人的人数又太少了，还不足以形成让我们畏惧的力量。但是鉴于他们的数量正在一天多于一天，将来也迟早必然能够威胁英国在印度的权威。

四

关于欧式教育是否可以增长印度人的智慧，是否可以让培养出的人成为我们的友人这个问题，前文已经做出回答了。接下来要说的问题是，欧式教育能否提升印度人的道德感。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但没能提升，反而使之降低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原本温和的正直的人，在这种教育的影响下，变得狡诈、变得贪得无厌、变得丧失廉耻心，他们傲慢蛮横地对待自己的民族同胞们，对自己的主人则屈膝逢迎。

想要证实这一点，可以再借用一下前文已经举过例子的英国教授的话："欧洲人虽然具有很多美德，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恶习同样也很多。而我们的优点并没被印度人学会，缺点倒是全部被学去了。经验丰富的军官常跟我说，新的土地刚被占领的时候，居民们根本不会欺诈、造假、吝啬、好色，也没有其他缺点。而在被占领之后，这些缺点都开始在法庭上和正式场合中表现出来了。那些接受过英国教育的下级官员们的道德感的匮乏，特别的明显。英国人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开始进行严格的戒备，以防铁路和邮政工作人员也受到侵蚀。"

接受了欧式教育的人为什么一定缺失道德感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内容，并不符合印度人的心理结构，这样一来就破坏了他们的行为所依据的传统力量，和原有的信仰。使得他们既丧失了祖先的道德观念，有无法吸纳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在从前，印度人的需求是很简单的，而接受了新的教育之后，他们产生的需求可是贪得无厌了。一方面，他们蔑视自己的民族同胞，另一方面又遭受主人的蔑视，在社会上得不到立足之地，由此陷入了困顿和迷茫之中，转而就开始敌视他们的教育者。这也不仅是教育和民族心理结构的不符，更是教育本身所结出的恶果。

经过上文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印度教育培养下产生的印度文人都成为了

有文化、有正直心的令人敬佩的人。其中有很多能出席欧洲的学者会议，他们可钦可敬的态度，与英国学校培养出的人的傲慢卑贱，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不只有印度人才憎恨他们的教育者。在越南，我们也因为同样的错误而造成了同样的后果，读一读 1908 年 12 月 27 日的《日报》就可以知道，报上发表了越南总督克罗茨古基斯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讲述了越南人对英国越来越深重的厌恶。最后说："那些发表言论和演讲的人，都在鼓动人民去抵制法国政府、去反对帮助我们治理领地的驻越官。除了那些散播冒险精神的文人以外，鼓动得最热烈的就是大学毕业却没有职位的那些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阶级很崇高，但是却又备受排斥。其中有他们的一个省长，有非常强的欲望。本来没什么大学问，却吹嘘说要达到日本人的水平。"

看到了试图同化拉丁民族的想法的弊端之后，克罗茨古斯基很忧愁地说道："如果用我们的习惯和社会思想去改变他们源远流长的礼教传统，这不是在帮他们走进步的路。可以用实例证明。安南原本有着很完善的乡制制度，而我们的政府用频繁的干预行为，阻碍着它的存在。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改变那些世世代代传下的事业，因为它们是一个民族构建法律和风俗时的一个重要依据。它是被历史不断巩固的，不可以被更新。打破他们的传统习惯的行为，和徒劳地对行政加以改革的措施，都是要禁止的，否则会危害我们的未来。"

五

说完了这些远方的领属地，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大块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大部分法国政客，都主张一定要用教育去同化当地人。这个地区的民族跟印度是不一样的，最后取得的成果，说不定会比英国人在印度所取得的

好呢？

想观察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受教育的成果有点困难，因为只有很少的学校可以有穆斯林入学，因此只能够观察到一个很小的范围。但是这很小的范围，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明确的状况。在此节录一下保罗杜马写的《非洲的法国人》一书的一个小节："1868 年是个灾荒年。阿尔及利亚的大主教在这一年收养了很多原土著居民的弃婴，用他们来传播宗教信仰。我们可以把这项慈善事业所收获的经验当作是教训，也可以为此叹气。就在不久前，我从阿尔及利亚去往康斯坦丁，在路上跟一位高贵的教士进行交谈。他对于同化改良阿拉伯民族的想法，似乎已经持绝望的态度了。据他所说，拉维热里的孤儿收容所的历史记载，那时被收养的那 4000 个孤儿中，只有 100 人皈依了基督教，其他的都回归了他们的伊斯兰教。这些孤儿的极坏的名声传遍了阿尔及利亚，移民们在雇用他们很短的时间之后，就会辞退他们。他们身上聚集了所有的民族恶习，比如盗窃、懒惰、酗酒，还包括我们的恶习。人们也尝试着跟他们通婚，将他们安置到特殊的村庄去，给他们土地去耕种，给他们需要的劳动工具。但是成效太差了。1808 年村庄里有个人，把他的神甫都杀害了。"

前文谈到的经验，阿尔及利亚人最熟悉不过了，主要是儿童和青年人。不论是学校发的书本，还是人的口头传授，不同的教授方法之下，他们得到的成绩都没差别。最能够对人造成约束的，是军队中的纪律。被法国军官所统治的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征收的都是阿拉伯人，他们会在几年时间的接触中被法国同化吗？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否认阿拉伯人是英勇的战士，但是一旦他们脱下了军装，他们也就同时失去了他们身上沾染到的那点微薄的欧洲的文化。

同一个作者又讲述道："退役的士兵们，在疲惫地返回到他们的村庄或郊野之后，他们嗜好的，不过是面饼和他们能养得起的很多女人。从道义上说，

神明的真主和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是他们唯一的信仰，他们将基督信徒当作狗，或狗的儿子，把女人当作家畜，这与法国人决然不一样。他们和法国人之间唯一相同的，只有恶劣的品行。其中有一种他们原本是没有的，就是酗酒。唉……”

正如前文所说，利用教育想把我们的文化灌输给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是非常难的事。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对阿尔及利亚做过研究的人也赞成。他们既不存在成见，又与此毫无利害关系，但是也发表同样的观点，认为从摩洛哥到亚洲中部的穆斯林，是被我们的教育培养成了我们的敌人。我询问过的明哲的穆斯林也都表示，我们进行教育的试验的唯一后果，就是把他们民族的同胞的性情改造了，使他们产生了太多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总之这种教育，使他们的人生变得蒙昧，把他们变成了为非作乱的人。假设我们在地中海的领属地推广我们的教育的话，那些印度人的“印度是属于印度的”的口号，就会变成：“阿尔及利亚是属于阿拉伯人的！”

在印度、在阿尔及利亚或者在别的地区发生的这些事实，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用教育去改革一个民族，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再继续这种教育试验的话，会是很危险的。正如前文所说，我并不是一个反对教育的人，请不要这样误会，我一直在说明的是，适合于欧洲人的教育，是不适合其他民族的文明的，更不会适合那些根本没有文明的民族。

欧式的教育，是跟下等民族相违背的。他们能够接纳的，只有技术教育和简单的课程，比如计算，和能够应用于农业、工业与手工业的科学知识，仅有这些。如果跟他们讲授法国的国家系统和百年战争的起因，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

第三章 欧洲制度及宗教对于治下民族的心理结果

一

前文已经论述过了，施行欧式教育的结果，只能是引起原土著居民的道德败坏，使他们成为欧洲人的敌人，而且也增加不了他们的智慧。暂时先把这些问题搁置起来不再讨论，下面来论述另一个同化的因素，那就是制度。欧洲的社会制度是否会对领属地的原土著居民产生影响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靠改革社会制度来改造一个民族，这种想法在法国很是流行。我们似乎拥有非常完善的制度，具有整齐统一的特点。当然不可能实现时间的统一，但是空间的统一似乎是可能的。因此，这些人想要把纯理论的、抽象的政治理想，像传教一般传布到世界各处，去谋求全人类的幸福。他们这种想法和行动，相当的执著。

我们的理论当下正引导着我们把领属地改为郡县，不论是黑种人、黄种人、阿拉伯人还是野蛮人，都分享着我们的根本原则，享有着人权主义宣扬的利益。认为所有的属地都应该广泛推行选举制度，自治会、县会、郡会，和各级审判庭及两院的议员，他们这些人让头脑跟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相似的黑种人，迈着大步走进了如今这个复杂纷乱的时代。

这种制度推广的做法，持续了很长时间，取得的成绩很容易看到。它的破坏作用就更不用提了，曾经繁荣的地区如今都衰败不堪了。统计数据表明，这种推广如今依靠的都是我们祖国的预算之资。

尽管就是由实行同化的做法造成的衰败，但是领属地主张同化政策的呼声，仍然不减退。我们一定不要认为那些主张实行同化的人，不是出于对我们司法行政制度和复杂的机构设置的羡慕，而是想跟祖国一样谋取经济利益。相比于在英国的领属地上出资修建道路、港口或运河，原土著居民更加希望由国家来承担这些公共设施工程，接受同化只是为了得到国家的供养。亲耳听听联合岛会议长的话，就能了解到他的本来意图，他说："我们希望领属地逐渐地被祖国同化，把它变成一个郡。但是我们不希望由于接受了同化，就要跟法国人缴纳同样多的税款。"

二

从理论上说，制度的同化政策看起来是很简单的，这很能迷惑人，但是从现实状况而言，这种做法简直是复杂得无以言表。我们的行政司法制度，是最复杂的，因为它原本就产生于一种很久之前的复杂的文化需求。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行政系统是最复杂纷繁的，包括关于生死和关于婚姻的例文，数不胜数。对于法国人来说，有很多的人能够明了地知道自治会的职责、县会的职责、郡会的职责、调事法官的职务、初审法庭的职责及上诉法庭的职责。而想要让黑人、阿拉伯人和安南人来弄清楚这些复杂的机构，并且全面地加以采用，这可能吗？再试想一下那些新的义务，一旦违反就会受到惩罚，想一下监视着他们行为的很多官员，想一下买卖一小块儿土地、索要一笔欠款和那些又没期限又复杂的模式，他们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这些原土著居民

只能够适应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制度。审判和赋税的作用很简单，这是他们很熟悉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原本是没有约束的，我们却要用复杂的制度来给他们约束，我们口里所说的自由，其实是他们认为的虐政。

但这些难点，也没能够减弱我们的理论家们的热情。他们仍然要强迫领属地去获得幸福，强迫着他们去领受我们复杂的制度带来的好处。甚至派遣了无数的官员专门去维持这种制度。这是我们输出的唯一的重要资源。在马提尼克那个地区，95% 是黑人居民，法国的官员就有 800 人之多。现在还保存在印度的那三四个村庄里，官员超过了 100 人，其中有 38 名法官，还除去了一名上议员和一名下议员。在越南的法国官员多得都可以组成军团了。

那些官员在刚离开祖国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热情高涨的。但是试验开始实行了之后，他们便知道了这种强迫一个民族弃绝原有的社会制度的想法，不过是书中的痴心妄想。事实上呢，能得到的结果只有彻底的扰乱。看到了困难重重之后，他们又开始实施另一种改造对方性格的策略，试图调和一下利益的冲突。这调和的结果，不是仅仅满足一个人的利益。有时会出现严厉的总督，削减冗多的官员，貌似可以得到短暂的安宁的喘息的时间。孔思坦在越南就削减掉了很多官员，为了维持一个小的城市，使得每年都可以节约 800 万的资金。可是他刚一离任，被裁减的官员们就立即被恢复原职了。这恢复也是应该的，因为成果的不佳不应该全部归罪于官员的没能力，而是应该怪他们缺少职务经验。他们在刚离开祖国的时候，就被赋予了去实行我们国家的制度的使命，无法拒绝，却也没能很好地认识到。远远看去，好像执行起来不难，可是他们一旦任了职，就会感到无能为力。因此，总督们后来大多都放弃了这项过重的责任。仅在越南，6 年里就换了 15 个总督，每一位都只在位了约 5 个月那么短的时间。如今即便还有长久任职的，也无非是为了得到高薪，或者是把职位转给了有势力的政客们。

因为知道了前任的失败结局，所以每一位新的总督在上位时，就会实施

一种不同的方法，可是他们这样只会制造麻烦。因为实施的方法并不是他们本人制定的，而是被电报的命令强迫的。前文提到过的那位孔思坦在下院发表讲演的时候曾经说过：“我在任职的6个月时间里，已经服从了4位总长的命令了。每一位总长给的命令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想而知这种方法的收效了。一开始先是骚乱，后来就是公开的叛乱。即便不是如此，也会聚齐很多民众的不满和愤怒。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言论，都是一致的。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上讲：“真正引发了越南海盗的群体行动的，不是原土著居民的爱国情感，而是政府的做法。政府把温顺的原土著居民征去做搬运工，让他们离开耕种的土地，而沦为了苦力。还烧毁他们的村落，虐待那里的居民，增加收缴的赋税，税收额度比物价的两三倍还要高。所以，是因为我们的行政机构给当地带来了太多害处，而且由我们保护的当地原土著官吏行为又太过分，所以海贼才会那么猖獗的。”

我们所采取的具有破坏性的举措，所导致的令人悲哀的后果，不只是表现在越南这一个地方，其他的所有的新的和老的领属地所取得的成效都是跟这一样的。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所有的犹太人一齐被同化了之后，我们几乎因此失去了这块领属地。再例如科林在巴黎一家重要报刊上讲述的他在塞内加尔看到的实际状况。这些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强行推广我们的社会制度会带来的害处。依他所言：“使黑人摒弃他们的社会机构的做法，是在酝酿一场永久的战争，会让一切信奉唯物主义的人，让所有的穆斯林和我们的奴仆，都变成我们的敌人。”这些后果全是在领属地实行欧洲的制度所造成的。

三

上文已经对教育制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

向宗教信仰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国家的先锋政治家们是主张传教主义的，这是不合事实的欺骗。当今世界完全不同于昔日了，那种动用武力去保护传教士，甚至以此扰乱东方的社会制度的做法，早已成为了过去。如今，我们领属地的土著人民，都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一个问题，我想在此阐明，那就是，所有属于高等文明的因素，都是无法强行施加于低等民族的。我们的宗教信仰对东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几个数据便能充分地反映出来。如若听信那些传教士的无用的供词，那么上文论述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

通过拉维热里大主教的4000个孤儿的事例，我已经证实了关于阿拉伯人是否能接受我们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事实是，那些孤儿是完全在基督教文化中接受教育的，隔绝了与土著民的联系，然而大部分的孤儿成年之后依然重新信仰了他们的伊斯兰教。

英国人在印度进行了类似的尝试，成效同样不好。泰勒教士在英国的教会大会上做了报告，他说，“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尽管享有英国政府的保护和丰厚的资金，但是招募到的信徒仍然很少，招募到的也都是下层民众。而没有政府的支持的伊斯兰教国家的传教活动，成效就更差了。在阿拉伯、波斯和巴勒斯坦等地区，传教士投入了50万的巨资和10年的精力，却只是勉强地说服了他们的仆人下属来入教，被说服改教的不过是一些蒙昧的普通女子。这些事例说明了，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灌输给东方人的。”

我这样强调我们所信仰的宗教是感化不了东方人的，并不是想责难我们的传教士。事实上我十分尊敬他们的过人勇气，还有对其事业的执着。他们往往是奔赴那些没有开化的地区，为祖国效力，例如去叙利亚创办学校传播我们的语言。举了这么多例子之后，貌似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了，企图在领属地实施我们的教育建立我们的制度，结果无非是破坏那里人民的生存状态，以至于使他们成为欧洲人民的敌对者。

我想要推究到的，正是这种事实背后的缘由，我想要发现的，就是导致事实发生的那所有的规律。为什么那些半开化种族和野蛮种族的文明程度不能被提高到我们的高度？种族之间无法达到通彻又是为何？这些问题我都想探个究竟。

第四章　欧洲文化不能变更治下民族的理由

一

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学、语言、美术等，这些文明所包含的基本要素，都和一个民族触发思想情感的内在方式紧密相关，它们是随着触发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教育只能够大概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而制度和宗教信仰则表明一个民族的文化需求。和一个民族的观念和情感不相一致的另一种文化，即便结合了教育，也是不能产生作用的。同样的，制度是与需求紧密相关，二者是彼此照应的，所以一种制度不可以随便地实施于他国。

当今时代，东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情感、宗教信仰和生存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穆斯林和越南人，他们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差距相当大。西方的民族在逐渐地走出祖先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东方民族仍然在过去的影响中生活着。东方人的社会习惯具有一种固定性，不曾改变过，而欧洲人对此并不了解。他们在我们已经丧失了信仰的时候，依旧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其自身的信条。在西方民族中早已动摇了的家族系统，在东方民族中依然完好无损。一些规则在我们这里已经失去了效力，而在他们心中依然是权威的。相比之下，他们的信念强大，需求简单，而我们信念薄弱，却需求很多。欧洲

社会已经将古代社会存在的凭借都完全地颠覆了，比如宗教信仰、家族体系、祖先遗训等，而它们仍然在东方具有无法取代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社会制度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很难填平的一个沟壑。不管是阿拉伯人也好，印度人也好，东方民族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根本都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对于欧洲来说，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脱离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哪怕是信仰最为深刻的民族。

东方是没有民法的法典的，有的只是宗教的法典，因此，必须有宗教的律令，一种新制度才能够融入进去。为了保存在印度的势力，英国人在印度修复了佛塔、厚赡毗湿奴与湿婆的主要殿堂，并常常宣称他们会尊重其属民的宗教信仰，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记载宗教和民事法规的古老法典《马努经》是印度两千年来的根本法典，正如《可兰经》是自穆罕默德之后，穆斯林所信奉的最高法典。

除了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异，东方民族在日常生活上也与我们颇为不同。最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需求那么简单，而我们的需求很是繁杂。他们的追求和理想那么朴素，睡眠只需一条被褥而已，所居只需简陋的小屋甚至帷帐，所食也不过是一些蔬菜罢了，但却感到很满足。那种生活状态在欧洲人看来是艰苦的，而他们是平静淡泊的。同一个人，假设是成长在欧洲，肯定获得很多的物质，这些物质是基于我们的文化而被多数人创造出来的。即便这个人很朴素很自信，当看到他们自身的艰苦时，也会变得愤懑、窘迫和烦躁。印度有很大一片地区都受到了欧洲教育带来的危害，一些原土著居民受到英国的教育和保护，能获得30法郎的月薪，而一旦有了地位就开始仿效绅士，抽着雪茄看报，衣着光鲜地出入原土著居民的娱乐场合，还嫌自己薪水太少不够用。这是很可悲的。因为那些薪水如果按照印度传统来赡养家族的话，供养两个家庭都用不完。而这种情况很常见。

现在再来比较一下同样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欧洲移民们的需

求。由此便可以知道，即便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土著民来说，只要有一些粮食做饼吃，有一些清水喝，再有一套大衣和帽子，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而他们的邻居，那些欧洲移民，即便是下层民众，也要求所有的欧洲环境所创造出的物质，房屋、酒肉和各种衣服。有了这大量的可见的事实例证，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心理上的规律：原土著居民一旦被施予了欧式教育，就会感到非常困窘，会很被动地去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一种精致的却不能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由此他们曾有的传统的风俗习惯全部被摧毁了，对当下的生活也陷入了迷茫无措。

我们还能指望用我们的制度和教育让东方人靠拢我们，和铺平差距的沟壑吗？之前的例子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说，一个民族最难以被改变的也最难被同化的是代代相传的继承性情感。也正是这种继承性造成了东西方民族的巨大差异。造就了一个民族统一的环境、统一的制度和统一的信仰，是民众的共同情感，它是延绵不断的，已持续了过去的好几个世纪。这种情感是不会被教育所更改的，它是一个民族的过往，是历史经验和实践的结果，它造就了一个民族的性格，它的影响是相当强大的。

民族性格是历史的主要原动力。罗马之所以能够征服希腊，人口数量少的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印度，发挥了更多的作用的是他们的坚毅和果决，而非智慧。而黑种人的容易激动、没远见、没决心和不能够持之以恒地努力的性格特质，也不是任何教育能够改变得了的。

如果把教育只是理解为一种加深记忆的方法，比如熟记书上的理论，那么，治下的民族，好比黑种人，也能与欧洲人达到同等文明程度了。从美洲回来之后，我国的大学教授伊波对黑人大加褒奖。在看到黑人在教室里做的几何证明，和对修昔底德的著作进行的出色的翻译之后，说道："黑人和白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造物主没有让他们存在根本的区别。"我不知道黑人和白人究竟是不是同一位上帝的孩子，但是我深信伊波教授是被自己的幻想误

入歧途了。这种幻想把很多的人都误导了，包括从事着低等民族教育事业的人，如传教士。

导致这种幻想的原因，是他们对于种族差异的不够了解。在过去的教育形式中，人们只重视记忆。低等民族的智慧，是只具有一定的限度的，我们只要对离校之后的白人与黑人的生活进行观察，便能够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所在。打个比方来说，土著民所接受过的欧式教育，仅仅是一件很快就会脱下来的暂时穿一穿的舞台服装。我也常常会和有学位的印度人士交谈，仍然时常感受到两个民族彼此之间，不论在观念、伦理还是情感上的极大差异。可是，那些半开化的民族和野蛮人种就永远不会发展到欧洲文明的程度了吗？不，这并不是我要表达的观点。我们的祖先何尝不曾生存在野蛮的状态，经过了数千年的努力，才享受到高等文明的裨益。所以那些民族在未来也是可以发展到欧洲今天的文明程度的，但是他们不可以跳级，而必须要历经一些程序。

从种子长成大树，从孩童长大为成人，社会的进步过程和生物的进化过程是有着一样的规律的，文明程度的提高，自然也要循序渐进。或许我们能粗暴地去阻碍一个民族的发展，如同砍断一棵树以阻止它长出果子一样，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改变进化的规律。

二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将本民族文化强加给其他民族，那就是：文化太复杂。能够适于他们的心理特点的，只能是具有简单性的一种文化，可以为他们所认知，而又不会扰乱他们的生活状态，且只有一种制度、一种宗教信仰和一种教育形式。穆斯林的文化就是如此。被穆斯林征服的民族，多数是东方人种，彼此有着相似的情感、需求和风俗习惯，而不像欧洲文化

那么复杂，所以他们容易被穆斯林文化所同化，并能够接受革命所带来的弊端。因此，穆斯林在东方才拥有了很大的势力。

历史学家认为穆斯林之所以形成势力，是因为它在世界上无形中享有着一种智慧的声誉。尽管到今天它的政治势力已经不在了，但它的文化一直不曾削弱。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印度的则高达5000万，比蒙古统治时期都要多。从罗马人以来，就只有穆斯林的文化能够令不同的种族接纳它的各文化要素，包括宗教、制度和美术等方面。时至今日，他们的势力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超越了曾经那个拥有实权的辉煌时期。《可兰经》和与之关联的制度采用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很简单，而且能满足那些原始民族的大部分的需求。凡是穆斯林所走过的地方，就像普通商人一样，人们总能看到他们遗留的迹象，比如制度和宗教，近代的探险家们，也都在非洲内陆的土著部落中看到伊斯兰教信徒，可以说，当今已是一个由穆斯林来开化非洲土著的时代了。而不论是欧洲侵略者还有欧洲商人，如若追寻他们在东方的形迹，则完全没有类似穆斯林的这种无形势力存在过的影子。

三

前一章和本章论述的都是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欧洲人是不能短期内改变东方民族和其他低等民族的文化的，不论是用教育、制度、宗教信仰，还是其他的任何途径。日本的例子，也是推翻不了这个结论的。日本的历史虽然很短，但是这个民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文化高度，后来想要变更为另一种高等文化形式。这是很特殊的一个事例，我在本书中无法进行详细论说，只能讲一下它主要的意义所在。虽然欧洲的科技成果在日本得到全面的采用，但是这并未改变这个民族根本的规则、信仰和民族性格。就好像人们使一位

封建时代的男爵再生，并教他开汽车、用枪炮，难道这种教育就会改变他的心理状态吗？所以说，表面上过着欧式生活的日本人，其内在的生活内容并没有改变，是固定了的，其民族性格更是从未改变过。

总之，欧洲在进行外侵的时候，所侵略的地区，并没有遇到日本文化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想要将一个民族同化或者法化的企图，仅仅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而已。其实我们只需要施加一种高等的监护权责就足够了，而不一定非要将我们这套复杂的官政制度强加给土著民，要将他们固有的习惯、制度和法律等保留下来。具体而言，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大幅度削减领属地的官员的数量，要求他们深入认识土著民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与此同时，也要保证他们有必要的地位和威望，以保持其尊严。换而言之，这就是一种简单的改革计划。这里只是大概地一讲，不需要很详尽，因为要想让它形成一种有影响的舆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今日流行的政治观念已然形成了一股潮流，无法挽回了，无数的人力物力都被耗费到了幻想中的同化政策上。这种观念是由人的感性引领的，理性的伦理观念对它无可奈何，除非以最残酷的实验为代价。能改变这幻想的，唯有灾难之后的清醒。

我们在悲痛中反问自身："难道我们的祖先，牺牲了无数生命，却只使得我们继续执迷不悟吗？"仍然有政治家自以为是地想要追求不一样的幸福，仍然有经济学家在主张去改造阿拉伯人的心理状态，去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生产和家庭制度。再去想一想这些人道的、简单的理论给我们造成的牺牲，想一想我们为了一些民族的自由和统一抛洒鲜血，而那些民族在今日反以我们为敌。就是因为这些理论，我们非要去同化那些在他们原本的古法下和平生活的人们，而得到的只有憎恨和无休止的战争，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让法国人民离开我们的领属地，去看一看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领属地，他们一定会惭愧的。英国人只用不超过1000人的官员和6万人的军队，就把印度治理得和平无恙。全国各地都布满了运河、铁路和其他工程，他们

却连一分钱的资金都没有向殖民国索取。他们的管理者具有一种无形的权威，这在我们的领属地中却没有。普遍性的选举活动，对于多达亿万的土著民来说，是没多大意义的，更没有什么郡会或者代表领属地的两院议员了。保有土著民族的传统社会习惯，同时使之偶尔地受到少数的欧洲人眼光高远的干预和监护，这就是自治。

他们的生存状况比我国领属地的土著民恶劣吗？并不是。不信的话，可以去调查印度法属的三四个村落，便会明显看到那些土著民的困苦。然后离开法属地去看英属地，你会看到偌大的一片地区只有一位官员，土著民也并不敌视他，而且你会发现英国人是很尊重当地的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他们给予了土著民真正的自由，这是令人惊异的。如果我能够让所有的法国人在游历中做这种对比，那么我确信绝不会有一个人反对我的主张。我所主张的原则不应该受到轻视，它是一种新的意向。人类不能够离开了这种意向而生存，它产生于我们那丧失的宗教幻想。为何我们不就此放弃传教士的职责呢？要知道近代的经济竞争如此激烈，唯有强者才能在其中生存下去，痴心妄想并不能对我们祖国的未来有所保证，反而足以丧失它。

第五章　殖民的新法

一

历史上有两种殖民的方式。一种是武力侵略，这是罗马人最先使用的方式。夺取财物、售卖壮丁，再让别人来繁衍这片土地，等到财富再次聚积之后就再次发动侵略。这虽然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但是战胜国会因此耗费过大，于是有了第二种方式，即设立总督来进行治理。它保证领属地的安宁，但代价是从原著居民那里收取沉重的赋税。这种方式到后来一直没有过多大改变，可是这种方式的实施离不开防守，需要防御其他国家用武力来夺取领地。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治理领属地需要有条不紊，需要智慧，如果治理不当的话，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便会矛盾重重，有可能引发永久性冲突。我们都心知肚明，我国的领属地不仅给我们带不来什么利益，还耗费着人力物力，如今危机已经刻不容缓了。

除前两种殖民方式之外，德国人又发明了第三种。这个方式很巧妙，让他人去统治和监护一个地区，而德国人自己只需要坐收渔利，在摩洛哥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这种规划的实施需要具备特定的民族性格，而且工商业要有十足的竞争力。德国人接受过非常好的技术教育，具有很大优势，想要与之

竞争是很难的，英国人就早已知难而退了。德国人驻扎的地区开始时德国的人数很少，后来很快多了起来，他们抢占了所有的工商业，只等待最终成为主人。

使用这种方式，德国人侵略了里维拉 20 年，这个风景秀美的史上必争之地坐落在地中海沿岸，德国人至今所扩展的势力范围已经长达 200 公里，不仅是移民的目标地区，也是他们苦心经营的领属地。他们首先夺取和掌控了几乎所有的营业酒店，营业的全部为日耳曼人，顾客们也基本是同一种族的。1906 年，我曾经去调查了下巴地区当年的旅客数量，在调查的 22 个酒店中，有 350 个德国人和 50 个法国人。法国人开设在蓝滨地区的下级旅店只有几所而已。战争之前的德国人是贫穷而勤劳的。如今勤劳依旧，但不再贫穷了，发达的工业给他们增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事实上至今贫穷的只有法国人自己了。那里的德国人凭借劳动致富，劳动之后就去蓝滨休息娱乐，或者尝试经商来获利，比如卖货和搞地皮投机生意。

德国人创立酒店的盈利是很高的，所以各个酒店的经营者都想要自己单独创建，而这只需要得到汉堡的银行家的贷款。德国的银行很乐意去投资工业，而相比之下，我国的银行却从民众手中诱得资本，再用它投资国债获取回扣，或者用来投资外国的股票。像委内瑞拉和海地这一类的国家，如果要卖出国债的话，肯定找我们法国的银行代为销售。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德国的银行家就比法国的银行家爱国，他们不过是更聪明，更精通于投资之道罢了。从前有人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在蒙地卡罗当酒店经理的人有 6 万法郎的积蓄，有个银行家竟然愿意贷给他 20 万法郎，他得以买下了一家酒店。5 年之后，他又以 100 万法郎的价格将酒店转卖了出去。我调查过下巴的两个大酒店在 1904 年到 1905 年冬这期间的收入，它们一共获利 397444 法郎，其中一家获利高达 167153 法郎，即便是镀金也比不上这利润啊。而在法国，没有人倡导我们去利用自己国土上丰富的资源，而是不断地鼓励我们去远方

进行殖民。但是在去越南或马达加斯加岛之前，为什么不先把遍地的资源好好利用一下呢？

二

前文所讲述的这些观察心得，我曾经在去巴黎的列车上与一位德国的老哲学教授探讨过。开始我先是用憨厚而悲悯的语气说德国人不应该向专横独裁的恺撒帝屈膝服从。那位哲学家笑着说："这是历史上时常会出现的，一个民族混乱了之后的表现形式。怎么会仅仅是恺撒呢，也可以是西拉，也可以是波拿马。你无须怜悯我们对恺撒的屈服，你们法国如今正在前进着走向一位衰落了的恺撒，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不久就要来临了。相比于供奉一位意外降临的恺撒，我更愿意来供奉我们的威名赫赫的恺撒。让咱们也姑且谈谈蓝滨的经济状况吧，你所说属实。曾经贫穷得连肉都吃不起的德国人，如今早已改头换面了。这既要归功于技术教育，也有一定的民族性格原因，同时也离不开严格的纪律的规范作用。这才是德国人成功的秘密所在。有了这些因素，如今的德国人到处发挥着优势，在各自参与竞争，吞并工业，连巴黎的各种工业领域都被他们掌控了，包括化学制品、相机、精密仪器和电气机械，其他的迟早也会被吞并的。德国人现在已经把工厂建在了法国，这样一来保护税就无效了。我们在蓝滨和在摩洛哥的殖民方式是一样的，只是掌控着工商业，土地则由你们任意去治理。要知道只有掌控了工商业才能真正成为主人，政治上的虚名则并不重要。而且掌控工商业并不需要发动战争，用战争来恐吓威胁一下就够了。你们的和平派、国际派、反对军派的人物，和其他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将一起瓦解你们的祖国的观念，而我们只需等待着瓦解的完成，然后你们便会被我们的想法引着走，这简单得很。

“战争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发达的工商业是汉堡所容纳不了的，它太小了，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大的军事商业海港。离得比较近的地方只有安特卫普，我们就在那里增开了商店、银行，扩展了海上营业。英国人和比利时人都清楚我们的意图何在，比利时与荷兰将要合并了，可是也只能够暂时维持而已，不久大家就会知道，小国家在这世界上已经没什么位置了。英国人不久肯定会反对我们的经营的，所以战争的爆发也是避免不了的，你们法国一定也会投入战争的。到那时你们会变得比现在还要衰败，宗教和政治斗争将会削弱你们的势力，以致到最后降低为一个小国家。你们只有消解政治和宗教之间的怨恨，改革教育方式，才能够挽救当前的危机，因为这其中是有连带关系的。可是你们却做不到。你们大力发展艺术事业，又极其擅长辞令，却把工业的发展落下了。现在炙手可热的势力是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演说家，这也代表了社会党的势力。你们都不了解当今的经济需求，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

“德国现在人口数量在增长，出产的物资也很充裕。而你们的人口太少，出产的物资是有限的。当今的世界眼看着越来越小，日本又已经把东方的顾客几乎全部包揽了。我们即将把人口和物资输送到你们法国，一旦局面混乱起来，便立即动用军队进行控制。弱国给强国让道，这是两千年不变的道理。”

听了这个日耳曼人的一番话，我无言以对。当车靠近巴黎的时候，我忽然领悟了他的话中包含的道理。道别的时候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然而内心仿佛在向着深渊走去。

第六篇

骚乱的发展以及反对社会解体的纷争

罗马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曾说过：“能动摇人心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这正是我们今天遭遇的祸患的根源。能激发一个民族的只有妄念，不是事物，而是被事物激发出的幻念和思想。历史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的、最残酷的战争都是由一些潜在内心的力量所激发的。

第一章　社会骚乱

一

罗马的领事尚索利鲁斯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人道主义者，但他深知如何去利用敌人的心理。他在治理迦太基的时候，像一个足智多谋的战士一样，把它变成了举世富饶的地方，艺术与商业同时兴盛。这离不开和平的环境所起的作用。尚索利鲁斯常常对迦太基人宣扬和平的益处，同时贬斥战争，然后总结道："把你们的武器都交给我，罗马领事会保护你们这些民众的！"于是很快，想法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们就服从了他的话。而当交付了军事器械之后，他又说："把战船也都交给我吧，这些舰队养着太费钱费力了，存着又非常滞积。你们其实并不需要这些没用的东西，罗马政府会为你们防御敌人的侵犯的。"于是和平主义者再次服从了。而领事又说了："你们的遵从是值得嘉奖的。现在只有一件事是我所希望的了。为了防止发生叛乱，罗马政府命令我削平迦太基，把你们这些人迁到沙漠里去。你们可以任意选择地域，但是离海必须要有超过 80 个球场那么远的距离。"直到这时迦太基人才意识到了和平主义的危害。想要不在沙漠里饿死，他们只有试图防御，然而已经太迟了。他们的城市和居民已经被侵占、被烧为灰烬，迦太基的历

史从此终结了。

虽然这已是很久之前的故事了，但令人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教训。有一位国务总理也许是对此事有所感触，在邮递员第一次罢工的时候，他在甘贝塔的遗像下面发表演讲，说："只有强者才能够拥有权力，将来的权力必然只有被无所畏惧的人来拥有。每一个放任它的官员去背叛社会的国家，必然会被民众的蔑视所颠覆。为了保证公共的安宁，进行快速地镇压是有必要的。"这些观点跟某位内阁成员的意见是相反的。这位内阁成员对叛乱的官员进行救济，对罢工和破坏行为进行威胁，他的意见反映在这些话语中，"新时代的工人，要重视新的事实。要给予工业界诚信……""能把恩惠施予工人和官员的幸运的人"，这些可怜的话语，表达的是如今的新人道主义理论。其实把它称作人道主义的理论，还不如用索列尔给它的更正确的称谓：矫饰而懦弱的哲学。

所有人都知道那些反叛的工人和官员对于这懦弱之音的回应，更为此十分担心，也知道蔑视和恐吓将会越来越多。一旦表达不满和反抗，就会开始罢工、破坏财物和纵火。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治理者被恐惧所吓倒，这是一种不幸的可怕的情形，将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并引起无数的革命事件。如果人们听从了前国务总理的意见，防御其实并不难，而退缩只会让反叛者看到他们自身力量的强大，从而更增加了蔑视。马基雅弗利早就说过，用武力得到的群众是不会心怀感恩的。

如果人民不愿意听信像马基雅弗利的这种太过陈旧的言论，那么对于退让的希望，是出自公报上发表的一篇给邮政员提薪的文章。这种退让会继续增长邮政员的要求，服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应该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果然邮政员又发起了第二次罢工，这一次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傲慢的态度和激烈的威胁。其他领域的官员们看到这种威胁的效力之后，也开始提条件了，要求将预算加倍，还要增加赋税，否则就不满足。内阁成员和议员们对于满

足这些要求并没有很多顾虑，他们知道当这种懦弱的退让要付出的代价出现时，他们早已离职而与之无关了。只是当要求多得将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反抗一下。邮政员的第二次罢工行动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它让公众受到了邮政和铁路等员工罢工所带来的苦恼，这是应该的，因为公众会想到这种后果乃是工会制度所造成的，这样社会舆论就会转而去抨击革命党人了。假如一味顺从反叛者的意愿，最后在一个国家中又产生了一个国家，而产生的国家是反对这个大国家的，结果大国家人的生活却被几千人扰乱了，这难道不可笑吗？

我们应该学习如何防御，而不需要畏惧，流血冲突和军人专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畏惧。如果邮政员和小学教师并不知道他们的言说可以引起政府畏惧，那他们怎么还敢在报纸上大发其词吗？被国家给养着的官员们却在鼓吹煽动反爱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言论，在破坏社会安定，我们难道就放任不管吗？“为了争取平民的解放，我代表小学教师们，要求拥有加入劳动联合会的权利。并深化儿童对中产阶级的怨恨的思想。”发出这些引导和蛊惑之音的人，其实就是中产阶级中地位较高的人。鼓动邮政员发动罢工运动的那位领导自己享受着6000法郎的年薪和3000法郎的养老金，而他自称是平民，难道不荒谬吗？一旦工人阶级获得了势力，那么官员的薪水和工人们的恐怕就没差别了。

我们想一想，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国家呢？既不是立法的议会，也不是行使法律的政府机构，而正是上百万的各司其职地行使着法律的官员。一旦这些官员都叛乱了，一个国家还怎么存在下去呢？有没有内阁成员都没关系，但是官员却是不可或缺和代替的。值得庆幸的是，需要几年的学习才能够培养出一些机械工或铁匠，而只需几个星期就足够培养出一位科长，一名邮政工作者，一个征收人员，或一名信差。

二

罗马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曾说过："能动摇人心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这正是我们今天遭遇的祸患的根源。能激发一个民族的只有妄念，不是事物，而是被事物激发出的幻念和思想。历史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的、最残酷的战争都是由一些潜在内心的力量所激发的。

没有哪个时代的平民阶层，得到过像今天这样好的礼遇。然而今天的平民阶层的怨声载道也是前所未有的。利益的差别是可以调和的，但是想要调和政客们的怨恨，以及民众在他们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抱怨和不满，却只是徒劳罢了。不久之前的社会主义，当下的工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几乎都成了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民众被这堆新的理论熏陶着，变为一个愈加复杂的群体。有野心家、有盲从者、有酸腐的大学生、有哭哭啼啼的人道主义者，还有剩下的一群温顺的弱者，他们只是一味地去跟从所有的发起运动的人。

因为政府是懦弱退缩的，所以这些革命党人才如此无畏大胆。索莱尔就曾说过："社会政策的原动力，乃取决于政府的懦弱。工会的领导人没过多长时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教导工人们，不要去恳求被施予恩惠，而应该利用中产阶级的懦弱本性，去强迫他们顺从平民的意志。这种革命策略是以中产阶级的懦弱为根基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产生了把中产阶级彻底推向灭亡的念头，那么他们自己离灭亡也不远了。这些革命党人一味地搞破坏，却不去考虑破坏之后的情形。当工会拥有了自身的势力之后，恐怕工人们的命运还不如今天。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倾向于革命党，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正处在懦弱的政府和专制的工会之间，自然选择去向更有势力的一边靠拢。说这是群众的本能，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工会拥有着很强大的权威，他们领导工人群众时的做法，连最专制的君王恐怕都不敢用。这种领导不常出面发言，却有办法驯服最不守纪律的群众和只会演说的懦夫，让他们把心思全

放在行动上。他们发布的命令是由无名的文员会下达的，通知发动罢工运动的时候，距离近的用小笛子传达，距离远的用自行车传达。如若有人敢反对，那毫无疑问就会被同志中的狂热分子殴打。人们应该还记得，曾经艾瑟朗社的工头被工会下了驱逐令，当他回去拿衣服时险些被打死，幸好有宪兵的干涉。某个纸烟厂女工人也有过几乎一样的危险经历，原因是她接受的工资超出了工会的限制。所有的命令，哪怕是丧失理智的，工人也全部执行。阿紫布鲁克地区的工人，在一个工会代表的命令下罢工好几个月，原因是某个纺织厂的厂长把老式的机器换成了在英国已经使用了 10 年的新式机器。这就是工人们的心理啊，而政府又太过懦弱了。如果法国现在是没有铁路的，那就不要指望能够建成了。”

人们相信平民团体拥有理想，而我举出的这些反面的例子就是用来驳斥这种想法和相关理论的。联合会在领导人民方面的特长就是不需要理论的诱导，而让人们直接服从于他们的势力和威望。因此他们主张少数人拥有权力，而反对普遍性的选举。事实上这权力就是少数工会领导人的权力，这是不符合民主的，但是如今既然已得到了群众的顺从，将来迟早是会实现那权力的。

三

革命运动带来的危险，不是暴烈的行为，也不是这种行为的持久，而是革命在舆论上所引起的社会各界的思想混乱，这才是最该忧虑的。也正是这种影响引发了邮政人员和里昂市警察罢工，小学教师抱怨不满，官员们勾结工会等等事件。政府的意志被震慑，更让叛乱的人坚信，他们是可以用威胁达到目的的。

被反面的利益所牵制的立法者们，只有眼睁睁看着叛乱者慢慢变成未来

的选举者，放下经济上的要求。这些立法者只看一时的安宁，而不去考虑立法之后造成的影响，也不顾法律条文的矛盾。这些人道主义者，这些胆怯的人，总是认为既然现在工厂已经被毁了，军人已经被杀害了，工业已经衰落了，那么，何妨去宽恕那些迷途的人呢？总有办法能让他们改邪归正的。出于这种思想，那些杀人放火的人被禁闭几天就被释放了，倘若再犯，那就是教育的方式有问题，要努力改良。

这种危险的心理状态是在议院和中产阶级当中产生的，就是它导致了我们今天所陷入的骚乱氛围。潘伽烈就曾在此演说中表达过这个观点，把骚乱归罪于政府的这种心理状态。说着容易，做着难。他在议院的同事曾经凭借他的力量去反对收回西部铁路，但是当时他竟然由于恐惧而拒绝发言，可见工会的势力是多么大，以至于政治家的言行都无法一致了。国务总理曾经也反对工会的“违法妄为”，然而力度太小了根本形不成阻碍。他们就像报纸上说的：“仍然把收缴的税金，用在反对宣传爱国主义上，却又美其名曰‘工会津贴’。”现在的拉丁民族有一个心理特点，就是意志薄弱，广泛的民主之所以在历史上不存在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降低了，而是他们的意志太薄弱。

四

事物达到繁荣，不仅是由于表面上和它联系紧密的因素，也常常会由联系较远的因素所引发。政治方面的恐慌，固然给我们带来了残酷的打击，然而随之产生的连带事物，及其发生的根源问题同样要重视。总的来看，反映为思想上的错综混乱。

放眼望去，当今世界的每个个体的周围，民族赖以存在的一切无形的势力，

都已显现出了解体的趋势和迹象。比如，家族体系已涣散，而繁衍却很缓慢。再比如，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供给的增长速度所引起的恐慌，政府失去了威严的恐慌，反对人种歧视和追求平等的观念的传播，道德失范和犯罪率升高带来的恐慌，政府意志薄弱、官员反叛、法官无法执行法令所带来的恐慌，还有小学教师教给学生如何制造骚乱，让人担忧的事情非常之多。工会组织一日多于一日，它们聚集着愤懑和怨恨的人们。怨恨已经无处不在了，怨恨祖国和军队、怨恨资本，还怨恨政府的能力。令人费解的是，像这样一个社会都快要解体了，人们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思想体系，为什么依然能够支撑下去呢？

社会的构成是有一个由上到下的阶梯的。一旦纪律不存在了，权威也就随之丧失了。今天的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固有的寻求安宁的忍耐，处在跟过去一样的一种命运和境况中，今天的他们却只能服从。巴黎大学的教授奥拉尔，曾经举过一个事例来说明如今的平民心理状态给他带来的教训。我相信这个事例比搜集一大堆革命时期的材料更有说服力。首先要说，这位教授是深信群众的道德的。某日，他由于误了火车，去巴黎的一个火车站储藏室去取行李，有 4 个强壮的搬运工正在那里悠闲地散步。看到这位取行李的人穿戴那么朴素，连修饰都没有，就以为他不是一个能付很高报酬的主，这种蔑视冷淡的态度激怒了教授，他向运送长投诉，运送长觉得理由挺充足的，却不敢去指使下属，而是亲自把行李放到车上送出门外。没想到那一幕被搬运工看到了，他们愤怒地追过去，不停地咒骂着，还威胁运送长马上把行李放下，不然就动手打人。运送长边求饶边逃走了。

我知道一个历史教授本身也不是具有非常大的威信的，因为他只是擅长搜集材料，而无法分析和解说。尽管没有熟人可以证实所讲的这个事例，但是哪怕只有一半是真实的，也算得上是个教训。每个人如果观察一下自己的周遭，与此类似的事情会有很多。如果我们关注一位普通的清洁工人，调查

一下他的劳动所得，再跟他20年前的所得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过得还不如过去。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安心地继续工作下去呢？是因为他坚信议员和商人们是有能力保护他的，可以帮他抵制他的领导。

五

这种社会混乱的情形，不仅被下层社会认为是正确的，还引起了一种传播十分广泛的心理疾病，甚至让保守党派与最可恶的无政府党派联合了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刚看到巴黎的天主教会和劳动联合会的领导友好了起来，很快又听到某个教士竟然宣扬要绝对地主张工人罢工的权利。《时报》也说："教士们拥护和散播着最放纵的、最具破坏力的、最反社会的理论，由此可以知道，群众需求的呼声，不但在最激进的社会党人之间扩散着，连身为社会体制支柱的保守派也同样深受影响了。"《时报》又说道："只要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保守党宁愿对破坏活动进行援助。然而如果他们想在这种破坏行为中，窃取政治利益，那只能是虚妄，只能是幻想。工会和革命党人或许觉得利用他们是有价值的，但是给予他们利益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社会骚乱在扩散的最明显的一个反映，是反爱国主义的言论的扩散。内阁成员们在演讲时不但大加赞扬小学和大学的教师，还将他们称为当今时代的代表，同时鼓吹反爱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还说艾尔维氏主义所提出的主张在法国是一种例外。我们都知道，掩盖危害并不能将危害除掉。潘伽烈对此危害曾经说过："艾尔维是一个糊涂而狂妄的人，只知一意孤行。但是，只要稍加留心人们在大会上发表的言论，我们就会忧心地知道，他的主张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他不过是个代表。"

当艾尔维在发表着亵渎神灵的言论的时候，白贝在德国议会上发言说："假

若有人侵犯进攻德国，而且事关德国的生存大计，我敢说所有的党员，不管男女老幼都会拿起武器去抗击敌人。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国啊，为了保卫它，我们万死不辞，我敢向在座的各位发誓。”让我们做一对比，两种言说，一个来自德国社会党人，一个来自法国革命党人，却有天壤之别，叫人不禁回想起埃德加基内的话：“如果法国把自己的土地当成各党派可以实现大同的地方，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所有异族的欺压，最终难以维持直至灭亡。”

第二章 犯罪的发展

一

犯罪行为的增多，是社会骚乱不断加重和扩展的后果之一。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议会对犯罪行为进行讨论的记录。发表演说的人当然有着不低于普通人的智慧，但是如果专门以情感为标尺的话，他所说的就都成了无稽之谈。我们所看到的可以是同一些人的集合，却可以由此得到相反的结论来。

为了对杀人犯实施保护，同时又不妨碍执法人员执行任务，他们找到了很多理由。甚至像某个社会党人所说的："如果民众不再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制，而自由地生活在阳光下，那么犯罪行为就会消失了。"出于这个理由，他认为就只好废除死刑了。以下我将列举出下议院反对死刑的主张：

死刑保护不了我们的社会，它惩治的人，原本就都是没有责任感的。

死刑既然不能够使人弃恶向善，也就无法起到警示的作用。

死刑的设立是社会的一种罪恶，因为没有人拥有结束他人的生命的权利。

死刑的逻辑只有用复仇的观念才解释得通。

被押往断头台的大多数都是疯子，如果还没有查明是否疯癫，就武断地

将他人砍头，还不如毁掉断头机。

死刑对执行人的侮辱比被执行人的侮辱更重。

在任何一个国家，死刑的执行，都不曾表现出遏制犯罪行为的作用。

以上列出的这些理由中，值得注意一下的只有最后一条，它出自白里安总长之口。他为了自己的主张付出了很多苦心，但是不仅没能使别人听信，也许连他自己都存有怀疑。想要证明死刑是降低不了犯罪率的，可以列出很多数据，这些数据很明确，可是实在让人叹息。过去的五年中，犯罪率是成倍地增长的，其中仅谋杀这一项就增长了 30%。我把下院司法改革委员长的书面报告节录在这里，只是就重大犯罪行为的发成总数而言，而不是针对被判决的案件。1901 年，795 件；1905 年，1313 件；1907 年，1434 件。从这个事实上来看，自废除了死刑以来，犯罪行为的发生是有增无减的。由于很清楚自己不会被处死刑，所以杀人的人无所畏惧地去实施重大的罪行。

各个郡的议会看到犯罪行为的增加，都纷纷要求政府维持和执行死刑，除了三会以外。前委员长所说的话，已经很明确地讲出了罪犯对死刑的畏惧之心。他所根据的是罪犯的口供证据、历届警长的看法和辩护律师的观点。家畜贩卖商凶手勒特洛提供的口供，证明了罪犯在杀人时是很清楚自己不会处以断头之刑的。口供是这样说的：“我已经知道我犯罪之后会受到的惩罚，只不过是被发配到新岛或者基阳，然后我会受教育，从而成为纯良的犯人，再过个一两年就可以成为政府的官吏。不出 10 年我就能拥有自己的耕地，开始享受在法国享受不到的幸福生活。”

死刑在其他国家的影响也相当显著。在瑞士，死刑过去已经被废除了，而今天有十项又被重新施行了。此外，由于杀人与故意杀人两者很难清晰地区别开来，被害人都是死亡，所以，前委员长主张消除两者的区别。匪徒杀人简直是以杀人为乐，虽然不是预谋的，但与故意杀人的目的是一样的，因

此二者确实没差别。而司法总长白里安却主张将二者区别对待。如果换成我是总长，我必定会保持沉默的。因为被议员们鼓掌赞同的事情，委员长白尼的态度不是可想而知吗，何必白费口舌呢？

二

暂且不谈这些研究了，我尝试来论述一下这问题的根本，还有议员们的演讲的起因是什么。起因是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地困扰了刑罚问题 50 年了，但到今天已经相当明晰。责任是相对于人的自由意志而言的。自由意志的存在是不为当今的博学家和哲学家所相信的。从这一点看来，罪犯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似乎不必承担责任，从哲学的角度看，固然可以逃脱责任，但是从社会的角度而言，他们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想要在社会上生存，是要懂得自我保护的。没必要去评估那些关于道德的烦琐言辞，杀人犯们具有的是匪徒的心理，而不是巴斯德（法国著名化学家，擅长研究传染病）的心理。匪徒的名望与巴斯德的固然不同，这不是匪徒的错。怎能让羊去承担羊的责任呢？既然它是羊，那必然要被屠夫宰杀。长期以来，人们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社会责任和哲学角度的无责任，究竟区别何在。有很多研究大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比如 1907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疯病专治医师研讨会。

现在我把古尔蒙所收集的观点的概要节录在下："不管罪犯是疯还是半疯，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一旦违反社会规则犯了罪，就必须受到惩罚。那种在精神上承担责任的思想我们应该摒弃，要保留社会责任的观念。罪犯不管是不是蓄意，既然他已经给社会造成危害了，就要被隔离到社会外面去。社会责任是任何人都不可以逃脱的，没有了社会责任，还何谈文明呢。"

研究刑法的专家加洛法罗说："我们的刑法条例从过去到今天，一直是

随着自由和精神责任的思想而逐渐增加的，这是一种错误，要改正过来。要知道，是没有人能够拥有自由的，我们对罪犯的惩治不应该以自由的程度为标尺和限度，而是应该把社会利益作为标尺，来判定罪行的危害和处以惩罚。”

巴德医生的观点更激烈，他说：“如果我是立法者，我给半疯的罪犯加刑，因为他们才是罪犯中最具危险性的人。”

几乎全部医生都一致主张要摒弃精神责任的观念，全都认为有必要让犯人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并且还主张对惩罚罪犯这件事给予严厉的重视。

这不仅是医生们和刑法专家们的主张，法介也说：“凶手索莱扬只需承担精神上的责任吗？这是错误的，那样的话他与不负责任的狗还有差别吗？他没有罪，但却是最具危险性的人。只有具有特殊的脊髓，才能去做索莱扬所做的事情。正因为他的脊髓特殊，才更应该断裂。如果面对的只是一位可怜的病人，我又能说什么呢？但是如果他的病使他杀害了自己的同类，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还要让他延续生命了。死刑在我看来，是一种挺合适的惩罚。一方面能把凶手消灭，另一方面又能威慑其他罪犯。所以，我主张要对犯人实行严惩，特别是对那些有病的犯人，因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我坚信死刑的威慑对于某些病人是有疗效的。死刑会让大多数的败类、半疯的人、酒鬼、神经紊乱的人感到对惩罚的畏惧，刑罚越严酷，他们就会越畏惧。”

断头机的使用，对于有一种卑贱的人是绝对必要的，尽管现在暂时还没启用。我说的这卑贱的人就是属县的匪徒，他们以杀人为娱乐，多次地伤害那些晚归的游人，和偶然遇见的妇女儿童。他们被逮捕之后，不过是受几个月的监禁，一出狱就会重新犯罪。这种想杀人的嗜好和需求，如果受不到严厉惩治的话，必定会愈加嚣张的。因为这是从原始时期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余烬，是可以常常复燃的。开化的人和半开化的人进行打猎的行为，无非也是为了满足与之相同的需求。有一位热爱打猎的有名的法官，他就讲过猎人和杀人狂在心理上的相类似，只不过他们的野蛮本性所施加的生命对象不

同罢了。打猎者也会为没有仁慈心的杀戮行为而真诚地感到痛心和懊悔。但是最残忍之处在于他们把杀戮当作极大的乐趣。比如无法自我控制地去杀死美丽的可以观赏的鸟儿，和无法自控地使无辜的生命流出鲜血。他们的弱点由此可见。而匪徒杀人也感到极大的快乐，他们也和打猎者一样地无法自我控制。倘若我们不把匪徒除掉，他们必定就会除掉我们。

下面来谈一谈医生们和刑法专家们这几年来的观念变化。不久之前，所有的罪犯都被认定为不用承担责任而应该接受治疗的人，而现在又被认为是社会的祸水，要完全承担责任。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人们如今认为简单的监禁根本没什么作用，开始要求严格地执行法典条例。如果因为他们康复了就放走他们，那他们肯定会再次犯罪。至于我，我赞同新的施加惩罚的主张，并希望把各种各样的多次犯罪的人包括在惩罚之内。从前我发表在哲学期刊上的观点正好能用上。我曾经说过，一切的罪犯都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我的结论是：第一，应该对那些非有意犯罪的人实行身体的惩罚；第二，应该把那些经常犯罪的人发配到最偏远的地区，这是一种可以使危险远离的办法，如同过去对麻风病患者的做法。更进一步，可以将他们编制成为有纪律性的队伍，去非洲中部修铁路或铺马路。死刑由于并不常用，所以它的影响是很小的。

三

下面来研究一下我们刑法的制定的问题，这是个重要问题，议会也研讨过。尽管死刑的判处每年都有，也没能够遏制犯罪行为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且由于蓄意杀人罪和杀人罪数量不多，我们要研究的是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

看守所和监狱是我们仅有的两个惩治罪犯的地方，而我们的人道主义思

想已然把看守所变作了别墅，把监狱变作了豪华套间。最近有个总检察官跟我说，下层的中产阶级都享受不到现在的典范监狱的优越条件，比如电灯、管道供暖、热水、浴室和树荫下的花园那样的自然风景。有的人故意去犯罪，只是为了冬天里来此享受 6 个月的舒服日子。除了没有什么自由，这监牢里在物质上要什么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是英国的刑罚方式，他们的刑法制定得虽简单但极其严厉，最注重的是给罪犯的精神造成大的影响，用在监狱里的只有九尾鞭和苦差。

他们的方法迅速地降低了犯罪率，兰卡新说：“伦敦以前也是有匪徒的，但是他们自从遭受了苦役和鞭打之后，不到几个星期就绝迹了，而巴黎至今还有 3 万名之多的匪徒。”又说：“因为是跟英国刑法相反的一种刑法在影响着巴黎。”换而言之是因为那些无赖之人往往得到法官和检察官的饶恕，头天晚上被抓，九成又在第二天早上被放走，他们受到的只是长辈的说教一样的谴责罢了。对比一下这两种方式，一是施加皮肉之刑，一是使状况更恶化的姑息纵容。哪个更合适是显而易见的，对惩治犯人真正有效果的只有是施加肉刑。1905 年丹麦发生很多抢劫杀人的事件，但在重新实施鞭打的刑罚之后就一下被遏制住了。

拉伽山教授总结道：“英国的肉刑试验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效果，我们认为要予以采用，这种刑罚方式不仅是有力度的，也比较干净。鞭打造成的疼痛，相比于长时间的关押，会起到更强的效力。”

如果对罪犯的惩治既起不到作用，又缺乏力度，那么犯罪行为势必只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那种所谓的仁慈的法律，事实上有着极其凶险的性质。不计其数的青年人被劳动法阻隔到工厂外面，这些无业的游荡者，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匪徒或嫖客。除此之外，杀人之后受惩不重，进监狱之后的优越的条件，这些都在促使犯罪行为增加。

最近在巴黎自治会召开的会议上，两位议员讲述了晚上遭遇匪徒抢劫的

经历，警察总监莱派恩对此回应说，由于法官太软弱，又常常有大赦令的颁布，所以都没办法对罪犯实施惩治了。他又总结道：“被鼓吹了好几年的人道主义，如今终于看到了‘效果’了。”

出现了病症，人们才会去想办法去治疗。同样，感情用事的不理智之人，必定需要经受一些教训才清醒。当将来有一天所有的大城市都被劫匪和杀人犯洗劫一空，当郊外成为匪徒专门抢夺汽车的地方，当我们只有全副武装才敢走在巴黎夜晚的大街上，真到那时就该反省我们的预防措施了。既然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如何惩治罪犯，那么个人也必须要想一想如何来自我保护了，那样群众就可以自己去惩治罪犯。私下的刑罚，正如下院委员会的报告所说：“群众对罪犯的制裁，是情绪激动的、暴力的、简单的，有时也是盲目的。如果政府把惩恶扬善和判处死刑的权力转交给无法承担责任的群众，那么政府也脱不了罪责。如果让群众以为他们拿起武器自主惩治罪犯的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么政府的罪责就大了。”

胆小无能的法官由于害怕被犯人报复，不敢对其施以严厉惩罚，只敢去狠狠地惩治被无耻的警士抓来的妇女，而她们只是犯了很小的罪又无法自我防卫。有个法官曾对报社的人说：“你们就知道评论诉讼程序，却不去谈惩罚措施。刑罚的力度已经被降低了 50% 了，你们知道吗？实行假释和缩短关押时间是会削减我们法庭的行动力的，你们知道吗？屡次重犯的行为也越来越多了，而流放发配的刑罚手段从未被执行过。你们认为借用英国那一套诉讼的程序就行了，而事实上最该采用的是他们实施的苦役和鞭打的刑罚手段。严惩罪犯是不需要有怜悯之心的，这种怜悯只会使官方的权力变得更弱。在英国，警察不带任何武器就能独自行动在伦敦的街头，而我们的警察呢，除非全副武装地集体行动，不然都不敢出巡。照这种情形，在我们用残酷的惩罚把犯罪行为清除之前，我们根本就谈不上诉讼程序。”

唯有严酷的惩治措施，才能够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麦克斯韦在《犯罪

与社会》一书说即使是疯子也必须用惩治来威慑，讲的是同样的意思。

四

在对罪犯实施应有的惩治之前，我们先要治好民众的人道主义的病，还要消除法庭的畏惧心理。这些病是有希望治好的，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了，尽管还很不够。

最近有一位警察被罪犯杀害了，自治会长在烈士的葬礼上发言说："那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理论所造成的危害，比罪犯的危害更甚。各方的力量都被影响得麻木和软弱了。鉴于这种现状，必须要抵制人道主义理论。"他持有跟我一样的建议，尽管今天人道主义仍旧在不断扩散。将屡次犯罪的犯人编制参军，又是它危害的表现之一。仅在第82军团当中，罪犯就不少于100人。1909年12月28日的《日报》曾评论到它的不良影响："从10月份以来，蒙达尼居民就目睹了两起史无前例的异常猖獗的盗窃案，其中一起发生在上尉家中，只是纯粹的偷窃，另一起则是发生在居民家中的杀人案，凶手是两名士兵。8天前，其中一个被警察发现已溺死在了运河里，据说是被同伙害死的。这就是将罪犯编进军队的后果。倘若没有舆论的抵制，这条危险的法令会彻底毁掉我们的军队。"

下议院议员索迈也认为肉刑的实施是有必要的，要以此来遏制犯罪率的增长，他说："我不惜去惹怒那些怜悯心过重的人，我要大胆地主张对罪犯要实行肉刑的惩治。不能只是空谈一些哲理，而要先来解决生活的问题。关键不是研究罪犯有没有责任，关键在于要看到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我想在这一点上，没有人会不赞成。没有哪一天不出现野蛮的抢劫、暗杀和谋杀事件，而罪犯和凶手无不是年轻人，当被问到为何要犯罪的时候，得到的答案不过

是为了显示英勇，或者仅为追求刺激的感受。分析这些心理很容易，这些犯罪的人不过是些懒惰无业的人，或者想表现自身的人。他们不去工厂工作挣钱，而是被娼妓养活着。他们在夜店穿梭，在特殊的环境中将自己的勇气显示给同类看。很多时候，他们是为了偷窃而杀害他人，并且往往是以此为荣耀。他们常常把杀人作为一次赌注说：‘赌一瓶酒，我会把刚才看见的那人干掉。’赌约一成，就会有一个无辜的人将惨遭伤害。在惩治的时候，要先想一想这些人的心理特点。想要使惩治真正有效，就不该反而让惩治去增加想要的荣耀。肉刑之所以合适，是因为能对人造成折磨和羞辱，罪犯也许能够忍耐发配或者砍头，但却难以忍受被鞭打 10 到 20 次。实施肉刑惩罚是保护善人和惩治恶人的手段，反对它的人想必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现在又有了为罪犯做辩解的人。有个女博士在报纸上发表了对罪犯的观点，她说：“名誉只是富人的保护伞，工人只会厌恶它，而罪犯用它来娱乐自己。”还会有和这一样的谬论吗？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让罪犯遭受鞭打和苦役，还有看砍头的惩治，而不是让他们去新岛享受别墅，或在温暖的监牢里享福。如果真能实施的话，巴黎的匪徒就会在几周之内得到清除。到那时，我们的立法者们就会明白人道主义是最具危害性的，是愚蠢的，它也是国家衰落的根源。

第三章　政治暗杀

政治暗杀事件在今日已经司空见惯了，这也是当今社会的骚乱状况的一种表现。民众觉得这种事情非常恐怖，又感到非常不符合情理。不论是俄国皇帝、意大利国王、法国总统，还是葡萄牙的国王等，他们在被暗杀之后虽然有新的继承人被确立，可是由他们所代表的制度，却并没因此发生改变。并且事实上，这些暗杀事件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反动浪潮，反而使旧有制度的势力增强了。实施暗杀的人自己也没有想要去犯暗杀罪。这种很明显的现象，使得所有时兴的心理学学说都认为，犯罪行为的动机是个人的利益，比如为了复仇或者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除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我们竟然无从得知这种类型的政治犯罪到底动机何在。那么今日的心理学能够对此做出解释吗？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对几种思潮的散播的途径和它们的势力大小进行研究。

人类具有一种不可或缺的本能，那就是遵从一定的信念。我们的信仰来指引我们的生活，以此来避免在迷茫中徒劳。人们甘愿做思想的奴仆，而不是追求思想的自由。坚定不移的信仰是丝毫不会被理性所左右的。传道士们能够把谬误当成是真理。只要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们往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对这种半疯的人的研究，虽然属于精神病理学的范畴，但对于人类

历史而言，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研究。这类人是在天生就具有宗教信仰的群体中产生的，他们的特点就是必须要投入到一种信念中，并可以为之付出一切，并且有一种使他们所崇拜的东西得到胜利的愿望。他们幻想出了一个天堂一样的社会，与我们祖先生活的“天堂”相似。俄国的恐怖党和各个无政府党派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实例，值得我们去深究。这些思维简单的头脑秉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信念，并被这些信念掌控。他们希望能在地球上营造一个天堂，希望让神明来统治我们的国家，改善社会的不平等，而且要像上古的神明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散播这种思想的人并没有理解它，更没有了解事实的情况和现实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却不得不大加散播。由于被他们施加了影响的主要是群众，群众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它，他们有的只是能够彼此熏染的信念。这样一来，有种很大的危险性就蕴藏其中。

企图用理性去鼓动群众，是近代世界存在的最大错误。事实是，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只有肯定的和被不断地重复的言论，还有名望和熏陶。哪怕这些东西是有悖于其利益的，而且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一概不管。一种信念一旦被接纳了，哪怕是不合理的，也同样拥有强大的力量。世界上发生的骚乱现象，都是由于借着信仰的名号来反对理性而导致的。这个简明的道理，就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政治暗杀这种行为。这种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怒，却并不令我们吃惊。传播信仰的人为了信仰的传播，不惜毁灭企图阻挡他们的人，这是他们的特点，这种毁灭的欲望是传播之人必备的心理因素。若不是传道的人，也没必要去灭人毁物。传道的人则不惜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人，以使其信仰之敌灭亡。

炸弹被他们投掷到坐满观众的大剧院，或是热闹拥挤的街道上。他们认为这是在努力改良人类，是在追求真理，是在消除错误，在他们看来，为了这些目的即便是横尸遍野血流漂杵也在所不惜。这种传道的凶险之人，不全是产生在下层社会，也有一些是心理上无法接受在大学里受到的教育，从而

对这种信仰将信将疑的人。还有一些是心怀和平与博爱的理想从而抱着改革旧社会的想法的人。例如托尔可马达、拉瓦亚克、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他们总是自称为人类的朋友，从来只考虑人类的幸福问题，而且打算把生命都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龙布罗梭说："每个时代，都有疯子和博爱的人，哪怕是野蛮的时代也同样如此，那个时代他们都以宗教信仰为根基。后来他们投靠到党派之中，一开始是十字军，然后是反动党派，后来就变成了游侠骑士，直到最终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殉道。"

如果当今的拉丁民族中，出现了一个心怀博爱的人，那么他必定离不开充裕的社会经济基础。他引起为据的各种学说都是颇具争议和意义不明的。很多的人会对神学或形而上的抽象问题感到困惑，但是很少有人会被一个几何公式弄晕，也就是说，越是古怪新奇的观念越是能迷惑人，这也是政界中最常见不过的现象。而且那些被迷惑了的人，还往往有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今天，由于鼓吹无政府主义，而引发的政治暗杀事件非常多。比如说最近印度总长的一位副官就被一个印度的学生杀害了。这位学生之所以会有这种冲动行为，是受到报纸上的怂恿。报纸上大概是说："哪怕老朋友因此不再尊重我们了，我们也还是要反复申明：政治暗杀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暗杀犯并不是罪犯，而是为人道主义去复仇的人，一切思想自由的人、头脑没有成见的人都应该承认这一点。"

印度的孟加拉省，在一年内就发生了 329 起政治犯罪案件，这其中有很多的是普通盗窃案件。无政府党人、恐怖党人和其他组织的信徒们所制造的杀人事件，在 30 年里不断增加着，将来必定只会越来越多。从前被宗教所吸引的那些神秘人士和盲从之人，现在都转而向政治倾斜了。跟这些精神错乱的人大费口舌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把他们都消灭，否则被消灭的就将是我们自己。

第四章 宗教虐待

一

由宗教引起的怨恨情绪，是阻碍法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因素。政府经不住吵吵嚷嚷的党徒们的驱动，不得已而开始进行宗教虐待，而没人可以从这种虐待中获取利益。政府竟是如此不懂心理学，也不懂历史规律。

宗教虐待主要表现在政教分离法以及教会产业没收法的条文中。人们倘若不是被怨恨的情绪蒙蔽了眼睛，肯定不会给这种分离的条目投上赞同票的。颁布这些法令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剥削教徒们那微薄的、赖以生存的供奉之资。没有比这些法令措施更能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了。而教徒们其实不该一味地哭诉，因为这些法令也给予了他们一种自由和权力，得以使教会的权力摆脱政权的限制，这是连最虔诚的国王都没有勇气赐予他们的。从前只有政府有权力去指派并供养教长，现在由教皇任意地任命或进行世袭，还有比这更不合理的吗？更为拙劣的措施，是把最虔敬的教徒们赶出了教堂，毁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德国人在阿尔萨斯的时候就绝无这种拙劣的行径，而正是凭借了教徒们的势力，他们才得以悄然地侵略了阿尔萨斯。他们不但没有虐待教徒们，还大加款待，并大大增加了教徒的薪俸数额。由此可见他们的智慧，

也衬托出了我们的拙劣。让那些又贫穷又没有政治立场的教徒们把心交给国家，事实上很容易才对。我们却失去了这最显然的利益，因为缺乏远见而蒙昧。要知道对于看不见的权威势力，我们是不能施以野蛮攻击的。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小学都该教过的。

至于教会产业没收法令，它不仅反映出一种很拙劣的策略，也表现出一种蛮横的不公平。众所周知，这些法令的制定本来的目的是要夺得教会拥有的千万财富，并当做养老津贴发放给工人们，从而向他们拉票。但是所得到的收获，却只有工人们的怨恨情绪。因为千万财富不久就泡汤了，财产清理的结果仅仅是10万而已。而且，国家如今还要供养无数的救济会，它们从前是依赖于教会的供给的。在这过程中窃取了利益的，唯有清理教会财产的人和一些投机的人，这些人甚至借机成了暴发户。这些法令的主要提议者库姆斯也在媒体面前承认，执行这些法令的行为是具有强盗性质的。

我们看一看赫基司芒赛在上议院的报告，就能知道其中的黑暗之处。有一个清理人员清理出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产，而得到的法庭判决给他的酬劳就高达10万法郎，另一个清理人员凭28000法郎的财产就得到了10000法郎的酬劳。在尼斯，有个清理人员仅凭一些毫无价值的资产，竟然还得到了16000法郎的酬金。相比工业的资产持有者得到的利润，这些清理人员及其担保人所获取的财富还算是很小的呢。对于那些资产的拍卖并没有做明白的宣传，时间又是选在竞买者很少的时段的，竞争的人越少，最后获得的利润就越大。维莱纳在1909年12月14日召开的议会上讲的几个事例，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以这种方式把伍德修道院拍卖掉，260万法郎的标价使竞买到的人顷刻获得了800万法郎的利润。岛庵修道院的标价还不到原来价格的三分之一。圣心教堂拥有产业的总面积有5200平方米，然而标价仅仅是520万法郎，卖出的时候价格再怎么提高也还是不超过600万法郎的。但是如果是按照每平方

米 400 法郎的巴黎地价来算的话，100 法郎每平方米的售价，使竞买到的人至少得到 2000 万法郎的资金。

连当时在位的国务总理也觉得这种拍卖是不符合规矩的，他说："7 月末那段时间的竞买者很少，拍卖活动却定在那时候，而且宣传做得太欠缺了，司法总长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已把他的意见报告给了检察厅。检察官赞成他所说的话，并向汕郡的民事法庭提起诉讼，已经在法庭受理了。"连司法总长都承认了公开拍卖的徇私舞弊内幕和法庭的腐败行为。价值 800 万法郎的大沙尔特公司被以 50 万法郎的价格出售，竟然都没有人阻拦。后来由于受到舆论的谴责，才终止了另一场像盗窃一般的 500 万法郎总值的公开拍卖。那些被接收录用的教徒们，无不在遭受着困苦的境遇。可以想象，这些失去了救济金的人也许会不幸被饿死。

公报发表过一个演说，我转录在此："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质问国务总理，今后那些男女教徒们该由谁来奉养呢？怎样救济他们的生活所需呢？这些人已经没有了养老金和任何的资金来源。有一位 60 岁的老教士，现在是斯坦尼斯劳斯学校的监督人员，他连一块面包都吃不饱，不教课就活不下去了。我已经代他申请了 6 次养老金了。这个老教士已教了很久的课了，养老金是他理应得到的啊。这个学校有 200 万法郎的资金被政府窃取了，我们知道，教会的千万资产最开始是被拿去用来驱赶纯洁的女子和善良的人们。然而你们的初衷是做善事，是赈济穷人和保护儿童。但是你们却对我们国家最善良的人进行侵犯、剥削和驱逐，而把剥削来的钱用来供养恶人。你们知道你们要承担多大的罪责吗？"

与此类似的愤怒言论还有很多很多。不仅法国如此，别的国家也不例外。我把巴西某家报纸发表的一位候补总统的话拿来做一个代表："法国政府被教会具有的无形势力所迷惑了，对教会的迫害也越来越严厉了。20 世纪中期，在共和自由的氛围中，还出现了过分专制的现象。他们把教徒们驱逐出境，

送到美洲的专门接受海外被贬谪人员的收容所。美洲和平繁荣之后就不再有实施虐待的地方了。罗马教长去赴罗斯福的宴请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亲和的款待。”

“左倾”党派的议员同样是反对政府虐待教会的。拉伯里说：“20年来，宗教战争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现在有所谓的反对教会主义者们，他们并不是要防止教会涉政，其实是企图用信仰自由当掩护，去滥用权力。他们说要清除信仰宗教的人，而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却仍旧遵守着教规。既然他们自己都是信仰着宗教的，那又何苦装腔作势地反对呢？路易十四时期，天主教曾经被作为全国统一的宗教信仰，这给当时的法国社会造成了沉痛苦难。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家，在今天再次以政府的手段反对宗教信仰，企图达成人民精神上的统一。”

现在政府虐待宗教的行为，一定会遭后人谴责的，正如今天的我们评判着过去的宗教判决所和南特赦令的撤销。我们的领导人连所持的借口都跟过去是一样的，都说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精神与政治的统一。而造成的危害呢，也无异于过去的国王诏令造成的结果。

二

政府找到的唯一带有科学表征的驱逐教会的理由，就是教会所教授的学说都是错误的，需要最有文化的好教授来代为施教。这个理由，也不过是驱散教会的幌子罢了，它并不能为没收产业的行为做辩护的。

从近代心理学进化的角度来看，对于每一种信仰，我们是不可以评判它的理性价值的，而只能评判由它的鼓动所产生的行为。有不少新的宗教在美国产生了，有的取得了明显成果，人们对它的虔诚是看得到的。例如，摩门

教的信徒在荒原上建造了很多新的城市，其对美国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这种功利化的评判，是应该得到重视的。

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宗教信仰之中确实没有包含多少真理。可是历史经验则告诉我们，倘若不借助宗教信仰，大多数重要的文化就无法成型。只有宗教这种学说，才能在不含真理的情况下赋予人们自制和博爱的心。宗教信仰的力量应该得到很好的利用，而不是使之受破坏。一种宗教信仰如果虐待了其他的信仰，当然就要给予攻击，如果没有，那它就该受到善待。并且，宗教信仰可以给人创造出一种长远的希望。若没有宗教，人们还如何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失望呢。它所培养出的具有神明精神的信徒，事实上乃是人类的功臣啊。它的功勋和成就，是该受到思想家们的崇敬的。科学家在了解了宗教之后，现在也不再排斥它了，并承认它的巨大能量。过去，一个民族精神的稳定性是源于宗教信仰的，或许到将来就不一定了，但是，只要人们心中永远有希望，那么，宗教就永远不会灭亡。

第五章 社会斗争

一

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常年雾气不散，在世界上既名气很小，又地处偏远，所以没什么游人会去那里。但是向导跟我们介绍说，这个城市类似于威尼斯，虽然游客很少会长期留居这里，但是这里在过去是闻名遐迩的。偶然从这里经过的游客，曾见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那时候，古代的社会等级制度被颠覆了。泥瓦匠可以领年薪了，而从前的贵族人士变成了泥瓦匠，工程师们当起了电车司机，银行家们变成打扫街道的清洁工，法官去清理下水管道。而工人们则清闲下来，优哉游哉地在运河附近的大街上散步。是什么样的魔力造成了这些变化呢？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童话故事所说的，遍布在天空、大地和水面上的那种神秘的力量吗？不是的。神明的力量也不会如此强大，即便是奥丁神也无法制造出这些改变。造成这些改变的，是一种无形的、大而无敌的力量，那就是社会防御的需求。

有一个国际性的工会，权势十分强盛，劳动者们绝对地服从于它，于是它凭借自己的势力，用大罢工的形式向社会宣战。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感到了防御的必要性，而不能袖手旁观祖国的沦陷和工商业的衰亡，不能对那些

想用愚昧来使社会进步的下等人坐视不管。中产阶级凭借着他们的自主性和勇气，没有向国家寻求帮助，而自发地取代了工商界。经过了长达 3 个月的斗争之后，大罢工以失败告终。社会从此不再受工会的约束了。通过这一次英勇的防御斗争，瑞典为人类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它教会了那些不知反抗的国家政府如何去防御。

这次罢工事件也让我们知道了，使我们受到了威胁的这种社会危害，是由无数的人道主义者造成的。瑞典有家很重要的报纸说："这次罢工的结果是社会党被瓦解了。换而言之就是，我们国民中的六分之五，现在结为了一个紧密的集体，一起坚决地反对社会党造成的危害。"想要实施防御，厂主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还需要舆论提供支持。对中产阶级进行技术培训，也是防御的一种重要武器。在乡下居住的中产阶级，应该基本掌握锯、旋、刨、焊接、锻打和冶炼等技术。瑞典所具备的这些，都是我们法国所缺乏的。与此相反，法国所具有的忍让的个性，则是瑞典所不具备的。法国的中产阶级如果还是不联合起来进行自我防御的话，将来他们必定会遭到剥削，最终会被消灭。洛桑说："生在这个时代，用争辩、屈膝和软弱去对待一个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对它显示出强悍才对。不信的话，请看一看工人们吧，他们不仅联合起来了，而且表现得相当强硬。再看看中产阶级、工业家和商人们，他们不仅如一盘散沙，还软弱无力的。所以美国前总统才把他们叫作'软型'的人。"

二

与邮政官员造反和希腊士兵叛乱相似，这些大罢工行动的起因看似都不一样，但都是相同的心理规律所导致的结果。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每个

民族、每个时代，都是如此。

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这种心理规律。在一个社会中，一旦有一类人由于某种原因发现了自身势力在扩张，便会想要把握优势，去制服其他的人。最初的一点优势，可以使之实现最终的征服。当构成社会的各个元素之间失去了平衡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这种现象。一个民族的生存和个人的生活是一样的，只有各方面均衡协调，才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一旦协调被打破了，就会有病症。如果让骚乱一直存在下去，是可以导致死亡的。一个社会得了病，就跟一个人得了病一样。如果把社会病理学编成书，一定是巨著。理想主义学者提出了治疗方案，数量非常多，但是很少有学者能针对病症的病源。看一看历史上已发生的，掌握优势的阶级征服其他阶级的那些实例，就是这种规律的明证。罗马在世界上耀武扬威，靠的是军队的力量。等到与军队势均力敌的元老院被皇帝剥夺了权力之后，军队就成了统治力量。到罗马帝国的末期，创造恺撒的权力全都被军队所掌握了。

后世同样的征服行为，也都是由在社会上占有优势的一方来执行，跟封建王朝社会一样。如果优势太大了，就打破了对立的阶级之间势力的平衡，这能够导致灭亡。法国封建王朝之所以灭亡，就是不懂得保持势力均衡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我们需要保持社会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能压制这一种而张扬另一种，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封建王朝不懂这个原则，所以灭亡了，我们共和国如果也不懂，那么也会灭亡，只要我们放任新的势力在我们眼前继续扩张，就会的，而新的势力就是劳动联合会的官员们的势力。谁的力量占据了优势，谁就能够变成唯一的主人。这个普遍的规律，不断地被证实着。希腊的例子，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明证。因为希腊放任了军队官员的势力扩张，所以导致了一种真正的军人独裁制度的建立。

三

那些人道主义的没用的说辞，和对叛乱的一再妥协，如今对我们都毫无帮助。我们的敌人有很明确的制造破坏的行动纲领，一旦我们在斗争中失败了，他们绝不会给予我们恩惠和希望。

有位致命的作家说："革命的工会主义，已经站在反对军队、反对的祖国的立场上了。"巴黎社会党的一个下院议员在演说时，怂恿在军队里服兵役的年轻人，让他们仿效巴塞罗那的工人去抵制上级的命令，去反对军事官厅。

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已经严肃地向现有社会秩序提出了斗争宣言，聚拢到他们的红旗下的，有下议院的议员，有很多的官员，还有小学教师。出于一种可悲的怜悯心，中产阶级的富人们想要跟他们谈判议和。他们这种可鄙的软弱，足以提升敌人斗争的胆量。在当前的斗争情境中，我们除了选择去打败敌人或者在战斗中牺牲自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谈判求和并不能避免失败，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今人的羞辱和子孙后代的蔑视罢了。现在革命的社会党人的战术很简单，就是用反复的威胁，来实现他们的需求。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畏惧的心理是议会进行决议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他们决定的议案所具有的危险性，我也在前文说得很清楚了。

四

可以被我们看得见的现象，往往是受到无形的力量指引的结果。但我们只知道形成的效果，却不去想其中的原因。这种无形的力量不仅是我们行为的鼓动力，也在事后为我们提供了辩解的理由，这一点很适用于那些只相信情感的人，政客们也不例外，因为他们除了情感也没什么可相信的了。他们

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所给出的理由，跟鼓动行为的理由不一样，因为鼓动行为的理由是微小的，而且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很少有人意识到。

在这个时代里，学者的主动性不高，政客的主动性也高不到哪里去。我们的领导者在这30年里有两个原动力：一是对选民的畏惧心理；二是想办法取悦他们的选民，而虐待少数人的信仰。哪怕“少数人”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无所谓。

第二种原动力也是很显然的，各种方式的虐待是用来维持内阁的武器。有报纸就曾说：“瓦尔德克卢梭的内阁，依凭反对教会的法律维持了三年；库姆斯内阁，通过封禁学校和驱逐教师，也维持了三年；卢伟耶内阁也借助教会国家分离法来自保，它的做法是把从教会那里得到的资财，发放给平民，以此平抚平民的怨气。”

五

我们的未来，是由还正在成长的青年人决定的，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过去的青年人，如今目睹和面对着社会生活的衰落和积存的弊端，目睹了从前的信仰的消失和古代的社会制度的瓦解。也看到了旧的贵族阶级家庭产业的破败和祖国军队的解体。他们已经丧失了所有值得去期待的理想，已经确信了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尽管知道自己是有上进心的。他们个性的棱棱角角逐渐地被磨掉，迫不得已地开始顺从地忍耐虐待和暴力。

这种消极被动的态度，更加助长了革命党人的野心，他们贪婪地只想着剥夺别人辛勤赚得的财富。不幸的命运，如果冲破阻挡而取代了好的命运，就会强大得让人无法解脱。中产阶级的青年人，现在确实是精英人才，他们掌握着科学事业、工业、文学和美术。但是缺少个性的人才，是成不了真正

的精英的。罗马的青年才俊们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末期，也是相当机智的，但是他们缺失了坚毅的品质，因此没能够用坚定的意志去抵抗野蛮民族的贪婪野心。领导阶层如果也逐渐被牵制的话，那他们也不久就会灭亡了。

将来的战争，在表面上看来是经济竞争之战，没有错，但同时也是彼此信念的一种较量。换而言之，将来的战争是由信念所引发的情感之战。民族情感是各种情感的集合体，它构成了国民的性格。它的演变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尽管一些时代已经目睹了它的几次变化历程。法国的教育方式委实有很大的危害，不过一旦可以变更一下形式，还是可以在一百年之内完成改造的。德国的学校虽然无法打败敌人，但可以培养出战胜敌人的心理品质。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就是在改变它历史的走向。

第六章　近代命运说以及命运的分析

一

对一个时代的命运的认知取决于对指导这个时代意志和决定其行为的主要观念的研究。但是在研究之前该去何处探寻这种观念呢？去群众中探寻吗？那是徒劳的。因为群众只有嗜好和欲望，却缺乏思想。去书中或者是演说的学者中探寻吗？那亦是徒劳的。因为这些展现给我们的仅仅是通过引人注目的方式引起读者关注及引发舆论。

如前所述，探寻一个时代的观念是如此的困难，但是我们如果从最受人称许的师长的传授中探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的。了解一下近期学院的讲座，例如拉维斯和皮埃尔洛蒂的演讲，我们就可以得知青年的精神领袖所关注的方向。这类演讲的主旨在于宣传在任何处境下都不要悲观，却起不到劝慰勉励的作用。而最让人无法置信的是，它们宣扬的是一种以神秘的命运为中心的理论，试图说明之前最深刻的思想家也逃不过黑暗的命运，继而要求人们对现状一味地忍耐和服从，尽管这种努力是无用的，但还是要深信不疑。但荒谬的是，不仅教授和学院学员中流传着这种命运之说，当代的政治家言论中也包含着这样的观点。前总统卢贝说：“不可抗拒的力量掌控着人类的意志，

一种神秘的理论引导着我们。”而关于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神秘理论的构成要素将在后文一一说明。

在之前提到的学院学员中，罗蒂表现出最深切的忧虑。他谴责社会及自然科学的无能，谴责其不能对“真正的原委”进行解释。他这样说：“我们今天无从得知，将来也一定无从得知何为真正的科学。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旧日那种对解说的自信，每当有人发现了某件事物的原因或者道理，就好像打破了一重铁门，走进了一条黑暗可怕的幽径，又来到另一扇更可怕更严密封锁的门前。越向前进，秘密就越多，黑暗就越发浓厚，我们也就愈发惊恐。与此同时，基督教低沉的蛊惑还在我们心中余音未绝。我们明知如此不可为，却又自欺欺人地说，真理或许就栖居在这不可理解之处。”这个著名的演说家既不相信科学的解说，也不相信人为的努力可以抵制现状的威胁，所以他又说：“没有战争可以反对破坏一切、平均一切的风潮。”

对于这些评价我持怀疑态度。恰恰相反，我认为个人及个人地位的不平衡程度是随着文明进步的程度而加深的。因为科学及技术越趋向高端，学者与愚人的心理、工程师与工人的心理相距就会越远。表面看来，均衡度似乎在逐渐加大，但从整个人类的范围来看，均衡度则在日益减少。这是任何暴力行为都不能改变的。

而拉维斯的命运说的悲观程度与罗蒂不相上下。在他为接待潘伽烈进入学院所做的演讲中曾说道：“若是你相信几个老旧的简略的原则仍然可以在今天的政治中给人类以指导，那么我很为你担忧。”但是拉维斯没有提及新的原则，那是因为他尚未领悟这些。他还说：“因为本能的嗜好和欲望观念，民治主义者开始骚动，整个国家及社会都处在危险之中。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什么是他们想要得到的，而没有人能够对未来城市的计划提出建议。法律和道德这两根城市的支柱因为妨碍了他们而受到攻击，现在正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世界各国将来必须在军事消费和社会建设消费中做一个抉择，这

一时刻正在迫近。这将会让两类世界的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遇，也就意味着繁盛时代的到来。”

关于这种观点，前人已不乏论述，古往今来，许多民族，诸如雅典、罗马、佛罗伦萨等，都已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而相似的阐述亦已有之，其解决办法更是相同。虽然蛮夷之族的名称不尽相同，但无论对内对外，与其战争是必然的选择。而战争所挑战的底线不过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的忍耐度而已。看看今天拉丁族的和平派、社会党和大学学员，再结合拉维斯的理论，“繁盛的时代”或许有出现的可能。每个时代都有末日，而这个末日则从全副武装的强国劫掠手无寸铁的弱国开始。但这一可悲的事实往往被人道主义的梦想湮没了。

我们之前讲述的悲观命运说及倾向性，不只存在于学院的学员中，亦存在于教育界之中。没有选择忍受派的教授，今天已渐趋激愤。投身为革命领导者的亦不在少数。当今的拉丁教育家大多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命运的忍受者，一种则是激愤者。提倡革命不过是在酝酿一时的暴乱，命运之说却因其时间的长度有着更深远的危害。命运说被认为是懦弱者的宗教，它们表面依附于科学，实际则是狐假虎威。

二

命运之说是由宗教学家和经学家所传承讲授的古代世界观的遗留：代表着一切事物的最高点，有着制服人神的无上权力，就是古人所谓的命运。没有任何人能够违抗命运的安排。神明告诉俄狄浦斯，“你应该杀死你的父亲、娶你的母亲”，俄狄浦斯虽然不愿听从，但却在冥冥之中遵循了神谕，没有逃脱过命运的安排。

命运之说被各种宗教继承，今天很多新宗教派别仍然崇奉宿命论。根据宿命论的观点，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预设好一切，哪种人应该升入天堂，哪种人应该打入地狱。

而现今的科学有因果关系的说法，持宿命论观点的人用这种说法来为源远流长的宿命之说寻找依据。其实因果关系和宿命说完全不同，因果关系是解说某种现象是之前种种原因的必然结果，因循反复，在这个循环中，没有能够掌控一切的力量。古人不明白自然界中万物相生的道理，就把这些奉为神道，祈祷则成为祝愿神道昌明最流行的方式。其实因果关系最反对的就是外在力量的干涉。宿命论的定义和因果关系又不一样，因果关系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大多数命运是掌控在人手中的。

应该任凭形而上学的学者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哲学中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只用现实中的实际就可以证明所谓宿命不过是愚昧的集合，而如果知道构成宿命论的要素，那么宿命论就会立即消亡。

三

命运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无法避免的命运，比如老年、气候、星体运行等。我们最多也不过是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进行预测，进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预防。第二种是可以避免的命运，到科学进步到可以解析出各种元素，并一一加以有效针对的时候，就可以免除一些命运，比如旧时大规模的瘟疫之类。第三种是人造的命运，这种命运在历史中比比皆是，要想有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形成，结果自然不可避免。如果想有所改变，唯一的办法是用其主要作用的原因去抵消起次要作用的原因。这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原因。

从科学对外部现象的研究进程可知，过去认为不能避免的命运，如今已经有了解决办法。比如在40年前的巴黎医院，截肢的人不几天就会死亡。又如疟疾或者是黄热病，过去也被某些地方的人认为是根本无法医治的。但是，在今天，这种命运完全可以避免。解毒的方法发明之后，截肢的人就可以生存。而疟疾和黄热病的病因则是血细胞被细菌侵入，而侵入的途径是通过携带病菌的蚊虫叮咬。因此，人们也就发现了治愈这种病症的方法。最开始的时候，只能是治愈病症而已。但后来人们发现蚊虫的滋生地是沼泽和积水，于是对地貌进行改造，从而根治了病源。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以前疫病横生，但是现在在那里居住却完全不用担心有这种风险，疫病的命运已经可以避免。对鼠疫的研究同样如此，在此之前，有2500万人死于此病。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了解，死亡的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着致病细菌。同样，人们也已经研究出办法来消除非洲各地的疟疾。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曾在荷兰肆虐的海啸灾害，如今已经彻底地根治了。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的沙地、勃兰登堡的沼泽如今已成为茂密的森林和丰饶的土地。征服自然的人之所以能够战胜命运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困难罢了。

四

之前所述自然命运的规避同样适用于历史的命运。这种人为的命运维系了种族的繁衍及政治的延续。它的影响深远，但是仍属于元素分解消除的范围。多个历史事件证明了这一学说。以1870年战争为例，如果对这次战争的心理远因和近因进行观察分析，那么就会发现尽管战败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智者及时把各种萌芽扼杀，那么战争就不会如此沉重。今日的心理错误及未来的

不可预测性是后世命运的开端。50 年前被君主、近臣制造的命运不在少数，而相似的错误在日俄战争中又一次出现。俄国人的心理比日本人飞更加愚昧，这就是战败的原因。

我们周围的人为命运是很多的，比如酗酒的危害。征兵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有酗酒的家族遗传史。对于这种命运，我们不仅没设法控制，而且因为恐怕达不到国家财政预算，还加以鼓励。我们炮制的命运就会如滚雪球一般势力越来越大，最终没有办法分解。看看前任商务总长克吕比的新作中的例子就知道了。在他的书中，有权力的总长竟然不敢对他所管辖部门进行改革，唯有坐视其乱。笔者将政务混乱的事件一一列举，如部员间长期的争执、责任的混杂、命令不一、机关老化等，居然没有办法指挥安排。笔者在职两年，不仅没完成一件有意义的改革，而且还不知道它的原因，声称救济的办法在于运用“选举改革来改变民治的道德”。这位总长没有认识到事物的实际力量是什么，治理弊端的前提是认清弊端。

情感的命运是命运中最可怕的结果。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法国的大危害之一，根源就在于此。它侵蚀了社会的基础。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很多酝酿可怕的革命的法律都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将罪犯编制到军队中亦是出于人道主义，而对他们进行优待，让他们在监狱中享受比工人还优越的安逸生活也是出于人道主义。

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行径，杀人犯增加了两倍。而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就不能判犯人死刑。人道主义者使民族堕落的时候就是祸患聚集的时候，比如大革命之前。而人道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景象就是被屠杀尸体的聚集。鼠疫固然可怕，但是人道主义者更为可怕。他们不但不能推动进步，而且妨碍进步，扼杀了自主。

五

用心理知识对命运进行分解简单而明显。在前面我已经用这种观点对前外交部部长阿诺托表示了质疑。他说政治家是不需要具备知识的。政治心理学不仅引领人对抗阻碍民族生活的命运，而且教人引领当代的人来运筹帷幄。很多著名政治家如黎塞留、凯沃尔、俾斯麦、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等，他们不但懂得治理国家，而且能够解析历史命运的元素。这种杰出的人往往对心理元素操控得十分精准。他们能够应对各个时代的宗教、社会、经济等的需要，明辨无法避免的命运和可以避免的命运。政治心理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不为无益的战争作消耗。

虽然我们对意志之外的命运无能为力，但是具有更高智慧的人却能对它加以利用，就像航海者利用风向一样。例如德国人不会反对较高的生产力和较强的竞争力，而是利用它们创立了生产者联合会。而我们对这种集中工业的需要不能理解却用法律对它加以反对。由此对比，高下立判。如果不能对发生的自然规则的命运加以利用，反而与它对立，那么就一定会危及后世。命运的创造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和影响。今天的人大多数已经遗忘了 1870 年那场战争，但是它的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在财政方面，我们每年支付的 450 万法郎的费用就是这场战争所耗费的 1.5 亿法郎资金的利息。而根据郭色利计算，这次战败所导致的其他后果，再加上军事及武装费用的消耗，40 年来共耗费 5.3 亿法郎。这种因为缺乏远见而累及后人的政治家还少吗？因此如今对未来的政治家稍稍预测一下是非常值得的，但可惜的是他们人数并不多。

不幸的是，自近世以来，大多数政治家认为政治只需要善于言辞即可。他们不重视思想，而用言辞蛊惑听众。这种蛊惑即使能够成功也不能保持持久。著名的演说家习惯以言辞为事实的依据，因此往往成为蹩脚的政治家。

具备一定知识的人，做决定时果断利落，是不需要华丽的演说来鼓动的。因此缺乏远见的政治家是灾害命运的缔造者。今天的英国增加赋税、扩充海军、抵制德国的霸权，都是由于他们40年前的统治者缺乏远见。

英国想在德法战争之后平息国内情绪，因此拒绝工会的召集。不然就可以遏制德国的野心，也不至于发生后来的结果。这就是俾斯麦所深切忧虑的。这位大心理学家在笔记中曾写道："工会可以减弱战胜国的利益。"因此数年之后，他为了遏制俄国人战胜土耳其而召集了柏林工会。

拉丁族前途未卜，因为他们的政治家总是变化莫测，活在当下而不考虑未来。只顾眼前利益的政策是鼠目寸光的政策，一定会为命运所累。国家近期的历史可以证明，政治与工业一样，只有有远见的人才能成功。40年前，除了少数探险家之外，知道非洲的人很少。

一个年轻有远见的国王预见到亚洲将要挣脱欧洲的束缚，非洲才是欧洲的将来，因此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不顾国民的反对，毅然在非洲大陆创建了一个大帝国。之后逐渐扩张，面积几乎达到俄国的一半，如今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财富之源，这个小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如果这本书真的能给一些人以启发，我的功夫就没有白费，我平时所讲的其实也不过是最普通的道理，只要人们稍加思考就能毫不费力地阐述相似的道理。那些先哲和贤者们对这些道理的理解是很透彻的。

第七章 社会防卫

一

在想要脱离过去，以至于失去了心理定性的民族中，社会骚乱和战争表现得尤为明显。遗传、风俗、信仰、公共情感、成见等构成了国民精神。这些精神领导着我们的思想，引领着我们的行为。一切民族思想和行为都是相似的。

只有国民精神的存在，社会才会稳固，祖国的观念才得以维护。在国民精神形成之前，民族就像一盘散沙，最多也不过是暂时的凝聚，而缺乏持久的联结。如果国民精神分崩离析，这个民族将回归于蛮荒时代。罗马正是由于丧失了国民精神才导致衰亡，而继承它遗志的侵略者构成使他们走进文明的国民精神足足用了百年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情形与他们无比相似，对我们思想行为进行指导的宗教、政治、道德等信仰正在逐渐消亡，而目前尚未有新的信仰来取代它们。对一个民族来讲，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失去信仰。个人可能会产生怀疑的观点，但对群众来说，他们无法认识这种情感，而是需要一个创造希望的意念。

神明固然永存，但会不时更替。新的信仰会取代旧的信仰。今天，社会主义学说大有取代基督教义的趋势，它的优势在于符合了祖先的信仰。国家神明是我们先祖神明的小型化，社会党所勾勒出的天堂与古代神话中的天堂亦是血脉相连。蜕化的程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种方式。最古老的民族担负着最重的遗传分量，只能将过去的信仰改头换面，却不能湮没悠久的固定的情感。

社会党实际直接继承了基督教的信仰。这也是它能够在群众中传播的部分理由。它给予人们神道不能给予的最简单的希望，给予人们被科学打破了的幻想。社会党的传播者对旧式的定说持憎恶的态度实在犯了个荒谬的错误。无论是教会党、社会党还是无政府党，他们都同出一源，属于同一心理种类。他们的精神都受到同一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的影响。他们心理状态相同，崇拜的事物相同，满足需要所用的地位、方法也大略相同。

如果新宗教的传播人能够和平地传播教义，那么是没有任何危害可言的。但是与其他传道人相似，社会党也具有强制他人服从他们所信奉的性格，尽管那是可以改造世界的意向。工人被刚刚回归社会的宗教遗留性格主使，迅速传播着被社会党所鼓动的怨恨。与过去相比，今天工人的命运是幸运的，但是他们对当今组织的诅咒与毁坏和最开始基督徒对古代社会的破坏大同小异。

二

社会受到的攻击日趋猛烈，而防卫却愈加软弱。与古代各种社会对新信仰的态度相同，当今社会所受到的攻击也出于对社会建设原则和巩固核心的怀疑。古今的精英们也大体相似，一边无法摆脱祖先的影响，一边又受到当

今需要的威胁，他们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因此对于一切民众运动都会退让。转变民众舆论是轻而易举的，细枝末节也可以导致愤怒、忏悔、欢欣和仰慕的爆发。没有公共基本原则可以防止心理动摇，也没有一定的向导可以引导民众的行为。管理者尊崇群众，但他们更应该引导群众，因此精英们的力量日益削减，终至于无。

所有传播凝聚大众本能，还有诋毁社会的言论的人都是半精神错乱的。这些人名义上是引导者或是传道者，但是他们的心理却没有因为时代变更而变更。这些人也许智慧和见识都有限，但是却最顽固。不厌其烦地阐述同一事物，并且准备为他们的理想牺牲利益甚至生命。他们对群众的精神影响最大，因为他们不断许诺群众以光明的天堂。要知道天堂代表着希望，而希望是人类行动的最大动力。

这些人扰乱了群众的精神，本身也沉醉在他们自己的梦想里，这使得他们愤然反对一切障碍。群众的心理状态历经弥久而不曾变更。进步的是智慧，而不是指导我们的情感和嗜好。令人失望的是，斗争只存在于传道人和传道人之间，最可惜的则是破坏秩序的传道人永远多于维护秩序的传道人。冷静的真理永远没有错误受人欢迎，因为称赞幻想很容易，为事实辩护却很难。人们很容易相信工厂主是盗贼，工厂应当被焚烧。但是却很难相信工厂主减少工资的原因是黄种人在亚洲的相同劳动拉低了货物的价格。

旧日帝国的灭亡是被情感影响，尽管今天我们认为这是无意识的，而当今的世界正在被妄念所困扰。既然理性在过去无能为力，那么在将来也不要对它寄予希望。我们只能准备面对妄念渐渐侵入民众的幻想精神之中，而此种妄念一旦种下种子，必然生根发芽。想要预测其未来的危害，是很难的。

三

在前一章中，我已经阐明了革命的暴烈动乱，是源于最基础的本能。这个本能常常隐藏在民族精神里，在某种哲理学说的鼓动下，转变为新权力的酝酿之所。人的动作和自信都是符合理性的，而且经常被作为引证，相反，反对理性才是脱离了人类的本能。恐怖时代里，下劣本能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本能战胜了理性，使下劣本能变成了权利。著作家和历史学家将其想象为理性战胜本能的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取得了合法性的胜利。这在历史上还属于新的事物。因为原始兽性遗留给人类的本能，都在遗规、习惯和法律的约束之中。社会上所有存在的必要劳动，是在这种约束下进行的。这样操作要容易得多。国家对本能的抑制越厉害，民族的文化水平就越高。然而本能就越不能被消灭。在一定的兴奋剂的作用下，例如社会主义，本能就可能重新被发现。

民众的重大运动，都是非理性的结果，它常常是反理性的斗争。如果用理性的理论，来解释由本能引发的事件，是不了解历史的做法。

现如今的革命运动，是因为野蛮的本能试图从社会制度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它是一种企图消灭社会关系的运动。这与之前的革命运动的动机是相同的。许多人，被一些歪理所蒙蔽，他们所认为的进步，其实走向了劣势，它是生存形式的退化。

所有的文化，其制度都有强制性和妨碍性。只有认识了这种强制性和妨碍性，才能成为真正的文明人。只有这种社会性束缚被创建起来，民族国家才能脱离野蛮。束缚性弱的国家，只能维持旧有状态。只有持之以恒的劳动，才能维持这种由文化所创造的社会束缚。一个国家之所以衰败，其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劳动毫无用处，从而任其不劳而获。这种无能的观念会充斥于国民

的精神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所需承受的社会灾害与过去人们忍受瘟疫没有分别。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导致国家衰弱的冷淡怀疑学说。我们未曾将这种学说灌输给革命传道者，而是相信它会成为增强国力的因素之一。

现今，劳动者的待遇固然已经非常优越了。但是传道者仍然怂恿他们，说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劳动者们轻易地相信了。事情的本质，在于事情所承载的观念。近代以来，工人的心理状态，逐渐恢复了他们的原始本能。这是一条回归野蛮之途。引导他们重新步入文明之路，任务是十分繁重的。首先，我们应该使工人们明白什么是智慧资本，以及明白劳动各方面的价值。然后，再使他们明白，在怂恿者所谓的社会中，劳动者的生活会变得困窘、辛苦。但是，能把这些教授给工人们的教师，现在还有吗？

四

既然，这种教师很少，没主见的大学和没有势力的政府又是不能依靠的，那么，我们这些中产阶级，只能靠自己，寻求自我防卫的方法。此前，瑞典反对工业界叛乱的斗争就是一个例子。

瑞典政府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认为，今天所给予工人的罢工权力，其实是少数反叛的人试图阻挠国家公共事务的正常进行，并培植叛乱力量的工具。这丝毫无益于文化的进步。于是，国会提出了一个规定群众的契约草案。草案中规定，凡是有害于公共安全的罢工行为，都将被严惩。国会还特别设一个法庭，专门用来解决罢工争端。如果我们以前也有这项法律，那么，导致衰败的各种罢工一定不会出现。

相类似的罢工运动，在法国早已出现。但是，如果我们也想设立这样的

法律，就需要对我们的心理状态稍加改变。我国的中产者，既没有决心，也很软弱。只有坚决的进攻，才能形成坚决的防护。正如克索列尔所说：“以后，如果工厂主发现，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及民治主义中没有收获，一定会知道，他们的成果是被给予的。那是，我们或许可以再次看见他们以前的毅力。一种在工人群体中扩张的势力，或许可以迫使资产阶级愤然投身于工业斗争之中。”

只有强者，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在现代的社会进步中，不知道保护自己，就无法生存。我们这些中产者，若想在这种声势日趋浩大的斗争中取得主导地位，必须修养一定的美德，去除一定的恶行。像某暴发户一样过度奢侈，就是一种恶行。对于他的奢侈，工人大多认为，那是他们辛苦劳动所创造的。他们对此的怨恨，远远超过一切社会党所演说的那样。无论与英国贵族相比，还是与法国过去的贵族相比，我们现在的中产者，衰老和疲软的速度太快。如果不是每一代中，都有下级阶级的人加入，巩固了我们的队伍，中产界早就不复存在了。

旧贵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有继承权。享有这种继承权的人，不需要有什么优质特长。但是智慧的贵族与此不同。他们需要维持他们智慧的优质特长，以保证他们长久地存在。但是，此种优质特长并不是遗传得来的。我在拙作《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则》中已经谈到，社会的精英是经常更新的。这大概因为，遗传规律使精英后裔的资质恢复到了一般水平。自然有时就是公平的，但这不是社会党梦想中的那种平等。自然不会使一代人都是相同的，它会对每个人区别对待。只有精英的后裔恢复到与一般人平等的位置。所以说，自然的均齐法则是为了未来，而社会党的均齐法则，其目的则是现在。

五

社会防卫，更多地表现在中产界的下层，而不是在中产界的上层。例如店商、零售商等。他们常受到威胁，但他们从未防卫。如今，他们发现，可以依靠的只有他们自己，于是他们开始谋求自我防卫的方法。他们团结成一体，组织了联合会，并且谋划训练民兵。瑞典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

他们今天的情况，已经令人无法忍受了。《时报》发表评论称："经商的人，因为立法和暴民政体不断加价，再加上政府的软弱，已经成为工团的狼饵。他们名义是受社会政策的保护，但其实被营业税、罚款等费用困扰。社会法更是给工厂主带来了加倍的负担。牺牲与日俱增，能否换来应得的保护呢？答案是否定的。自我行动的志愿兵，时常造访。商人在他们的威逼强迫下，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否则，他们的人员就会流散在店铺里，赶走商业合作者，或者吓跑客人。小型店铺的商人所受的压迫最为严重，所以，他们决定自我保护。他们计划组织民兵，打算展开武装斗争。政府十余年来的无所作为，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受到危害的公民，不得不展开直接的防卫。"

上述几种反对暴烈的自卫方式，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几种固定的原则。万一我们陷入了这种困境中，我们便可以有突破的方向。这种固定的原则，就是我们所不具有的。报纸所刊载的一些事件，是对我们的社会有所进益的，这些篇章，我们常能看见。例如维伦纽夫乐地方欲建设一个车站。而议员却率领群众阻止火车。这就是其中一例。这一举动，若稍有差池，就很可能造成大的灾祸。若不是具有一种蛮族的心理，怎么会如此呢？

六

如果人们普遍轻蔑法律，消灭了政府的原则，废弛了一切文化、纪律，那么，社会动荡也就指日可待了。今天，只有实力才会受到尊重。官吏对待长官的态度、水手对待船长的态度、工人对待厂主的态度，都很傲慢。更无须隐讳的是，官员受到尊敬的权力，正在逐渐丧失。法律不能主持正义，政府服从于党徒，无力保卫它的公民、反对强暴。虽然有时候，它会表示出强硬，但也只对那些任人剥削和虐待的老教徒起作用。

这是一种文化的彻底毁灭，是一种曾经的辉煌的灭亡。类似的现象也曾出现在监督政府的末年时期，就在 10 年骚乱之后。专制者固然能够使用强硬的手段，使秩序得以恢复，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可观的。我们今天还能去尝试吗？

但是，如何摆脱束缚呢？向治理者请教吗？毫无希望。向立法者求教吗？更是没有希望。立法者和治理者只知道对选举委员会俯首帖耳，他们既没有自由，又缺乏尊严。潘伽烈曾经表示，有些议员在议会非常傲慢。他们实际是为县选举委员会做准备的经纪人。而且，在那些可怕的，以及带有神秘色彩的各县选举委员会的神明之前，他们随时准备行跪拜之礼。他们在行走时，带在他们身上的奴隶的锁环声，能被所有人听到。如今，被选中的立法者，其实正在危害着社会。他们没有主见，唯一的追求就是再次当选，并且臣服在群众的低劣本能的淫威之下。

七

现如今的社会中，寻找能够谋划将来的社会道德的规则，毫无意义可言。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当下的道德重建，并且谋求保持它的正确方法，并以此来阻止动乱的进一步扩张。能够指导民族的主要原则，不在于数量的多寡。力量足够强大的原则，群众自然会尊重它。罗马人的宗教，也就是罗马人的思想，足以维持罗马的强盛。罗马宗教的衰弱之时，就是罗马衰亡之日。今天，我们需要具备自强自立，保家卫国的观念，并以此观念指导我们寻求道德组织的方法。社会党清楚地知道，这一观念是社会的中枢。中枢被损坏，社会就会随之垮台。

这一因素固然重要，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尤其重要的有：军队、秩序、对政府的尊重、精神的纪律。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这些，它是不能生存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革命党无所谓，其他政党都不可能弃之不顾。

爱国之心是真正能够维持民族权威的要素。祖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标志。它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我们也应该为了它而努力生存。土耳其革命的领导者，即是用此来蛊惑人心的。他号称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都奉献给了祖国。他在一次宣告中说："一切良知者、自觉者，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祖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比父母更加可贵。总而言之，它是世界是最珍贵的。"

不幸的是，这个曾经创造了过去的罗马的权威，也曾使德国日渐昌盛的、对祖国尊奉的信念，我们却鲜有人护卫。在德国、美国等国家，这种信念在大学被传播到文人之中；在小学，由教员传布到下级平民之中。而在法国，能否找到类似的护卫之人，将其传布到青年以及儿童之中呢？无奈、迟疑的理由太多了。

时至今日，防卫社会、反对野蛮破坏的责任，应该由个人自己承担。如果野蛮党徒取得了胜利，衰微就会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将是社会内讧和外敌入侵。保卫祖国、抵制动乱，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道德规则由国家观念所引发，它足以成为民族社会的武装。但是，它的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它对人的内心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若是单纯依靠法律，它的作用必然很小。

由此可见，使国民团结起来的力量，只在于意念，与宪法、舰队、陆军，统统无关。意念是无形的权威，但却是有形事物的创造者，是指挥人心的有效工具。一个民族的信念的获得，需要若干世纪，一旦失去，民族就会陷入野蛮。

八

我们已经明确，习惯和制度的衰落，在于性格的柔弱。今天，有很多人缺乏毅力。尤其是精英的身上，缺乏最为明显，而他们是最迫切需要它的人。无论是国民的领袖，还是管理的小官员，都十分软弱，没有决心。

但是革命党则不然，他们的毅力非常强大，所以十分可怕。所有软弱的意志，在强健的意志面前，无不屈服。这些人至今尚未产生威胁，是因为过去的遗规仍然掌控着这个社会。真正主宰我们的，其实早已入土了。我们是在用已故去的人的专制，镇压着目前不同寻常的欲望。

今天，只有死去的人是拥有毅力的，且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死者对我们的帮助是有限的。过去的权威得以维持，全都依赖于我们今天时代的扶持。

九

本书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物理现象、生物现象、社会现象，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但是，它们都被同样的需要所限制。近五十年来，知识界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除了以往的发明创造，各科解释性学说也相继创立。在近代，宇宙固定元素的研究不再被科学家视为唯一，一切学说都在走向灭亡。即使是物质说，它的不朽性也被颠覆了。现如今，不定性取代了固定性，和平被势均力敌的动乱所取代。事物的本质原理，已经回退到不可接近的极致境地。今天我们所知的，只有表面上的联系。潘伽烈曾经对经验的总体做过总结，他说："在我们所处的相对世界中，对任何物质的确切言论，都是胡说八道。"

过分简单的阐释学，现如今，已经被科学放弃了。总的规则，被无数小的元素的积累所取代。就科学的经验教训而言，物理界、生物界、社会界，都堪称最小的性格迥异的事物。这种特性，其单独的力量很小，只有联合起来，它们的势力才会变得非常强大。新大陆的发现，种植业的萌芽，以及人民生活的持续，都引发于极微小的事件。文化的发展，也是从每个人开始的。

现象的演变，以及导致现象演变的原因很多，这一点，科学已经证明了。同时被科学证明的，还有所有具有特性的个体，诸如物理元素、生物细胞、以个体存在的人类等。如果没有指挥力的激发与引导，所有这些都不能发挥功效。所以，在物理、生物、社会等各个范围之内，用来确定行为方向的指挥力，不可或缺。一旦指挥力的影响不复存在，个体就会成为一盘无用的散沙。对于生物而言，这种指挥力就意味着生存。指挥力若不存，生物亦将灭亡。社会的本质规则也同此理。

在人类社会范围内而言，指挥力就是信仰和观念等。这种指挥力不会被消灭，它会始终延续。它的名称或许会有些变化，但它的本质却亘古长存。

历史上，各个时期都需要一种工具来确定前进的方向，它们或者是信仰，或者是刀剑兵器，或者是科学，又或者是观念。一旦失去了指挥力，社会也就消亡了。

统治者领导民族的任务，大体上，与学者运用现象，在原理上是相同的。对于自然的力量，政治家只能利用，不能创造，但他们可以用与之相反的力量和它抗争。

十

意志力常在人类可以利用的多种力量中脱颖而出，成为能够使人取得胜利的力量。意志力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作用下，学术的力量从虚无变成了现实。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印证。某某民族可以达到兴隆昌盛的状态，就像是学者强行为宇宙赋予了秘密一样，都是以强健的意志力为基础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某个民族的衰落，就会发现，其原因也是意志力的大大减弱。例如，古罗马曾经盛极一时，成为世界的霸主，但最后，被外来民族所消灭，就是这个缘故。

个人以及民族的主要品性就是意志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教育对人的培养，其根本目的是增强人的意志力，而不是使人意志力削弱。这是因为，意志力坚强的人，总是对人生充满了希望。意志力也是事物创造的源泉。近代世界的历史事实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的强盛、衰弱，或是停滞不前，归根结底，都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具有怎样的意志力。因此，所谓的命运和天数，并不是世界的指挥者，人类的意志力才是世界的主宰。